

# 炎黄春秋

第 **8** 期  
2013年

**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施义之：我在公安部**

**宪政之我见**

**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回忆**

## 目 录

### 沉思录

- 1 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读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董郁玉
- 7 宪政之我见……王建勋

### 亲历记

- 9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施义之口述 陈枫整理
- 17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鲁琪回忆 鲁晓纾整理
- 22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王冠群

### 春秋笔

- 24 1933年四川兵灾……赵晓铃

### 访谈录

- 31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陈邦本
- 35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王保春 王文耀
- 45 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回忆……于书吉口述 程宏采访整理

### 求实篇

- 49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洪振快
- 59 读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应克复
- 60 有关高岗“轮流”说的考证……林蕴晖

### 一家言

- 63 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李 锐
- 67 “正能量”的正解与邪说……崔 敏
- 70 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曾彦修

### 忏悔录

- 72 我上门批判孙大雨……武振平

### 人物志

- 74 1949年后胡适形象演变……董立功
- 79 胡绩伟周年祭……袁 鹰

### 争鸣录

- 82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阎长贵

### 品书斋

- 84 不因人废言，更不可因言废人  
——《人权与宪政：罗隆基读本》序……郭道晖

### 海外事

- 87 新闻审查浪潮中沉浮的红色诗人……李玉贞

### 编读窗

- 44 读者来信摘登……高 放
- 93 读者来信摘登……田大畏等

### 顾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鑫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諝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竟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竟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竟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奕赵阔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 (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 改革的行进逻辑与历史脉络

## ——读吴伟《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

○ 董郁玉

今年2月,香港出版了吴伟的《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作者置身当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策研讨过程,参与介入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以对其所亲历的改革研讨、设计、决策和实施的回忆,为中国改革、尤其是80年代短暂的政治改革留下了尚不多见的史料性记叙。

总体而言,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日有所新、月有所进的狂飙突进期。正是在80年代,中国于世界范围内一马当先的改革,缓解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与社会主义制度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些突破了共产主义原教旨教条和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改革成就,为世界上其他同样受困于宏大理论与逼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一个走出社会政治经济窘境的样本。

30多年过去,在昔日社会主义制度曾经存在的许多地方,改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虽然不是通过改革,但改革的终极结果也无非如此的“多数决定”,已经成为这些地方的基本国家制度。在这样的地方,政党依“多数决定”而成为执政党,政府的政策亦须得到“多数同意”方能形成和实施。如是,政府政策的提出、制定、实施及其目标达致,均须循程序化之途而图之。如此,改革的意义就大大弱化了。

由此回观中国,至少在当下,改革仍是执政党政策宣示和政府施政说明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汇之一。这种现实,既映照了中国在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实际位置,也说明了即使中国在最近20年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居于潮头之位,但执政党及其政府仍然没有放弃以改革来描述其政策措施之选。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在那些以社会主义蓝图为制度摹本的地方落地以及展开,并非自然顺当,而是一路坎坷。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主流意识形态,曾视任何稍有创意的实践性操作为“修正主义”。而“修正主义”紧箍咒所要防范、限制和制裁的,正是那些对共产主义原教旨有所怀疑、变动、乃至冒犯和突破的种种企图。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自上世纪50年代始的“离经叛道”之途中所遭遇到的挫折,无不说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行进之艰难。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以作者的亲历,向人们部分地展现了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看似突进的背后,改革决策形成和推行有多么艰难。在中国政治语境下尤为难得的是,这本书为人们打开了一扇中国上层政治决策和操作过程的窗子,把中国政治运作中历来隐秘、从不公开示人的“硬球”的玩法公之于众。

### (一)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人们可以从历史中发现,改革实属资本主义的发明创造。对匡正社会主义有里程碑意义的所谓罗斯福“新政”,就是改革的最典型代表。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过后,改革的风潮逐渐蔓延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直至今日,“医疗改革”和“移民改革”也仍是奥巴马政府最显著的政治标识。

不过,在“多数决定”的制度约束下,改革的主张能否被接受,这主要取决于选票之争;这之后,改革的主张能否最终成为国家政策,则取决于立法之争。选票之争也好,立法之争也罢,这

都是公开交流、交易与交锋的政治过程。在法治原则之下,这个政治过程自有法律的束缚。任何自认为再好不过的改革主张,也必须通过这一政治过程的认证。在法治环境中,如果有谁把政治的“硬球”运到了规则之外,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人及其改革主张的出局。

改革意味着重塑,意味着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因此,改革就意味着对其所要改动、改变、革掉和革除的东西的否定。问题正在于,在法治原则与责任政治中,改革所导致的否定并非抽象的否定,而是需要有人、政党或政府为那些被否定的东西负责,并由此为之付出法定政治代价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否定。简言之,成为改革对象的政策及其措施,在其被否定的过程中,将伴随着制定这些政策的政党由执政到在野的过程,也将伴随着实施这些政策的政府由台上至台下的过程。

改革的这种“天性”,堪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阿基里斯之踵”,是导致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落脚之时即遭遇抵抗并难以深入的根本性因素,也是导致改革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始终充满张力的先致性因素。

按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制度形态,是在否定资本主义以及此前一切剥削阶级当政的制度形态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是人类“社会形态”进化至“终点”——共产主义社会前的最高级社会形态。这样的意识形态宣示,与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需要以及运行实际高度吻合。这种意识形态所描述的社会形态特征,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永续执政合法性的自洽逻辑。

当然,再完美的意识形态——无论是什么“主义”的,都抗拒不了现实的颠覆。但问题在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无“最高”、“最好”、“最完美”之类的限定词。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现实、社会现实的颠覆性,首先体现在其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颠覆上面,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颠覆则属其次,意识形态的修正只是政府更迭的后续效应。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和制度设计“之最”的脆弱性,就在于其一旦自认为瑕疵存在,或在制度的竞比中被认为瑕疵存在,都易导致为“之最”

进行阐释的意识形态的崩坍。改革的合理性,却正蕴含了这种否定“之最”的前提。

在此,资本主义经得起颠覆的“弹性”,还在于其国家制度中的执政党及其政府更替的必然性和合法性。这就是说,在国家的政治现实中,失败的政策,必有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为之埋单;而失败的执政党及其政府,也必是因失败的政策而导致被选票抛弃的结果。

相较之下,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则始终被缚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必须永续执政这一政治前提的不可移动性,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现实的境况,尤其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遭遇到的挫折,就不能被解释成整个执政党及其政府的错误,而总要被归结为党内路线斗争。这种归结的妙处在于,执政党的政治责任可以由少数在“路线斗争”中失败、并注定要被“永远开除出党”的人来承担,而党的永续执政地位却没有被动摇。

但是,在资源似乎永远处在稀缺状态的世界,人的行为、尤其是造成不良后果的行为,必定要与行为人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并由此产生具体的后果。这种行为与责任的对应性,是人类所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自然正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道德的逻辑支点之一。不以“自然正义”为基础、或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或许可以屏蔽“自然正义”于一时,但终究不能解构已经根植于人性的这种正义观。也正是这种“自然正义”,支撑和建构着在当今世界普行着的所谓“责任政治”。

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失误所带来的政治责任问题,固然可以通过“路线斗争”的说辞或理论来规避和化解,但这样的腾挪方法不可再三。实际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洽逻辑环链的断裂、共产主义信仰的裂解、“自然正义”观念的复归乃至改革终于可以大行其道的现实,就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内不断的“路线斗争”之后。

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落地和施行,必然产生一系列的后果。首先,承认改革、施行改革,就要承认改革的必要性,而改革的必要性,又天然地带有否定以往——即使不是全部以往——的性质:显然,如果一切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那就沿着既定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径直前行罢了,还改什么、革什么?

其次,无论在何种政治制度中,被否定的社会治理,都必然意味着某些政策失误;而有政策失误,就意味着存在相应的政治责任。再次,政治责任意味着政治后果,而在现实政治中,政治责任则相关政治权力。于是,与政治责任相关联的政治权力,就意味着其与政治后果的对应性。这种对应性一旦成立,则抽空了一个政党永续执政的逻辑基石,最终也一定会导致永续执政所依托的意识形态的整体性坍塌。

因此,从根本上讲,改革的话语体系并不相容于“路线斗争”的话语体系。没有“路线斗争”的腾挪大法,执政党就有可能由改革所产生的政治责任及其相应后果,丢掉永续执政的先赋性地位。改革的行进逻辑及其潜在但却确定的后果,是上世纪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对改革欲迎还拒、明喜实恶以致拖延阻碍的真正原因所在。

## (二)

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因缘,但也大体不出上述改革的逻辑与历史脉络。而《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则为这个脉络提供了许多关键性的节点。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1970年代末采行改革开放政策,“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国际上,在以冷战为背景的制度竞比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颓势明显,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问题凸显且持续增加。而责任政治不行的可见结局,则是社会道德无底线地下降以至瓦解。在保证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阶级斗争”中,几乎所有人——不论是执政党成员还是普通民众都生活在不确定的状态中。

在中国,铁腕专政屏蔽了社会乱象的出现,但居民几乎所有生活用品都被纳入到无所不包的配给体系,以致小至火柴和卫生纸这样的日用品都要凭票购买甚至还不一定买得到的严酷现实,则无声宣告了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



——计划经济的破产。对此,甚至连执政党也在稍后坦承,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然,上述执政党对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结果的自我评价,也并不必然导致执政党对改革政策的采行。

经济危机是逼迫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条件。但仅此还不足以启动改革。在苏东以及中国,改革破冰而进的过程,往往是在执政党及其政策的化身——党的领袖的生命终结之后。一个已逝的执政党领袖,常常可以充当执政党难以为继的政策——尽管党的领袖往往是这些政策主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制定者——所带来的政治责任的承载者。政治责任有了安放之处,就大致不会引发执政党当下的统治危机,否定以往政策所产生的即时风险也就大大降低了。而此时,就堪称是启动改革的最佳时机。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启动改革的限制性约束还不止上述。由执政党永续执政体制所必然带来的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后任领袖的做法,从人身关系和体制两个方面保证了执政党

政策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加大了启动改革的困难。因为延续而不否定早前的政策,除旧布新的改革就无立足之地,由此也就更谈不上踏地前行了。这就不似在由选民授权的权力交接体制中启动改革那般容易。在“多数同意”、选民授权的体制中,出自新上台执政党的领导人,可以不必理会前任异党执政时的政策,甚至还就是以否定和攻击这些政策并许诺实行改革为资本而上台,因此能不费周折地迅速启动多数选民投票同意的改革。

显然,党的前任领袖圈选和指定党的后任领袖的做法和体制,并不以普通道德为根据。但是,一旦被指定者甚至并非被指定者就位,就自然会在延续前任的政策、做法和体制方面受到普通道德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赫鲁晓夫在抨击斯大林时,会从听众中收到发问“那时你在哪儿?”字条的原因(赫鲁晓夫回答“那时我就坐在你现在的位置上”)。这就是说,被圈选和指定的领导人,受限于体制和私德,是最没有可能启动改革的执政党成员。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任何被前任领导人圈选和指定,但却要以否定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措施为前提条件才能开始的改革。

回顾改革的历史,中国的情况也不例外。只不过,在为“文革”所空前深化的经济和社会危机面前,别无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上层的权力斗争,迅速撤换了毛泽东圈选和指定的其后任领袖,在稍纵即逝的历史当口启动了改革。

《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对中国改革启动前后历史的记叙,正从多个角度展示了上述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启动改革、推动改革上的矛盾与纠结。

其实,在一个由执政党控制了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因而一声指示便可号令“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国家,相对而言,启动改革还不是最难的事情。如何把控改革,让无可借鉴的改革始终在巩固和增进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地位与利益的范围内进行,以及防止改革脱缰至执政党不得不放弃独享权力的地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事情。

中国改革初始,在释放既存体制潜能所形成的短暂的“帕累托效应”的振奋下,中国共产党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此时,这种人人受益的改革

效应不仅让普通民众成了改革的拥趸,也让改革成了执政党的“良性预期”,并“诱使”执政党继续向前迈出改革的脚步。更重要的还在于,在改革尚未触碰体制时所产生的所谓改革正效应,暂时遮蔽了改革所内含的自律目标与社会主义制度设计之间的必遇冲突。甚至正相反,原有体制的潜能释放,还增加了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竞比得分,为“制度自信”垫付了物质基础方面的欠账。

这样的结果,以原有意识形态的理论完全解释得通,也完全可以作为先前在执政党内开展“路线斗争”正当性的实际证明,并被用来作为“路线斗争”胜利成果的一部分。当然,这种可见的物质释放效应,也真正“误导”了相当一部分普通民众和执政党成员、甚至是执政党的领导成员,使他们天真地以为原有的制度设计就是一个宝库,而这个宝库之所以不能释放出财富,则是因为打开宝库之门的咒语没说准确。这样,一时间,在很大程度上被作为咒语来使用的“改革”,其声不绝于耳,成为主流话语中的关键词。

改革在释放原有制度设计潜能的同时,也释放了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且把社会物质产出与制度设计更具体、更准确地挂起钩来。但是,囿于既有意识形态而被理想化的改革,随着原有体制潜能的释放殆尽,很快显现出了其对既存体制否定与颠覆性的一面。而快速增长的刚性的物质欲望对体制设计的要求,很快把改革推进到了必须触碰体制框架的硬碰硬阶段。

应该说,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最早看出了改革这柄双刃剑对执政党的永续执政地位的现实威胁。还在1979年3月——无论以什么为标志,改革开始尚不到一年,邓小平就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就此明确指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由此给改革套上了笼头。关于这篇讲话的来龙去脉,《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做了较为翔实的交代,其中细节,得以让人们一窥中国政治运作的究竟,并可据此形成中国政治现实的真切概念。

### (三)

从1979年3月到1989年“春夏之交”,其间

整整10年。从改革之初执政党内就有人预见到改革对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巨大威胁,到已全面启动了的中国改革在1989年以血的代价收场,这段峰回路转的改革之路,堪称是共运史上相对最完整的改革演绎过程。

实际上,中国改革刚开始,就和既存体制碰撞得叮当作响,且擦出了火星。显然,当年小岗村农民的18个血手印,其预期的风险正是来自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而绝非来自其他方面。不过,值得中国农民庆幸的却是,他们“要吃米”和“要吃粮”这一基于原始生存需要的要求,得到了执政党的首肯,虽然其过程也始终充满波折。

小岗村农民暗中包产到户,在当时体制下,确为可招致杀头之罪的举动。因此,他们订立的按有18个血手印的生死契约,其实正是对既存制度的一种决绝反抗和冒死突破。今天,这份已经被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中国改革的证物,而被摆进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历史文献,虽然地位已然尊赫,但那血色纹路所述说的,却依然是“草根”原创在改革启动中无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在执政党控制一切资源的国家,让改革成为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只有“草根”晃动体制的举动还不行。实际上,执政党既可将“草根”的上述举动看作是危害体制的反叛而加以平息,又可以反过来将之视为有益体制认同的政治表达而加以采纳。对执政党而言,这样的采纳,可以消弭非由执政党安排的政治表达的自主性,由此形成以执政党的名义来提出任何可能受到民众追随的政治表达的有利局面。当然,这种采纳带来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既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对任何与以往不同的政治表达,在人们都已熟悉的逻辑和语言的框架内,做出不露破绽和自圆其说的新阐释。这个结果,应该是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首先遭遇到的阻力和反对,就是来自其意识形态操作部门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要永续执政这一不可更动的政治硬核,决定了其意识形态在把“不可更动”的逻辑与具体政治实践的操作协调一致方面的重要性。也正是这种协调之于永续执政的重要性,使得协调的操作者总是能最先感受到改革对永续执政实在而具体的威胁,从而成为执

政党永续执政制度的“吹口哨的(报警)人”。

不过,正是在这样连续不断的报警声中,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的政治容纳能力却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空前高度。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的着墨重点,就是描述中国共产党在1980年代领导的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可以说,举凡困扰着当下中国的所谓“深层次问题”,从民族问题到国企问题,从新闻传播改革到党政分开体制建设,从党政机构改革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从中央委员会议事规则改革到社会协商对话渠道的建设,从多党合作到工会自治,从党务公开到人大制度改革,从减少党务机密范围到尊重民众知情权,等等,全都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议程上,也全都在实际操作中开始向前推进。因此,无论以什么标准判断,由改革撬动的社会转型已经站到了起跑线上。

正如前述,改革的特质之一,就是以当下以及未来政策设计的合理性,来否定过去以及由过去遗留至今政策的合理性。这种特质,在政党及其政府可以合法被替代的责任政治中,并不一定会成为国家或社会的悲剧肇因。但是,不独在中国,在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架构中,改革的上述特质,却命定要成为改革发动者自酿悲剧的决定性因素。

至1989年,趋于全面铺开的改革,实际上已经从方方面面开始解构着支撑执政党永续执政逻辑的意识形态。至此,执政党面临着继续改革、最终实现责任政治,以及放弃改革、确保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的历史抉择。到执政党定性的“两乱”(“反革命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被武力平息,这种选择已然明确。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中国改革在向前推进中亮出了自己的底牌,而执政党永续执政所依托的体制也亮明了其决不会更换的底牌。“两乱”被平息的结果,是中国现行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已至其极限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中国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范围的界标。执政党的底牌及其据此所树立的界标,是人们在1989年之后确立中国政治预期的重要参考。由此所确立的政治预期,是执政党及其成员自1980年代末至今在政治决策与行为选择时的根据,也是

中国政治现状和执政党现状的可溯源头。

在终结1980年代政治改革的决策中,热兵器替代了意识形态的惯常角色。这种替代说明,政治决策者自知为改革所解构、并且自此再难自治的意识形态已经难堪关键时刻的重任。政治改革退场导致的可见结果,就是国家强制力与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运作中的配比发生了变化,国家强制力在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时,被越来越多地推向前台。毫无疑问,在国家政治运作中更多地依靠国家强制力,“维稳”就必成国家政治中的重要问题。

可以想象,在屏蔽传播、各个击破、就地解决的维稳手段仍堪应付日益增多的社会群体性骚乱之时,也就是说在局部的社会骚乱还难以串连成可以给国家政治制度造成整体性破坏的规模,从而还不足以颠覆执政党永续执政的领导地位,亦即政治改革给执政党永续执政地位带来的风险还远大于社会骚乱所带来的这种风险之时,政治改革就断没有理由会再成为执政党的执政目标。由此,那些以政治改革为启动的必要条件的改革,或者以政治改革为成功的充分条件的改革,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开始以及不会有实质性的深入。

在此,《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也从另一个方面,为上述判断提供了佐证。在这本著述中,作者吴伟说明了后来屡屡被当成执政党政治改革纲领而提及的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的本意。《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引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中的话,说明这篇文章的起草者邓力群认为,“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其实质是针对华国锋的,为华的下台做准备,寻找理论根据”。这就是说,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仍属执政党内权力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外,吴伟通过引述《改革历程》中的相关回忆,也确认了这篇讲话的上述具体所指。有了这样的背景交代,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所建立的执政党政治改革的预期就失去了根据。

不过,从邓小平讲话的文本出发,邓小平在上述讲话中所确立的改革意向和改革意志却是明显可见的——不论这种意向和意志是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还是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而这

种改革的意向和意志也明显是以否定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以往的一些做法为前提的。而这也正是这篇讲话诸多“后遗症”的肇因:一些人以此建立了政治改革的虚妄预期,而另一些人则在无望地修补由此而断裂的意识形态自治环链。

当然,在“战术”层面,执政党仍将政治改革的旗帜握在手中。这是防止有人以政治改革来归顺人心、另起炉灶的未雨绸缪之举。但是,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社会改革、抑或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其行进的方式及其结果,都仍在无情地撕裂着既有意识形态的完整性。对此,邓小平先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对之,后以“不争论”来规避改革与意识形态“互害”的两难问题。

因此,如果设定改革前后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制度安排都有合理性,并由此都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那么,在经济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可以笑傲世界之后,通过把改革的经济成果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是在改革之前的年代由毛泽东为主创立,由此便可在意识形态上贯通社会主义、改革之前的执政党领袖、改革成果、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等逻辑环链。只是,以这样的“贯通”,即以通过改革的方式来强化执政党永续执政的历史地位,这于执政党而言,难道不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吗?

以此观之,应该说,就记录有关中国政治改革由盛至衰的过程,尤其是描述中国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围绕改革所展开的政治运作方面,《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一书应该是迄今为止内容最为丰富的著述之一。作者贴身中国政治决策和操作的最高层,在官定的正史之外,为有意或无意被部分虚无化的中国改革史,留下了难得的历史记录。■

(责任编辑 黄 钟)

##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 宪政之我见

○ 王建勋

近一段时间以来,报刊上登载了数篇批评宪政的文章。这在过去百年历史上并不多见。自清末变法立宪以来,除了极权年代之外,走向宪政基本是国人的底线共识。

批评宪政的声音一出,不仅遇到了连绵不断的反驳,而且引起了知识界对宪政诸问题的论争,尤其是“社宪派”(“社会主义宪政派”)与“普宪派”(“泛宪派”)之间的论战。这种争论,一方面凸显了理论界宪政知识储备的不足,另一方面展现了人们对实现宪政的不同设想。鉴于此,澄清宪政之真义,在当下之中国显得尤为迫切。

“宪政”究竟意味着什么?概而言之,宪政是一种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和思想观念。宪政也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治理状态,一种限权宪法得到有效实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政府的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受到良好的保护。宪政的核心在于限制权力,而迄今为止,人类发现限制权力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分权,包括横向的分权和纵向的分权。前者亦称“三权分立”,意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间各自分立并相互制衡;后者亦称“联邦主义”,意即全国性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分立并相互制衡。

毫无疑问,分权制衡是宪政的精髓。其作用机理在于以权力制约权力,或者,用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的话说,“用野心对抗野心”。分权制衡的安排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不是至高无上的,使得任何一种权力都有边界,并受到来自其他权力的制约和对抗。横向的分权制衡使得三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之间相互牵制,纵向的分权制衡使得不同的政府之间互相掣肘。这种双重的分权制衡可以有效地约束权力的行使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为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提供一种“双重安全阀”(麦迪逊语)。

宪政反对任何形式的集权,或者说,任何形式的集权都与宪政不容。集权的危害在于,造就至高无上、不受约束的权力,不论行使权力者是什么样的人物或者机构。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是任意和武断的。麦迪逊指出,所有形式的集权,不论是集中在一个人、几个人还是许多人手里,不论其是世袭的、自命的还是民选的,都可以被恰当地定义为专制。托克维尔也曾说:“不受限制的权力本身就是一个糟糕而危险的东西。……当我目睹绝对命令的权力和手段赋予任何力量时,无论它被称为人民还是国王,无论它被称为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无论它被称为君主国还是共和国,我都会说,它播下了暴政的种子,并且,我将到别处去生活,服从其他的法律。”可见,哪怕某个人或者机构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也不能赋予其所有的权力,也不能让其集所有权力于一身。

无论是横向的集权还是纵向的集权,都倾向于导致绝对的、不受约束的权力,构成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严重威胁。横向的集权,将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裁决案件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手里,不仅无法纠正任何一步骤带来的错误,而且将确立、适用规则与暴力机器结合在一起,权力的行使难免沦为暴政,正如孟德斯鸠担心的一样。纵向的集权,将一个共同体中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一个政府手里,没有其他的力量能够防止其滥用,地方自治将式微,地方自由将消失。

宪政的要义在于确立一个有限政府。它意味着政府的权力是有边界的,其行使受到严格的限制,且以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为目的。这种政府的权力不是天生的或者神授的,而是来自于共同体的成员,来自于每一个个人,来自于他们的授权。因此,其目的甚至唯一目的,就是

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政府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利益,它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了保护个人的利益。

从广泛的意义上讲,宪政是一种生活方式。宪政确保人们自由而和平地共处,确保人们理性地对话和交往,确保人们建设性地解决纷争。宪政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人们达成和平相处的共识,或者说,宪政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的价值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确保他们构建和平的公共生活。宪政将个人与社会恰当地结合在一起,将自由和秩序妥善地交融在一起,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清晰地区分开来,又使它们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宪政社会里,个人是自由的,但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和权利为前提,正如约翰·密尔提出的“不伤害原则”;同时,个人的自由也不受公共权力的侵害,公共权力的行使须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依归。

廓清宪政的涵义之后,便不难发现反宪派的观点的依据,他们认为宪政是资本主义的,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所以中国不应当搞宪政。他们的逻辑是,宪政的制度元素是私有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违宪审查、联邦制等,而这些与社会主义实行的公有制、人大制度、议行合一、司法受制于党的领导等截然对立。坦率地说,反宪派的看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实际上,就他们所作的二者之间的对比而言,他们的看法大抵站得住脚,因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基本理念之间的确存在着根本区别,而宪政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存在着亲和性。反宪派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抱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放,拒绝宪政和资本主义。他们的主张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反观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不难发现,它与宪政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信奉产权公有(公有制)、计划经济(命令经济)、契约干预等,而这些都是宪政所反对的。产权公有削弱甚至摧毁了个人独立和自由,因为个人赖以安身立命的财产基础遭到破坏;计划经济意味着个人的自由选择受到严重限制甚至被完全剥夺,政府通过计划掌控着个人的命运,使其成为一个可以任意摆布的棋子。

有人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与宪政完全可以共存。这种看法站不住脚,即使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仅仅看成一种经济制度,它与宪政之间的对立关系也十分明显。经济制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旨在控制人们的经济生活,控制产品和财富的生产。但正如作家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也就是说,控制了财富生产或者经济生活,就等于控制了一切,控制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哈耶克说得很明确:“经济控制不只是对人类生活一部分——该部分可与其他部分分离——的控制;它是对实现我们所有目的之手段的控制。无论谁拥有对这些手段的唯一控制权,也必然决定它们服务于何种目的,决定何种价值排在前面、何种价值排在后面,决定人们应当相信什么以及为什么而奋斗。”中国改革前的状况验证了这种说法的可靠性。

但是,中国改革开放所改革的对象,正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正是“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这一点,又是宪政的基本主张。在宪政社会里,所有的政党都必须事实上在宪法和法律之下进行活动。■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 黄 钟)

##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 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

○ 施义之 口述 陈枫 整理

## 特赦战犯

公安部在华国锋部长领导下,进行了“特赦战犯”的工作。

解放以后,从1959年开始,我们对于部分国民党、伪满高级战犯已经分别进行了六批特赦。1974年底,毛主席指示:“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1975年3月,华国锋召开核心小组会议,讨论贯彻毛主席这一指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

在公安部、高法、统战部、中调部、新华社等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华国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公安部摸清战犯名单,首先搞清国民党军队军以上、地方局以上战犯名单,并要求各单位做好特赦前的准备工作和特赦后各地安置的准备工作。

3月17日,人大常委会开会作出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决定。3月18日新华社发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电讯。这次特赦战犯共293名,其中蒋军军官219名,国民党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释放后有公民权,来去自由,可以去台湾。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到各个战犯管理所宣布决定。3月21日释放战犯集中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会议,传达了毛主席指示,宣读了国务院特赦令。3月22日,组织他们参观学习,会晤亲友,4月2日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其中有10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4月14日抵香港,但台湾拒不接纳,发生了张铁石(61岁,原国民党68军政工处上校处长)在港自杀身亡事件。

在后来审查被释放的战犯名单时,发现调离战管所到农场劳动的战犯被遗漏,被遗漏战犯和自1962年到1965年窜犯大陆先后被俘的武装特务和特务船的船员,共144人。中央决定把被遗

漏的战犯和俘获的武装特务再作一批宽大释放。9月22日新华社发布了全部宽大释放的电讯。9月25日集中到北京。其中有65人愿意去台湾与家人团聚,分批经香港去台湾。其他也分到各地安置。还有日、韩籍特务4名,遣送回国。

第二批特赦工作因华国锋去西藏,经邓小平批示后基本上由我主持进行。两批战犯的特赦工作于1975年10月结束,在押的国民党战犯全部释放安置。

## 筹备召开各类专业会议

华国锋指示公安部除抓好日常业务工作外,多开点专业会议,不开全面性会议。

1975年上半年,于桑带了几个干部去广州调查,准备召开侦察工作会议。边防局的干部到黑龙江蹲点调查,准备召开边防会议。我同祝家耀带干部到上海、江苏、安徽等地调查了解治安工作上的情况。8、9月份由铁道部、公安部联合召开了有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长和铁路系统公安局长参加的全国铁路治安工作会议,华国锋讲了话。会上反映江苏宿迁在教育控制盲流人员方面的经验好,经华国锋批准筹备在江苏宿迁召开现场工作会。

而侦察工作会议因为于桑和祝家耀二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作的看法分歧很大,文件迟迟起草不出来。到11月后全面“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侦察工作会议没有开成,其他专业会议做了筹备也因“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开成。1975年的许多工作因此被搁置而无法完成,又投入到政治运动中。

## “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全面整顿方兴未艾,公安部正在筹备



“四五”运动中游行的人们

召开侦察、边防、宿迁治安工作现场会等专业会议。1975年冬毛主席从支持邓小平工作转向批判邓小平、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5年11月毛主席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迟群、谢静宜问题的信作了批示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党政军各部委负责人的打招呼会议，我参加了。在打招呼会上华国锋讲话说：“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接着中央发了23、26号文件，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在全国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提议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并批准叶剑英病休，陈锡联主持军委工作。

1976年2月5日，打招呼讲话要点向全党传达。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华国锋代表党中央讲话，说：“当前主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推向全国。

1975年10月到1976年1月由毛远新整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如：“对文化大革命有两种态度，一是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等等。1976年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4号、5号文件。同时在报刊上开展“教育大辩论”和开展对“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

从1975年11月中央23、26号文件（关于

清华大学）下发到1975年底，华国锋曾多次召开公安部核心小组会议，指示“政法干校不要忙着开学，现在路线不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再去教育人”。当祝家耀汇报筹备侦察工作会议起草文件中与于桑的争论时，华国锋表示祝家耀的意见是对的，并说：“右倾翻案风不仅教育战线有，各条战线都有影响。”“公安部有些同志思想上总是疙疙瘩瘩，要做些调查研究，通过批判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解决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公安部要带头，你们批好了，对下面有影响。”还说：“刘复之写信说他被保护审查期间，曾威带人在他的住处安窃听器，矛头是对着我的。批右倾翻案风要联系他的实际。”华国锋指示：你们把今年（1975年）的文件查一下，铁路治安会议上你们给我起草的讲话稿上有“三项指示为纲”，有机会的时候你们要检讨几句。

中央和华国锋部长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损害文化大革命。仍如部内在算旧账和反算旧账的争论时一样，首先要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思想 and 做法。

按华国锋的指示，我们通知不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赶回，于桑从广州、凌云从江苏宿迁、杨贵从大寨回部，共同研究如何贯彻华国锋指示，研究部署公安部内“反击右倾翻案风”。原来正进行的几个专业会议的筹备工作都停顿下来，原定召开治安工作宿迁现场会议也因抓运动是主要的而无限期推迟。

12月28日，我因发高烧住进医院。我住院

期间核心小组的工作由杨贵代理。有一天杨贵、祝家耀因为在批判右倾翻案风如何联系实际问题上意见不一,到医院找我。杨贵主张联系批刘复之,祝家耀意见要批于桑。我同意了杨贵的主张,表示要按华国锋的指示重点批刘复之。另有一次杨贵来医院说:“有件事要告诉你一下,王洪文要我和祝家耀把部里的情况写个材料给他,已经拖了很长时间了,现在政治部整理了一个材料,我想送一份去。”写的什么材料什么内容以及事前如何安排的都没有告诉我。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分管公安部的,但他要祝家耀和杨贵这两个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弄材料,我是不好问的,我只有默认。过了几天杨贵又来告诉我说:“我想了一下,材料光送给王洪文不好,我给华国锋也送了一份。”材料最终也没有让我看。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后,杨贵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我知道华国锋看了。华是部长,他知道了就行了。

1976年2月25日,中央分批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和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后,组织到会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过去部里有人提议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因为上面没有通知,我没同意。看到中央组织各地来开会的负责干部去参观,我便同意政治部组织一部分干部去参观。后来接到国务院要求各部委组织干部去清华大学参观的通知,公安部组织了干部去参观,我也去看过。

1976年3月中共中央发了[1976]4号、5号文件,重提了“阶级斗争为纲”,要“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说老同志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以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

华国锋指示“要认真学习领会精神,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还指示“在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解决公安部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广大干部团结起来”。经核心小组讨论研究,决定先组织局以上干部学习,然后全体干部学习,半天学习半天工作。要求联系实际开展批判。联系实际中批判了刘复之、于桑和几位老局长。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上,为了响应华国锋“领导首先要转好弯子,带头进行批判”的指示,凌云、严佑民带头发了言。我也集中了几位

同志起草我的发言稿。后来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没有再开大会,发言稿没有写成,也就没有发言。

## 关于“天安门事件”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我正好在北京医院住院,参加了守灵和向遗体告别。对于周总理的治丧规格低,许多住医院的老同志都有意见,我也有意见。在医院里我见到吴庆彤(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向他提出我的意见,并请他转告华国锋。那时我不知道是“四人帮”在捣鬼。

由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逝世无限悲痛。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大人民群众在全国范围内自发地悼念周总理,寄托哀思,同时也发出反对江青、张春桥等的呼声。

早在3月中旬,华国锋批转来王洪文对福建陈佳忠给他来信的批件。王批:“建议公安部派人弄清反动诗词的来源。”华国锋批“立即派人协助省委查清反动诗词的来源”。我派部边防局干部侯西斌、黄斌奎去福州进行查处。

这是我最早收到中央要我们办的这类事的批件。来信是一首古体诗词,内容是悼念周总理,影射、反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在批件上定了性,也在我头脑中定了调。

3月下旬,南京的学生、工人因为对《文汇报》3月5日删去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题词,及在后来又发表了指桑骂槐反对周总理的文章表示抗议,举行了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贴出责问《文汇报》,反对江青一伙的大字报。江苏省公安局来电话问我们怎么办,我要他们通过省委直接请示中央。后来我们收到中央发的“南京发生政治事件”的代电,我电告江苏省公安局,传达了中央代电的内容。不久江苏方面又来电话报告: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车厢上写有“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等大标语。

我一直坚信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是正确的,认定反对毛主席和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则是错误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就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对于江青一伙的横行霸道,我是有所耳

闻,也有过各种疑问。可江青与毛主席的特殊关系,使我一直认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林彪集团垮台后,尤其是“十大”以后,毛主席把江青一伙放在党中央重要位置上,权力越来越大,他们经常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指挥全党,有极大的欺骗性。毛主席关于批评江青一伙是“四人帮”的指示在当时并没有传达给我们,只要不是中央文件和报纸公开确定的我则认为不可信,怕犯错误。对江青一伙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的宣传,我以为就是党中央的声音。在出现一些反常的“混乱状态”时,我没能认清这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的起来向他们斗争的行动,主观上接受了“有人利用群众怀念周总理的感情,分裂党中央”的论断;也主观的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安定团结”,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只能起到煽动、扩大事态的作用。在接到中央发出的代电后,我认为这是一起分裂党中央的事件。我在来电记录上批:这些标语是反动的,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并查清幕后策划者和为首的。

3月31日,华国锋在核心小组会上提出:南京发生了政治事件,南京同北京有串联,你们要



王洪文

掌握情况,要注意天安门动态。第一个送花圈的是上访的公安人员,要查出这个人来,要保证公安下属单位不去天安门送花圈,不去凑热闹;天安门有闹事迹象,天安门在你们鼻子底下,你们有责任及时向中央反映天安门的动态。

我们立即向各局、各部属单位进行传达。当我得知部属329厂送了花圈到天安门,认为厂领导不执行华国锋的指示,把329厂的负责人找来批评了一通。

从3月底开始,首都群众自发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赋诗词,悼念周总理。4月4日是清明节,数十万群众涌向天安门,有的排着整齐的队伍送花圈,有的朗诵悼念诗词,有的发表演说,同时出现了反对江青、张春桥的诗词和标语。中央政治局讨论,认为这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干扰破坏斗争大方向。当晚,北京市清理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诗词、标语。

“天安门事件”的清查处理是中央交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负责的。第一个送花圈的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找到并拘留。公安部按华国锋指示,这期间每天派十几个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动态,核心小组成员也轮流到天安门广场观察情况,随时将观察到的情况向华国锋汇报。

4月4日早上,祝家耀告诉我,王洪文在凌晨和他一起去了天安门,并要他把天安门广场上的诗词拍下来,以后好破案。祝说他已经转告了市局。我知道他过去在上海是和王洪文一起的造反派兄弟。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直接找他,我没说什么,也没问什么。我也不能说什么。

4月5日上午,天安门广场聚集了许多群众,他们对4日夜里卫戍区和市公安局收走广场上的花圈强烈不满,有拦汽车,砸外国记者照相机等行为。华国锋来电话,要我们马上派人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情况并及时向他汇报。祝家耀提议:中央领导不便到现场,我们用摄像机录下来,如果中央领导要,可以送去。我没多考虑祝家耀什么用意,认为这的确便于掌握广场动态,便于汇报情况,就同意了。

我把摄像看得很简单,其实当时的设备落后,这是个边防用的远距离摄像机,很笨重,要安放在历史博物馆楼顶上才能录。历史博物馆是

卫戍区守卫的,要上去必须经过吴忠同意。我们先同吴忠联系好,又请示汪东兴。汪要我们请示华国锋,但没有找到。偏巧机器又发生了故障,需要修理。

我和于桑、祝家耀、张其瑞一起先去了广场南侧的北京市公安局指挥所,又到了人民大会堂,看到广场上很乱。午饭后看到指挥所门前的汽车被烧,感到事态严重了。我给华国锋打电话汇报,是他秘书接的。同时我要人民大会堂的刘健向汪东兴报告。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我和祝家耀到了卫戍区,见到了吴德、吴忠、刘传新。吴忠、刘传新向我们讲述了宣传车被推翻,送饭车被砸的情况。他们对我们说,中央有交代,晚上采取行动,吴德正在起草讲话稿。我知道晚上的行动毋需我们参加,就回到部里。

回来后,摄像机已修好,摄录人员也换上了军装,但还没有找到华国锋。看看天快黑了,吴德已开始讲话,我就同意把机器搬上历史博物馆录了像。后来录像带有人看过,告诉我,模模糊糊什么也看不清。

4月5日晚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发表广播讲话:“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十时半,一万民兵、警察带木棍封锁天安门,清理广场,对滞留在广场上的群众进行了殴打和逮捕。

4月7日电台广播中共中央两个决议:一、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中共中央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矛盾。根据毛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 追查“谣言”

“天安门事件”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华国锋部署公安部负责追查“谣言”。

当时把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流传的“总理遗言”、群众反映的不满情绪,以及没有公布的内部消息都作为谣言进行追查。我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请示华国锋:如果追谣言追到领导干部怎

么办?华国锋指示,“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核心小组根据华国锋的指示,起草了“电报通知”稿,经华国锋签发。公安部工作以“追谣”为重点,在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群众性“追谣”行动。

早在3月中旬,王洪文、华国锋就批示我们追查福建省发生的“反动诗词”,从4月到7月,我们先后接到许多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批来的、中央各部委报来的、北京市公安局报来的“谣言”。有的转回各部委去处理,有的批到各地公安部门处理。有上面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的,还有单位要求我们派人协助的,我们也都派了干部去协助处理。科学院半导体所“追谣”审查冯应章(与邓楠有关联),纪登奎、孙健批示要我们派人协助,我执行了。三机部303所审查了与邓朴方有关联的康辉,是按三机部报来材料,我同意该部自己审查。

在“追谣”过程中,部属329厂负责人路群找我反映,该厂傅凝到叶帅家给叶帅送去一份“总理遗言”。这时我才知道329厂有个叶帅抚养大的傅凝。我想此事不宜扩散,便要路群找傅凝个别谈谈,不要把这事同别人说。后来路群把谈话情况写信告诉我,我阅后存放在文件箱准备退给路群,因路群到上海治病就搁下来了。这信没有给任何人看过,这事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后祝家耀派工作组到329厂,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得到的消息,并把傅凝的情况汇报给王洪文了。

5月初,核心小组会上向华国锋汇报了追查谣言的情况,也汇报了群众对“四人帮”的不满言论。华国锋指示公安部以追查“总理遗言”为重点,要日夜加班。我请示其他谣言还查不查,华说:“抓住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其他就迎刃而解了。”经核心小组研究,理解为抓住追查“总理遗言”这个重点,带动对其他谣言的追查。经过发动群众追查,我们掌握“总理遗言”的线索目标集中到了杭州。华国锋指示核心小组成员亲自去杭州督促,限期一周破案,说坐火车来不及就坐飞机去。核心小组决定派祝家耀去杭州。

5月19日,中央通知我 and 祝家耀去汇报。在政治局会上由祝家耀汇报了到杭州追查“总理遗言”的情况。汇报到“总理遗言”的执笔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时,张春桥说:“你们现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面上的,沉在水底的你们没有发现。”有人(是谁记不清了)附和道:“这些人是有后台的。”

当汇报到“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一些传言时,汪东兴说:“有些受冲击的老同志对发生‘天安门事件’幸灾乐祸,杨尚昆买酒庆祝嘛。”会上决定在杭州逮捕8人,名单是华国锋提出的。为了保密,决定由汪东兴通知铁道部安排一节包厢列车,把拘留的人从杭州送到北京。

在这次政治局会上,我请示怎样处理“追谣”中报来的涉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有关材料,报请谁批。会上决定:按政治局委员的分工分别报送,国务院各部委方面的报送纪登奎;人民日报、新华社方面的报送姚文元;中组部的报送张春桥;统战部的报送吴德;军队的报送陈锡联。以后我就是按这样的分工分别将有关材料报送给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陈锡联、吴德。这次政治局会上决定全国继续批邓反右,停止群众性“追谣”,“追谣”转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发个电报通知,我照办了。

文革后期党内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我这一级干部虽为高官,但上不知“宫内事”,下不明百姓心,只为了全力以赴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作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对自己已经身处悬崖边沿还浑然不知。

### 公安局长座谈会

1975年10月,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县市地方看押犯人的武装警察交公安部门后,决定由公安部和总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公安局长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后勤部长会议,讨论武装警察的供应问题。

1976年5月5日,华国锋在部核心小组会上指示:“毛主席关于‘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你们要好好研究。”同时在会上提出:“同总参一起召开武装警察供应工作会后,把各省、市、自治区的公安局长留下来开座谈会,研究毛主席最新指示,研究敌情。”并指示座谈会首先要组织大家学习中发[1976]4号、5号文件。

为了落实华国锋的指示,开好座谈会,核心小组研究确定:留下省、市公安局(局)长参加会议,民警处长回去,调各厅局办公室主任来参加

会议。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敌情,贯彻华国锋关于“会议不要业务性太强,要有思想性,要学好4号、5号文件”的指示,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会议还决定座谈会由核心小组集体领导,凌云、张其瑞主持会务工作,核心小组成员(只有杨贵受中央委托带工作组去河南,不在部内)尽可能参加各组讨论,多听各省、市、自治区同志们的发言,多开按地区分组的召集人碰头会。

1976年6月14日,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召开。

首先由我以上述核心小组讨论决定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动员讲话,接着就是组织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学习讨论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最新指示。

学习讨论中,大家话题多在对“天安门事件”和“追谣”以来社会上的种种情况、现象、传言的议论上,与会的同志提出了“这样泛泛而谈没有重点”,经召集人碰头会上汇总,秘书组把大家议论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以下5个主要问题:

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与反革命联系起来;

敌人制造散布谣言,社会上有市场,内部市场也多,为什么?研究谣言的欺骗性;

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当前斗争形势,斗争矛头应对准谁,斗争手段有哪些变化,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靠什么,对走资派怎样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在党内,公安机关如何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在召集人碰头会上把集中的这些问题念了一遍,让大家继续讨论。

后来在碰头会上反映出主要分歧意见是对党内走资派能不能侦察,怎样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成为党内资产阶级了,可以侦察;有人认为走资派的活动影响社会治安,可以在治安范围内侦察;有人不同意在党内搞侦察。

我表示:历来党内路线斗争都是毛主席指出而不是侦察出来的,党内不应该搞侦察,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再讨论。

对于怎样结束会议,祝家耀在核心小组会上提议写“会议纪要”,大家都同意。我想华国锋没



有时间参加会议,按期送上简报后还没有得到他的指示,可以写个“纪要”送给他看看,请他把关。核心小组讨论时决定由凌云负责起草“会议纪要”。

“纪要”稿起草后,立即送华国锋审定。送后我又打电话请示华国锋:“送去的‘纪要’稿行不行。”华国锋在电话中说:“写‘纪要’要慎重,过去中央开会搞‘纪要’都经毛主席审批。你们写‘纪要’,又没有好的观点,毛主席哪有时间审批。你们收到12号文件后,组织大家再学习4号、5号、12号文件。”我请他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讲话。他说:“没有时间,不讲了。你们自己讲。”还说:“你们做事要慎重。过去慎重做了几件好事,如特赦战犯、破获苏修特务李洪枢,大家高兴。如果不慎重,以后层层检讨就不好了。”还说:“这些话是同你们商量的,你们把我讲的话整理了到处传达,我就不敢讲话了。最后你们可以提提意见,让各省、市、自治区自己去研究。”过了三五分钟,华国锋的秘书来电话说:“走资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时我又提出请华国锋在会议结束时作指示,他说:“你们自己讲讲就结束会议。”又说:“华国锋还兼着部长呢。”我把华国锋和他秘书的话如实向核心小组传达。当时大家对“华国锋还兼着部长”这话都摸不着头脑。

学习中央4号、5号文件和以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指示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来研究敌情,是华国锋部长的布置。以这为课题讨论已经混淆了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认识。我在会议过程中思路始终机械地停留在按华国锋的指示定了的基调内,思想深处没有好好琢磨。对于华国锋及其秘书在电话中突然的变调和含蓄的暗示,我没有理解并随之转变。核心小组中也没人提出有新的理解。

核心小组再次共同学习了中央4、5、12号文件,又讨论了怎样结束会议,当时大家都没有超脱会议

的程序“有开始、有结束”的框框。决定“纪要”不搞,由我在会议结束时讲话,讲话稿仍由凌云负责起草。讲稿是在“纪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删除了“纪要”中“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这类的话,但基调没有变。谁知日后竟成为我“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的罪行。

毛主席把反对“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提法进一步上升到“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已造成党内思想极大的混乱。华国锋又说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课题”,要我们召开公安局长座谈会。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之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经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动达到又一高潮的背景下,核心小组全体成员对以毛主席这一指示为会议的指导思想研究敌情,没有什么分歧意见。公安部门是专政部门,华国锋授意讨论这个问题,本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公安战线上把党内走资派与研究敌情连起来,是严重的错误。当时认识不到,是我政治思想水平低。党的宣传媒体天天灌输“党内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等极“左”论调,对我影响很大,以致不能谨慎分辨上面指示中对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已经混淆。这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最深刻的教训。

## 结 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参加了治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委员会,也参加了守灵。这是我最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为了保存毛主席的遗体,华国锋让刘湘屏找我,要我向外省市的公安部门找几个个头大的死刑犯尸体交卫生部门做试验。10月2日,我去华国锋住地汇报,请示对外省公安部门的来人怎么讲法,华说就讲“科学实验”。接着他问我对“天安门事件”怎样看,我说:有的是诚心诚意悼念周总理的,大多数是看热闹的,闹事的是少数人。他说: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接着他问我杨贵和祝家耀工作的情况,我说:他们的工作都很积极,杨贵工作上较老练;祝家耀看问题有些偏激。我建议有机会让他们出去看看(当时有罗马尼亚、朝鲜的公安部门邀请我们回访),过去在基层缺乏对外界的认识,出去看看对他们今后工作有好处。他说:“不见得。”他又问我是否安心在公安部工作。我因曾数次提出过要求回部队或者去别的生产部门工作,他都没同意。只好说“在一天就兢兢业业干一天”。

10月7日,杨贵说同我到秦城监狱看看防震工作搞得怎样。我早有这个想法,便一口答应“好。咱们去一趟”。杨贵又说“要祝家耀一起去吧”。我心想用这么多人去吗?但他既已说出,就同意了。在秦城监狱吃过午饭,本想再去从外地搬回北京的五七干校看看,接到纪登奎打来的电话,要我同杨贵立即到国务院办公厅去。我们到后,纪登奎就问:“街上都传开了,你们听说什么没有?”我说:“我们一早就去秦城了,没有听到什么。”纪登奎接着问:“祝家耀怎么样?”杨贵说:“就是为了这,我们把祝家耀带到秦城去的嘛。”我还在莫名其妙的时候,纪登奎说:“前天晚上已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了。”杨贵忙说“坚决拥护”,我也表示“坚决拥护”。接着纪登奎哈哈大笑,并说:“你们是公安部,先告诉你们,中央另找时间传达。”他还告诉我们:中央已叫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来北京,马表示保证上海不会发生什么问题。还说:王洪文的对立面,上海的另一个造反派头头某某某表示上海的局势可以控制。这时纪登奎拿出毛主席手迹“你办事,我放心”的复印件给我们看,并说:“这是毛主席写给华国锋的,他谦虚,过去一直没有拿出来。现在国锋同志当党的主席。”最后他说:“你

们回去对祝家耀注意一下。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时我方明白纪登奎早就把粉碎“四人帮”的事告诉了杨贵。

回部后我同杨贵商量对祝家耀如何注意,决定由杨贵的秘书来监视。

第二天,在5号楼办公会议上,我才知道于桑、严佑民已去中央搞“四人帮”专案了。杨贵接到于桑电话,指名要6个干部去搞专案。我看到名单,提出是不是还按军、干、群搭配调换几个,杨贵不同意。后来我放弃了自己的意见,按于桑的提名调走了干部。这时我竟对中央已经撇开我找他人直接布置工作毫不知晓,甚至还不注意。

11月初,湖南公安局送来了一份反华国锋的案件报告。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这份报告时已送来三四天了。我看后除了批复他们立即严肃处理外,当即电话报告华国锋。是他秘书接的电话,说“华主席已经处理了”,他狠狠地训斥了我,说“你心中还有没有华主席”。我是最遵守组织纪律的人,一贯尊重领导。这对我的情绪打击很大,感到压力沉重。

12月底,纪登奎把核心小组成员叫去,除了讨论释放因追查“总理遗言”被抓的人外,纪登奎说:“你们公安部有人,如你们办公室主任田野,对粉碎‘四人帮’有抵制行为,性质是严重的。”又问凌云(负责祝家耀专案审查)“祝家耀表现怎样,揭发了什么问题?”凌云答:“揭发的主要是杨贵的问题。”纪登奎说:“如果他揭发杨贵的问题,那你施义之的问题就更严重了。”我对纪登奎这样的推理觉得很奇怪,心想:杨贵和祝家耀是中央学习班的同学,同时被派到公安部,来部后又长期住在一起,相互了解的当然多了,与我有什么关系。怎么祝家耀揭发了杨贵的问题,说明我的问题更严重了?

1977年5月,我被停职审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将对我的审查结论处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是刘复之签发的。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了批复。

至此,我入党47年,入伍47年,比生命还看重的政治生命——党籍、军籍被开除了。每月给生活费150元。■

(责任编辑 黄 钟)

#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 鲁琪 回忆 鲁晓纾 整理

## 何堪回首

何堪回首，在这里又不能不回首。

记得是1955年的初夏，我跟随一支开进北大荒的部队（农建二师），在荒原里踏查（我想写一部垦荒的小说）。一天，我正在师部里参加他们的党委会，突然收到省里的一封催我立即回省城的电报。什么事？没说。没有说，就说明是电报里不能透露的事情，而“立即”，又说明是急事，我带着忐忑不安和狐疑，回到了哈尔滨。

到单位一问，说组织上要找我谈话，我立即去了。谈话很严肃，直截了当地要我交代与徐放的关系，并把所有往来信件和有关材料全部交出来。

徐放，这位我的好友、老同学，他当时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是个“老延安”。那阵子，我正为他的事情疑惑不解，因为不久前发生了一件我做梦也不曾梦到的事情——《人民日报》上说，徐放是反革命！我怎么也不相信。但《人民日报》摆在面前，“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第二批材料，那大字标题，那触目惊心的批语，尤其材料中“徐放”两个字，使我惊呆了。

信？还是不信？报纸是《人民日报》，这无疑代表党中央，让你不能不信，但这个徐放，怎么又可能是个反革命？我说不出来，只有困惑。

听到召我“立即回城”原来是为这事，我心里倒是坦然了，要我说明和徐放的关系，我觉得这事很简单，我们就是老同学，朋友关系，一说就清楚了。

之后，我按组织上的要求写了一份材料，把尽可能找到的信件和有关材料，甚至《北大荒的故事》这本诗集，也一并交了上去。我以为这就结束了。

材料交上去没几天，我突然遭受了一次抄家，将我的文稿、信件、书刊，一切认为可疑之物都抄走了，接着就是对我进行“隔离反省”，然后一个专案组成立了，省委派了一个处长任专案组

组长，这个人可真是个好同志，工作积极，不辞辛苦，大会小会不分昼夜地“谈话”、审讯，但他的想象力过于丰富。

一次，他拿出两枚从我家里抄走的子弹问：

“这是什么？”

“子弹。”

“你怎么有这个？”

“我有枪，是组织上批的，有枪证。”

“枪呢？”

“已经交给组织了。”

“那还留下它干什么？”

我只能苦笑：“不干什么，这是两颗臭弹。”

他看了看，弹上果然有撞针击过的痕迹，便不再出声了。

又一次，他问我：

“你那收音机有短波？”

“有。”

“你听短波？”

“有时听。”

“为什么听短波？”

我怔怔地望着他，一时回答不出来。难道这也是问题？他死死地瞅着我，等待回答，我只好说：

“组织上并没有规定，所的干部都是不准听短波。”他哼了一声没再往下问。

从那满是怀疑的眼光里，可以看出他并不满意我的这种回答。我明白了，以他的丰富想象力，一定是觉得，我不仅是个“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说不定还是个潜伏下来的伺机搞暗杀活动的特务。

问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于是动用公安机关下了“逮捕令”，将我就地关进文联地下室的一间阴湿的小屋。此后便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揭发大批判的群众运动。专案组发动群众，从我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工作总结和报告、讲话，甚至日常生活言谈中寻找材料，不证明我是



在王道书院读书时，鲁琪与徐放在学校大门口合影。（左为鲁琪，右为徐放）

个深藏不露的反革命誓不罢休。有人是为了“划清界线”，其中也不乏一些擅长体会上级意图，似是而非的“积极分子”，在他们的口中笔下，想把一个人从红的描成黑的，从革命描成反革命，并不困难。那些无中生有、牵强附会、歪曲事实的所谓材料，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摧毁我，专案组动员我妻子离婚，那位组长十分“同情”地对她说：“组织上已经掌握，鲁琪不但是胡风分子，而且是个带着黑线混进革命队伍里来的特务，你这么年轻，今后怎么跟他过下去，这一辈子不是完了吗？”同时还表示，只要她同意离婚，组织就可给办手续。但我妻子坚定地说：“你们说鲁琪是反革命，可我不知道，就算是，我也认了，我要跟他过一辈子。”

问不出口供来，逼离婚又不成，专案组既无奈又不甘心，那位组长气哼哼地对我说：“你这个人太狡猾，我知道你蹲过监狱，坐过牢，可你拿对付日本鬼子那一套来对付我们，那是妄想。”

这话是不错的，对付敌人是可以欺骗的，但现在面对的是组织，是自己信赖的党，怎么会不讲真话呢？但任凭你真话讲了千百遍，得到的只是冷漠和冷笑，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和悲哀，没有经过的，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如果有人在这种痛苦和悲哀的绝望下自杀，该不应说他是自绝于人民吧？

经过半年多的审讯、隔离反省、内查外调，我这个黑龙江唯一的“胡风反革命分子”终于给挖

了出来。

没人听你的申辩，你讲的是不是真话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已经成为这场运动的一个成果，成了一些人的政治功绩。一时间，省内的报纸、期刊，写社论、发文章，出专刊，“知情人”纷纷站出来揭发、批判、总结经验、教训，长诗《鲁琪——北大荒的狼》更是让群众认清了鲁琪这个“反革命分子”“狼”的嘴脸，这是当时黑龙江政治生活中的一件不小的事件，让黑龙江的文艺界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 我和徐放是同学、挚友，但没见过胡风

把我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有两点依据，其一就是我与“胡风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胡风给毛主席的那封著名的“三十万言书”的参与写作者——徐放的关系。那么，我和徐放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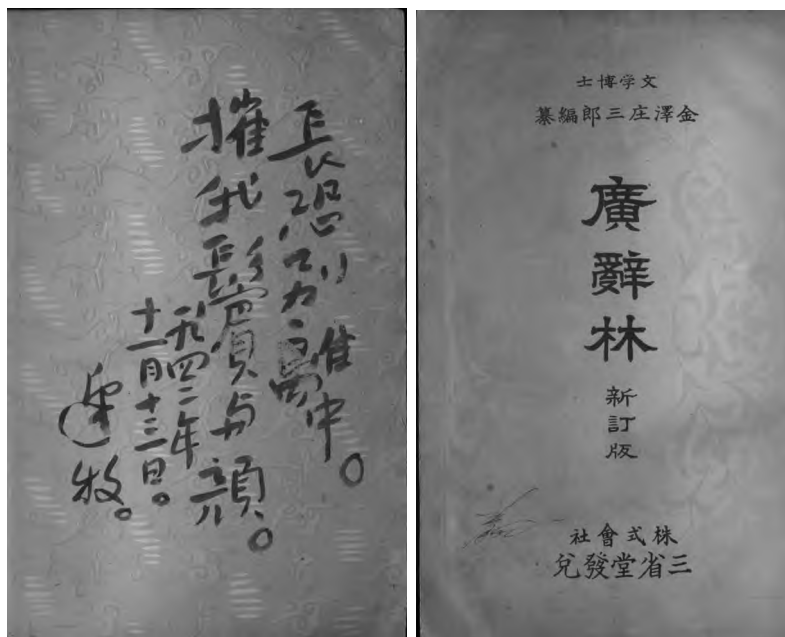
1941年与1942年间，我和徐放一同在伪满长春的王道书院读书。我们俩同在一个班，他大我两岁，也才刚刚二十。

王道书院是郑孝胥创办的一所文科大学，那时坐在课堂里读的就是“诗云”“子曰”，这个“经”，那个“经”，还要读什么“日本史”、“满洲史”，“东洋思想史”。

课堂里的书没有心思读，却如饥似渴地读那些悄悄从地下传来的苏联文学作品，如《母亲》、《静静的顿河》、《夜未央》、《克鲁泡特金自传》……以及鲁迅、巴金等人的作品，还有那不知多少人传读过、几乎零碎了的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黄昏后，我和徐放常漫步在长春大马路那条长街上，拖着时长时短的身影，默默地走过了一盏街灯，又一盏街灯，累了便进一家小饭铺，坐在长板凳上，喝碗小米粥吃两张豆芽菜的薄饼。

一个人失掉什么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失掉了祖国，没有祖国，你的一切都没有，甚至自己的姓名。那时，我们东北人过的就是这种没有祖国的



《广辞林》的扉页与书后衬页。1942年，徐放“失踪”前在鲁琪的这部《广辞林》书后衬页上写道：“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弟收”（徐放大鲁琪两岁）。

日子。为了避免每天早晨哼哼呀呀地唱：“天地间，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嘟嘟囔囔地向那个由“友邦”升格为“亲邦”的日本天皇遥拜，也为了躲开日本教务长和学监的监视，我搬出了学校宿舍，住在一家公寓里，徐放则寄居在一家书店中。

彷徨、苦闷、郁愤，不知往哪里发泄。手中没有枪也没有炮，仅有一支笔，于是便把满腔的郁愤，全部倾注在这笔上了，写诗、写小说、写自己想写的。

徐放的写作比我早，也比我写得成熟，1942年他就出版了诗集《南城草》，描写日本统治下的东北人民的苦难生活。就在这年秋天，有一次他突然对我说：“能找个组织就好了！”

我明白他的意思，但我不知怎样回答，只怔怔地望着他。是呵，有个组织就好了，但谈何容易！

没几天，一天傍晚，他匆匆忙忙来公寓找我，好像有什么事，但又没谈什么事，东拉西扯了一阵，临走忽然拿起桌上的墨笔，在一本日文词典的书后衬页上题下了几个字：

“长恐别离中，摧我鬓与颜”

1942年11月13日

我端详了半天，当时也没明白他题了这样几个字，是什么用意，此后，一连几天他没有到学校

上课，我们也没有见面。

日本人教务长田岛，知道我与徐放常在一起，便找我去问，徐放为什么不来上课？我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回答说：“可能是病了。”他让我去找，我也正想去看看，于是课后就到那家书店去了。

到那里没有找到人，只有一张空床。床上有被褥，桌子上有几本书。我从枕下发现了一个笔记本，本子里没记别的，只有前几天的几页日记。这几天的日记只写了一个内容，说他失恋了，如何如何痛苦，简直就是痛不欲生，不想活了，想自杀，去投河、投湖……

我揣了这个笔记本离开了书店，回到学校把本子交给了田岛。

田岛接过本子翻了一阵，冷冷地瞅了我几眼，什么也没说。从此，徐放失踪了。

我心里明白，徐放不是什么失恋，也决不会去自杀，因为他不是那种人。想起不久前他说的那句话，想到他忽然给我题的那几个字，我知道他是“走”了，正像他的那首诗《走》：

今夜/我们俩啊/且乘万里风雪/做他万里梦/  
一脚/把这沉闷的/天地踏破！

他去“做他万里梦”了，去找那个“组织”了，他为了“把这沉闷的天地踏破”，去踏上一个吉凶未卜的征途，寻找自己的祖国去了。我和徐放就这样分离了，一别再无音讯。

徐放“失踪”一年多之后，1944年的春天，辽宁老家盖县的“桃园工作”案件事发，日本人大肆逮捕学生和反满抗日人士，从辽宁盖县一直到黑龙江的双城都有人被捕。我在长春被捕，先是在伪满“新京”警察厅审讯，后转到伪满奉天第一监狱关押，直到“8·15”日本人战败投降。

从监狱出来，我便在革命队伍里做报纸杂志的编辑工作，这期间一直没有徐放的消息，直到1950年的一天，我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一首署名为徐放的诗，我们才互相通起信来，也正像后来定我为“胡风分子”的结论中说的，“从此鲁琪与徐放又接上了关系”。

也就是通过这种联系，我才知道自从分别后

他寻找“组织”的种种坎坷经历。他先是想尽办法通过了“满洲国”的“国界”山海关跑到了北京，然后又去了重庆，历经种种磨难后，发觉这些地方都不是他心里需要的那种“组织”，最后，他决定——去延安，在那里，他终于寻到了“组织”。

就是这样一位革命者，当我得知他被认定为“反革命”时，无论如何也是想不明白的。更让我做梦也想不到且哭笑不得的是，因为我的这位革命的“反革命”朋友，我自己竟然也成了“反革命”。

那时，我在工作之余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出版了几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上海新华书店出版，后又由新文艺出版社重印的诗集《北大荒》。当时徐放正在编一套《诗丛》，他看见了，就向我邀稿，于是《现实诗丛》里就有了我的一本《北大荒的故事》，这也是我参加“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个证据。

1953年，我到北京参加第二次全国文代会，我与徐放才第一次重新见面。这期间，通过他，我结识了牛汉和鲁煤。徐放是我的老同学老朋友，他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何况我们又都是党员，又都是文艺界的人，既无芥蒂，更无戒备，所以一见如故。

是这一次，也许是另一次我到北京开会，有一天我们一起上街，路过胡风家门口，徐放说：“胡风就住在这，我们进去看看他。”

我与胡风并不认识，但他是文艺界前辈又是民主人士，去看望一下，也是应该的。

那天胡风不在家，说是去参加个什么会了。他的夫人梅志在家，我随徐放来到胡风的书房，看样子他们关系很熟，徐放还很不见外地从书架上拿了本书（什么名字记不得了）送给了我，然后我们几个人又随便说了些话，就离开了。

过后，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提醒似地向徐放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胡风的文艺思想有问题，党内一些人在批判他，你要注意些。”我关心的，只是徐放不要受什么牵连，但胡风在文艺思想上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批判，我也不清楚，至于其中的内幕，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我更一无所知。

徐放是这样回答了我：“这我知道，胡风是党外民主人士，是对文艺有贡献的前辈，我们党应该团结他，我和牛汉、鲁煤与他交往，也是做团结

工作。你放心，我已不是小孩子了。”

所有这些，就是我与徐放及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全部关系。

我被关押后，曾被反复讯问：“你和徐放是怎么密谋反党的？！”我说：“我从未反对过共产党，徐放也不可能反党，我们也从没在一起进行什么‘密谋’。”

徐放参与向毛主席进言“三十万言书”，我的确不知晓。徐放个性正直豪爽，敢作敢当，从不拖累别人。当年他从学校逃走，都不曾和我讲一声，如今他冒死去写“三十万言书”怎么可能来知会我？

徐放在北京被“揪”出来后，投进了秦城监狱，一关就是十年，然后又被遣回老家辽宁监督劳动，而我在黑龙江被一张“逮捕令”就地关押在文联地下室黑屋子里，反省、交代，交代、反省。就这样，我和徐放又一次失去了联系。

我们两次分离都正值风华正茂，且命运未卜，待几十年后，我们再一次相见时，无论是容貌还是心灵，时光都已将我们雕刻成饱经沧桑的老年人了。据说，监狱释放徐放时，他还不肯出狱。他说：“我没错，你们为什么要关我？如果我错了，为什么还要放我？”这个倔强的人还不知好歹地向人家讨说法呢。

## 我的文艺主张

自参加革命后，我先是创办并主编了共产党在盖平的第一张报纸——《盖平报》，然后在安东《白山》杂志社当编辑。来到黑龙江之后，先后任《西满日报》编辑、嫩江省文协筹委会创作组长、黑龙江省文联创作部长。1951年，任黑龙江省文联副主任（正职由省委领导兼任），主持黑龙江省文联常务工作。我之所以成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另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我的文艺思想。

我自己从未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主张做过理论性的总结，倒是我被“揪”出来之后，报纸、刊物上集中发表的诸多批判我的文章，还有那些从前被我“蒙蔽”的群众的揭发，替我总结了许多。他们从我的小说、诗歌、公开发表和未公开的报告、讲话、讲座、甚至私人谈话中，找到了许多“证据”，我的这些文艺主张作为“反革命证据”集中发表在《黑龙江日报》及《黑龙江文艺》批判我的“专辑”（1955年第22期）

上。综合起来,大致如下:

一、作家要有代表作,仅会写“演唱材料”的不是作家。作家的创作要有热情、要大胆想象。

二、文艺创作有其自己的规律,这种规律应当得到尊重,允许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有个性。创作不能“赶”政治任务,不能用行政命令来指导创作,否则写出的东西就是公式化、概念化。

三、关于“体验生活”。所谓生活,不应仅仅存在于工农之中,生活到处都有,看你怎么体验。作家应该写自己熟悉的生活,要有真情实感。

四、关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主张文艺不能只为工农服务,还要照顾到知识分子的需要和感受,要写知识分子的生活。

五、文学要讲究语言美。创作可以写“山清水秀”,可以写冷门,可以表达诗一样的意境。

## “黑龙江怎么就不可以有一个胡风分子?”

政治运动就其本质来讲,和战争是一样的,内幕只有发动它的少数几个人知道,天地之间的芸芸众生都是他们用来博弈的砝码。

当初,我从报上看到胡风、徐放和他周围的人竟然是一个“集团”,除了疑惑和吃惊,心里还隐隐地感觉就要有大事发生。当省委将我紧急召回,并让我交代和徐放的关系时,更证实了我的感觉。

凭经验,我把一些日记、和徐放之间的来往书信中,谈及文艺观点的都烧掉了,尽管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反党”内容,都是一些纯学术上的探讨,烧掉非常可惜。但为了安全起见,也只得这样做了。所以,当突然遭到抄家时,专案组并没有抄到非常有“价值”的东西。

正像那位专案组长所说:“你蹲过日本人的监狱,太狡猾,但你骗得过日本人,却骗不过我们。”

他们反复问我:“你是怎么跟胡风集团联系的?跟徐放是怎么密谋的?”

我也反复地解释:“我没见过胡风,也不认识他,他是不是反党,我怎么知道?但我从未反对过党,徐放也不会反党……”

我不承认没关系,“外调”会是一种很管用的

手段。从我的老家盖县,一直“外调”到徐放、牛汉、鲁煤、严望等人,这几个人当时蹲监狱的蹲监狱,关押的关押,受审的受审,根本没有“串供”的可能,但得到材料没有一样能够证实我和他们的“集团”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党,相信党组织是重视证据的。既然在我这里什么反党的证据也没找到,怎么就会定我为“反革命”呢?

我主持黑龙江省文联工作时,年仅27岁,已有小说集《炉》被介绍至欧洲,而且读过大学,懂日语,在东三省文艺界是比较突出的,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文凭和能力俱佳,所以当时在沈阳的“东北局”和北京文艺界多次想调我去工作,但黑龙江一直都不肯放。哪知就连这一点也被颠倒黑白地说成是我积极“活动”想去北京,后来由于接了“主子胡风的指令,便安心地成了他在黑龙江的执行人”。

什么环境下,也不乏很正直的人。给我定案时,有一位同志曾说过这样的话:“定鲁琪为胡风分子好像不太够。”

但当时主持黑龙江省委工作的主要领导听了,十分不高兴地这样说道:“怎么?全国都有了,难道黑龙江就不能有一个胡风分子吗?他鲁琪怎么就不能是?”

领导都说“是”,还有谁敢说“不是”?就这样,在没有任何材料、证言等证据的情况下,我就成了板上钉钉的“反革命”了。

很久的后来,我想明白了:证据不证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要你“是”,所以你一定就得“是”。在这场灾难中,像我这种企图做挣扎的人,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因为这是一种掺杂着个人利益的政治需要,是政绩。这种政绩给我个人命运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剥夺了写作和说话的权利,还有长达25年的流放。那段漫长的岁月里,我的唯一的想法就是:带着家人活下去。

我一夜之间从革命同志成了“反革命”,是要我成为“反革命”的人的政治需要,徐放何曾不是?胡风又何曾不是?

这样的往事再不堪回首,今天也要回首,这种回首不单单是为自己,也是为后人,是反思,更是纪念。■

(鲁琪为黑龙江省文联原主席兼党组书记)

(责任编辑 黄 钟)

# 我所知道的颍上县“特殊案件”

○ 王冠群

1958年到1961年,由于高举“三面红旗”,大刮“共产风”造成大饥荒。从1959年秋季开始,安徽颍上这个七十多万人口的农业县,绝大多数农民在4189个公共食堂就餐,每人每天的主食是“五大两”(即半斤原粮)的低标准,当时有这样的顺口溜“群众进食堂,两眼泪汪汪,打饭用盆罐,顿顿照影汤”。饥饿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有的全家死光,致使全县总人口急剧下降。1958年底,全县总人口为154691户、703940人,到1961年底全县还有149847户、617031人。与1958年相比,减少4844户、86909人,分别下降3.13%和12.34%。三年困难时期,全县农村妇女因长期饥饿而导致高度浮肿、子宫脱垂等疾病,基本上没有生育。

在生活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一些人为了继续生存下去,以青苗野菜充饥,极少数人开始偷偷地吃死人肉,这种极其反常的情况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党委和政府,公安机关为了掌握社会动态,出于职业习惯开展了调查。初期我们把食尸事件叫“破坏尸体案件”,因有“尸体”二字,一则听起来不雅,二则怕有损当时的“大好形势”,后改称为“政治破坏案件”,这个名称虽然把“阶级分析”的色彩包含了进去,但把这类事件作为“政治破坏”未免太“左”,而且与事实也不符,最后由上级统一定名为“特殊案件”。

1960年经县公安机关处理的这类“特殊案件”共49件50人,其中逮捕22人,判处死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7人,关押期间死亡13人(来时都有浮肿,看守所生活也困难),劳动教养3人,刑事拘留5人,扣留审查后教育释放20人。这50人中,男性34人,女性16人。其年龄情况是:16岁的2人,20-29岁的7人,30-39岁的13人,40-49岁20人,50-59岁的6人,60岁以上的2人。分析这49起案件,具体有以下四种类型:

1. 故意杀死自己的小孩而食其肉。城郊区林

拐乡洪海子村女社员高士英,时年48岁,于1960年1月12日将自己的亲生女儿(6岁)勒死后,将肉煮吃,发案后被依法逮捕,并以杀人罪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将生活困难,杀死小孩的目的,是为了保住其他家庭成员不被饿死的事实全部隐瞒,而罗列了重男轻女等不实之词,欺上瞒下。

2. 杀死别人的孩子,肢解尸体自食并出售。1960年3月12日江口镇居民刘陈氏(女,48岁),用花生米将其亲侄儿(乳名马驹,男,4岁),骗到自己家中,随按倒在地用手卡死并肢解了尸体,除自己食用外,又冒充煮熟的猪肉在街上出售。剩余的部分仍保存自家床下。马驹的父亲刘在志发现儿子走失后,向公安机关报案。经侦察破案后刘陈氏被依法逮捕判处了死刑。在上报的卷宗内,采取同样手法,隐瞒事实真相,谎称两家有私愤系报复杀人。刘陈氏的丈夫刘在祥涉嫌包庇罪,被依法拘留,教育释放后不久也饿死在家中。

3. 从乱坟岗拣回尸体食用并出售,1960年1月14日,六十铺乡农民陈士贤(男,33岁),从乱坟岗拣回小孩尸体一具,煮熟后自食又在集市上出售。发案后,陈被逮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后监毙;类似这种情况的案件县公安局办理10起。

4. 从旷野荒地拣回整个尸体或肢解部分,煮熟后充饥。属这一类的事件县公安局办理37起。当时未被发现的或发现后未向政府报案的,远远不止这些。

1962年初,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会后,县委领导向我们传达了会议精神,根据上级部署,颍上县对上述案件进行了复查。复查后认为,除高士英、刘陈氏两起故意杀人案应予以维持外,其余均属错案,尚在关押的一律释放并逐案进行了平反,对在关押期间死亡的13人,由政府出面除宣布平反外,还适当给予经济补助。

我已年过八旬,40年公安工作的生涯对我来说已经成为历史。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县公



安局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又从事公安史志资料的征集和编写工作,对40年来颍上县公安工作在党委领导下取得的成就,通过编纂“专业志”、“大事记”、“组织史”和“专题材料”等,已作了真实的记述。

然而,作为一名共产党人、公安干部,对过去工作中的失误和教训,也应该有个正确的态度。本文所讲的几十起“特殊案件”,有的是经我亲自办理的,有的是局领导集体研究时,本人参加听过汇报做过表态。在上述错案中,我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容推卸的。我在从事公安史志编写的几年中每当查阅历史档案时,总是经常想起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困难时期,党在农村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而我们公安工作不可避免地也犯了错误。其中最使我感到痛心的是1960发生的“特殊案件”。这类案件初发时,我们不敢相信能有这回事,查清几件后,当向领导机关汇报时,他们说:“这类案件的发生,是阶级敌人的蓄意破坏,公安局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当时公安机关刚刚结束“反右倾”学习运动,加之领导给定了这个“调子”,我们在调查这类案件时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向领导汇报时不敢讲真话,结果我们只能违心地扮演着自欺欺人的角色,用一些含糊不清的政治术语,如“政治破坏”、“影响大好形势”等等,作为这类案件的代名词,实质上是在混淆矛盾,把专政的矛头指向饥饿将死的人民群众。

1962年对这类案件复查平反之后,上级电话通知说:中央有位宗教界的负责人(党外人士)要来安徽视察工作(实际没来颍上),要求我们组织力量把这类案件卷宗从档案中抽了出来,单独保管。(注:我写公安史时,已找不到这些档案)其他案件涉及类似内容的,能分出来的尽量分出,不能分出的用墨笔抹掉。如此一来,颍上县在困难时期发生的“特殊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公安档案中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了。

幸好,当时我查阅1960年文书档案的统计资料中,遇到了一份当时的“特殊案件”登记表,这又引起了我对这段困难历史的痛苦回忆。我感到我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又是办理这些错案的执行者,我认为我有责任把颍上这段公安工作历史教训写清楚,载入史册;否则,我们的后代还不知道当年的“特殊案件”是怎么一回事呢!当我把本文初稿写成之后,未正式入编之前,请示了县党史、地方志、上级公安史办的负责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这类内容(当时叫‘非正常死亡’)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敏感性问题的,上级有规定暂时不能编入史志。”我只能带着遗憾把文稿收藏起来。

现在,我把原稿略加修改,将这段历史客观地记述下来,意在“以史为鉴”,教育后人。■

(作者为颍上县公安局原局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 图 书 介 绍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始于孙中山的容共政策,孙中山为什么会采取容共的政策?是用以“联俄”的一种诱饵还是纯粹看重共产党人的才干,并予以重用呢?从孙中山接纳中共的初衷和后来孙中山对中共态度的两难可以看出,一方面允许共产党保持自身的组织独立性和批判自由,另一方面又要求共产党员像所有国民党员那样服从自己,对于孙中山而言过于困难。以至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纠纷,他总是扮演调停人的地位和角色。愈演愈烈的两党纠纷,最后发展为“弹劾共党案”。在孙中山权威的震慑下,国共两党中的敌对情绪尚能受到约束,但当他去世后,两党关系走向破裂乃至全面对抗也就在所难免了。孙中山逝世后,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人在“容共”和“分共”政策问题上的进一步分化,伴随着戴季陶的转变与廖仲恺案,西山会议和另立中央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推动了1927年蒋介石决心发动“清党”运动。“清党”运动的最大特征就是它的血

腥,它开创了中国20世纪历史上,夺取政权者用暴力,并辅之以群众检举的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残酷地清除异己的先例。国民党的“清党”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随着共产党人开始举起武装暴动的旗帜,国民党不得不在各地疲于应付。这场运动很快也就转变成持续的镇压行动。从最初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实行所谓“白色恐怖”,到逐渐转入偏远乡村进行“剿共”的战争,整个过程持续了十年之久。在这十年时间里,国共两党相互报之以血腥和暴力……

历史的研究,贵在真实。本书全面系统论述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各派系对国共合作的态度;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剿共”决策过程;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态度;抗战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作者使用了国共双方大量可靠、翔实的历史档案和重要人物的日记、回忆录,透过这些材料,使人对国共两党历史有一个真正的理解。

共产党为何能够最终夺取政权?国民党失败的原因究竟何在?这本《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无疑是对这一问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解答。

# 1933年四川兵灾

○ 赵晓铃

[编者按：本文所引历史文献中，一再出现“赤匪”、“赤祸”等政治色彩浓烈的词语，因是文献表述，未作技术处理，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 捐 税

在四川南江县长池镇的街上，“经常吊起排排的人”，被吊的人都是没有交军款的，什么时候交上了，便把人放下来。南江县县长姚垒竟出告示：“杀人可恕，欠款难容。”这是上世纪30年代，南江县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防区。

当时四川实行防区制，在各自的防区里，军阀有征税、政治、人事等大权，连各校校长，都是军人任命。为争夺地盘，各路军阀不断发动战争，从现在留下的通电上看，都有非常正当的甚至革命的理由。《川报》上有人撰文，以为军队与土匪的区别便是军队有革命口号，而土匪没有。

为满足军需及私欲，各路军阀横征暴敛。全川共有70多种苛捐杂税，如粮捐、子弹捐、火钱捐、壮丁捐、马路捐、被服捐、瘾民捐，种鸦片的要纳烟捐，不种的要纳“懒民捐”，不吸烟的要纳“禁烟捐”。

在田颂尧统治的川北地区，各种捐税长期名列榜首。“广元粮税年只七千余元，近年已征七十余万元”。宣汉县“1930年一次即筹军款二十万元，完全按粮摊征，每两征银竟有达一百八十二元者”。按当时的市价，请一个老妈子，月工资也就一元。

军阀混战和军人干政的一个结果是暴力崇拜。暴力所获胜于生产性收入，土匪团伙多如牛毛，他们依靠枪杆子致富发财；又由于生产者被暴力过度侵害，失去生产资料后游民化，安分守己的人也被逼铤而走险，土匪团伙越滚越大。不论是军队或土匪，伸手要钱的对象不分贫富；为

了征税的便利，军队常常首先向富户、商人摊派垫款，向银行强行借款，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在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四川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经济表现很糟，各阶层人民都对军阀政治极为不满，川北地区势如遍地干柴。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以张国焘为首的总部率10师、11师、12师、73师和少共国际团共约2万余人，突过京汉铁路开始西征。此时，四川空前规模的“二刘之战”正开打，军阀们无暇北顾，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越过冰雪封山的巴山险道，进入川北地区。

据张国焘回忆，“我们全军当时真像一群叫化子”。张国焘感到，“解决现实需要，重要性远过于死板的教条”，制定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十大纲领”不再提“苏维埃”，其中“最低政治纲领”的“约法三章”，一是废除苛捐杂税；二是减租减息；三是保障人民安全，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罚，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虽说纲领中还是要分配土地，打倒蒋介石，但主张废除防区制，各军互不侵犯，禁绝鸦片。这样，连地主商人都拥护红军，尤其废除苛捐杂税的举措很得人心。所以，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势如破竹。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1933年1月23日占领巴中县城。1933年2月17日，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起了一个东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南到营山、渠县，北至陕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此时“二刘之战”暂告消停。

1933年春夏，田颂尧部为了和刘文辉争夺川西，又抽调30多个团的兵力在成都与刘文辉部巷战，通江、南江和巴中诸县守军不多，得到了补给的红军迅速推进。

据后来出版的传记《张澜》记载，张澜曾发动



卢作孚

南充人民准备欢迎红军，希望尽可能地不扩大战事，各方相安。

## 难民

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极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亟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10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被誉为“川北圣人”的张澜，安抚会设救济、慰劳、调查、宣传、组织五个组。其最为困难繁重且任务紧迫的是救济组，组长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安抚会正式成立之前，卢作孚已派出

几支救济队出发到各县做救济工作，并同时为难民情况有比较细的调查。

从救济队发回重庆《嘉陵江日报》公布的难民调查上看，来自苏区的难民只有少数是富户人家，多数是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医生、教师等。从这些调查中也可看到，难民中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往往是全家六七口，甚至十来口人同时出逃，男女老幼饱受奔波颠连之苦。不少贫苦人家，或有点家底但因出逃仓皇财物损失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安抚委员会委员卢子和与四川民团总指挥鲜特生从南充到遂宁经过蓬溪时，就“见多数难民极备穷困，裹腹之红苕稀饭亦无从出”。时已深秋，许多难民衣单不能御寒，夜晚只能露宿于街头。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 赤化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西北军区政治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来彻底平分；第二条，地主阶级的房院、财产、耕牛、农具……等亦一律没收，（富农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其契约；第十七条，矿业、林业收归苏维埃国家共管，作国家财政基础；第十八条，对祠堂以及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要平分给穷人；第十

九条,庙宇寺院的土地和旧有的学田一律分给穷人;在苏区,不只是地主富户“发财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七条,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监督下做苦工”;“第二十四条,民团精选队长、流神、痞子、甲长等以及整过穷人的,均无权利取得土地”;“第二十六条,和尚、尼姑如是收庙田庙地吃租的地主式的,绝对不能分田”;“第二十七条,发财人的妇女嫁给穷人或抱给穷人者,不能分得土地”。照此规定,这些人不被杀掉,也是没有活路的。

在能够分得土地的人中,也不是人人待遇平等。《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八条,富农不反对苏维埃可分小部分坏地”;“第十六条,红军、游击队员家属分好田,雇工贫农分好田”;“第二十二条,端公、道士、阴阳、卜卦、算命子也可分田,但无公民权,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第二十三条,棒老二、土匪、小偷,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可分土地”;除了分土地,还有一些翻身活动,如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提出的雇工斗争纲领就有:“雇工的伙食要与老板一样!雇工的住处要与老板一样!雇工患病,医药费要由老板负担!雇工的烟茶、草鞋、帽子、衣服等费用由老板负担!……”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的信认为,四川省的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不能令我们满意”,要求省委,“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铁道粮站”,“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

军”。四川省委将陈的信转到中央。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这封信最后还说,“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又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后来发展,宁可不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还责成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的工作,督促四川党”。

## 斗 争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 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

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

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现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

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 糜 烂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实行武装割据,和当时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比以前川军之间打仗争夺地盘更为惨烈,战线更广,时间也 longer。军队在一地反复争夺,不分战场与非战场,军队行动前实行坚壁清野,带不走的物资也不能留给敌对方,甚至烧毁粮食物资和房屋。“剿匪总指挥”刘湘通电全川各军,“对赤匪接近区域,务须坚壁清野”。“剿匪总部”还颁布封锁条例:“为断绝赤匪物质补充,使其野无所掇,日久自行崩溃”,在各交通要道上设卡检查,粮食、盐、武器、药品、五金货财等须验证通行。

川军放弃某地之前,常常强迫当地人民离开,否则以通匪论,并乘机勒索人民的财物;红军占领宣汉时,宣汉驻军退至开江,就有数千难民随行。在万源县,川军半夜鸣锣要老百姓清晨4点以前出逃,否则以“通匪”论,4点以后即行“清乡”,实质上是抢劫,一路上还虐待难民。

红军在退走前,也运走粮食、货财,也有大片房屋被烧成废墟。1933年12月16日,王陵基部进攻,红军从绥定撤退向凤凰山时,“四门放火,烈焰冲天”,有三百余家房屋被烧。红军退走,民团或政府军打过来时,难民回乡,已无家可归,房屋、农具、粮食与牲畜尽失,对参加红军或赤卫队的仇恨难以消泯,官军或民团又以“通匪”的罪名杀人,杀红军家属,杀赤卫队员。有的地方,反复被争夺,暴力循环,愈演愈烈,人性尽失。

南江县难民李正兴向记者讲述,阴历五月初,红军来时,因为栽秧未毕,未及逃出,到五月初五日,红军再来,“见人便杀,逢物即毁,火焚房舍,发掘坟茔,强将全家拉至平溪坝,锁吊四十余

天,三天毒打一顿,同锁押一处者,计男妇老幼百余人,一日亲见谢姓等妇女,被看守之匪侮辱至,及后,匪之村苏主席,反使令将谢姓等妇女之乳割去,肢体砍断,二昼夜之久,始绝气而死,通江易姓之子名长生,年十二岁,人□(文献看不清。下同——作者注)聪敏,曾在高小校读书,匪二次入通江时,将长生拉到平溪坪,认为智识后裔,富家子弟,例应处死,一日清晨,将易长生衣脱尽,割其耳鼻,并剖腹割其心肝,匪等称智识之人心有七孔,富人肚内有油,一面喊不为富人,一面又喊迅速□钱赎命,又一日午后用火烤死戚姓妇女小孩多人,又将陈姓□姓十余人碎割,周身宛转,二日始痛死,同禁之人,见此均皆骇倒,但求速死,免受酷刑,六月中,又将各民解赴巴中,路过两河口,见前退回大批匪徒,多缺一手膀,闻系广元作战,被刘王两部大刀所砍,殊匪首等即在场上开会,向众演说,此次作战不力,应将手膀砍断之匪活埋,语毕哭声震地,痛骂当初悔被匪欺骗,旋被一一掀入坑中,掩土时,犹闻骂声不已,后到巴中,未及十日,被审四次,香火烧背,利刀削耳,备受酷刑,终日索枪要刀不休,七月中,又被押到恩阳河,匪见李受刑创未愈,防范稍疏,乃乘间脱险……”。

在安抚委员会委员长张澜发布的一号布告里,张澜表态道,“澜一介布衣,无官无职,衰龄白发,更复何求,目击大祸临头,恐自此剿绝人类,剿绝人心,使我中华五千年相传之文明古国,沦于九幽地狱而永不可拔,良心驱我,投袂而兴与赤党争人性存亡,非与赤党争政治权利,发扬我国固有之礼仪廉耻以挽救彼辈之绝伦反性,倡导中外先哲之合群互助,以矫正彼党之阶级斗争,祈化相斫之阎罗场,实现人类之和平会,孰暴孰仁,当代贤达,必有能辩之者,切望群起奋兴,以挽回此浩劫也”。

战争时期,社会糜烂,肖小乘机作乱,从报上看,那一时段的匪警消息竟与军事消息相当。小股土匪杀人劫财,邮件常被劫去。

最大的土匪是川北王三春。1933年11月,刘存厚因集中兵力守绥定宣汉,放弃城口万源,全城人民逃亡,空城竟为数千人的大股土匪王三春占据,“闻风来据县城”,“王进城后,佯为告示安民,一方则挨户搜索”,在红军进驻之前,就大

肆掳掠,第二天才被红军赶走。

## 涓 敝

1933年的战争对四川的经济破坏是巨大的。

据《川报》1934年11月报道,“川省自去年匪患蔓延,人心浮动,巨额现金陆续外运,为额之巨,至足惊人,兹就经官方给证公运者计之,去年全年,由轮船运出之款,据万县航务处统计,渝万两地轮运生洋出口,共计运出现金三百八十九万三千一百五十三元……又据渝报所载,去年一年重庆一埠现金出口之数,有护照营运者,共计四百七十余万元。而往来行旅及船员职工随身携带者,尚未计入。至于大宗私运出口者,为额当亦甚巨,惟不易估其数额也。本年前方剿匪军事失利,现金纷纷外溢,由川汇往申汉之数,月余之间,竟达二千余万……以至金融枯竭汇水飞涨”。“省外如宜汉各处,随时均发现川轮,偷运大批现金出口”,“不由轮运绕道出口者,为数尚无从估计”,估计公私外运现金,至少与四川金融重心重庆市面所存现金数相符。以至“人民生计穷迫,市面极度枯穷”。“八九月间渝埠庄票掉换现金,竟由每千元补水二三十元,涨至每千元补水六七十元”。“银行畸形发展,货币病态膨胀”,“结果形成今日严重之市面现金枯竭问题”。《济州公报》称,四川军阀官僚富商大贾“形成竞汇私蓄外省之风尚……沪上估计川省外汇之款约二千万”。

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中央与刘湘政权,为稳定四川局势,几次严令不许银元外流,要没收出川外汇,也难完全遏制此风。

其时,重庆民生公司正在川江上大力发展,北碚建设已有一定规模和影响,急需资金。在民生公司的档案里,也还能看得到,由于战争造成的困难,资金流通渠道不畅,人心不定,不肯向企业投资,连原本承诺向西部科学院捐款的省外友人也疑虑重重。

根据回忆,在川陕苏区,经济有过一度繁荣,农民分得土地,红军又动员群众回家种田,但是毕竟军事第一,秋收时,要军民一起武装保卫。除收割苏区粮食,“红军、赤卫队还带领割谷人到白区去割‘发财人’的谷子,每次收获数万斤或数



十万斤,送到红军粮库,参加秋收的人,每人每天给20斤谷子作报酬”。张澜在安抚会第一号布告里说,苏维埃地区“土地公有,即计口授耕”,“尚不如佃农之能自由交易”,“所得之粮秣,已全数征发而集中于官”。农民并无生产积极性,而战争的破坏是严重的。1933年10月初,红军攻占蓬安,蓬安17区,红军占领嘉陵江东岸的15个区,为着军事和建立根据地的需要,兴土木筑万石仓,将十几区的粮食集中。难民逃往顺庆(今南充)有数万,而红军未占领的河西两区,粮食要供应数万剿匪军团及逃难来河西的河东难民。“虽秋收未久,而所有谷米亦已消耗净尽”。“纵令剿匪军到,赤氛肃清,回首家园,已十室十空矣”,“难民等在顺之生活现象,已呈惨状,将来回蓬之后,室如悬磬,仓无遗粟,生活问题,更难解决”。

苏维埃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布币,但由于政权更替急促,人民对这些货币总是不太信任,在苏区,“铜元票的价格还是不断地下落”,“到红军总退却前,通江的铜元竟落到三百几十吊才换得硬洋一元,值不到原来价格的十分之一”。

红四方面军经济政策也有重大失误,苏区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回忆:“张国焘只要发现国民党的钞票,就要下令全部烧掉,这实际上等于烧

掉了大批物资。每打下一个城镇,有钱的都跑光了,留下不少贵重的家具用品,他也都叫一律砸个稀巴烂,大的穿衣镜,珍贵的瓷器,有的用枪托打碎,有的装在黄包车上摇坏,损失是不小的。”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了。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一面是战争破坏,一面是巨大消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来承认:红军撤出川北,除了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

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为筹“剿赤”军费,各路军阀有理由空前加重对人民的搜刮,从统计数字上看,四川田赋最重的是1933年,如成都县田赋预征达到历年最高,这年预征了1959年到1968年十年田赋;城口、万源、宣汉、达县,田赋预征到1983年;通江、南江、巴中、广元、昭化、剑阁、阆中、苍溪、南部等县,田赋预征到1951年。至1935年,川陕边防区的“防区”内,广元县竟预征至民国100年。

战事消停,难民回到家乡后,看到的多是十室九空,田园荒芜,鸡鸭无余,耕牛农具亦损失,秋种既尽,冬粮未播,生计何依。

战争不仅是让农村残破不堪,城市里也出现粮食紧张。粮价猛涨,1934年1月,重庆米价为三十元一石。这个月,四川当局在湖南买了一批米,米价才跌到每石二十四五元。然而,更大的饥荒还在后面。

刘湘的21军,明里减轻赋税,实际大大加重人民负担。没有军费,川军派不出去,邓锡侯的28军,就坐在成都等钱到账才开拔。刘湘向银行等摊派“剿赤”军费,这种借款或垫款,却是以粮税作抵押的。

为保卫地方,各县扩大团练,纷纷申请增加团款,21军出台戍区临时增筹团款办法,一方面,提出各县地方农民银行基金,悉数暂时借作办团,建筑碉堡之用。收复“匪区”及后方各县,地方公费移缓济急,如文献委员会,清粮委员会,建设科等机构,或裁或停。另外从租石捐或粮税附加中加征,征收税率、起征标准和收款总额都可由各县议定后,呈军部核夺。凡商民资产达一千元,即缴纳税款,标准为每百元出洋二角。

21军部规定的“剿赤”义勇队编制及月支薪饷标准,仅各县各队长及各级军士月薪每月即需591元;还要加上更多的建筑碉堡费、门户练会操口食、守隘灯油费、枪械军服之补充经费及其



# 饶漱石政治秘书谈饶漱石

○ 陈邦本

读了《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上《知情者谈饶漱石》一文,想起早年见饶漱石的印象和艾丁晚年谈饶漱石。

艾丁是我的老领导,我与他的接触属于不疏不密的君子之交。1951年初,我由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结业,分配到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当时艾丁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的秘书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我初到机要处办报科同副处长廖昌英的夫人吴澄波等同志,整理渡江前后华东财委、华东支前司令部等单位的电报档案;有时主管送首长批电报的老同志生病或有别的事不在,科长徐明就要我代理送批电报,面见饶漱石。

## 平易近人的长者

当时,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在常德路421号(现上海警备区驻地)2号楼,饶漱石的办公室在大院西部60号。我送请饶漱石签批电报时先经60号警卫室说明情况,由警卫用电话同艾秘书联系,经许可,由警卫带进60号2楼饶政委(当时对饶,都称饶政委)办公室,这是一个大套间,进门是艾秘书办公室,里屋才是饶的办公室。我记

得,那年5月初去送批电报,艾处长见我进门,忙从办公桌旁站起身笑脸相迎,说:“今天是你送报,叫什么名字?”我一面回答,一面打开皮包将夹电报的讲义夹拿出来。他嘱我将皮包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转身引我进里屋,迎面看见身材魁梧,略显微胖的四方脸,浓眉大眼,身着浅灰色大翻领短袖香港衫的饶漱石,右手食指夹着八角形铅笔,正站在办公室中央。艾处长向他介绍,机要处小陈送批电报。我连忙恭敬地喊:“饶政委,您好,一份发报请审批。”迅速将夹电报的讲义夹送上去。饶接过讲义夹,向我瞄了一眼说:“新来的。”艾处长代我回答说:“年初,我们两个机要处(指华东局机要处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从南京青年干校要来了一批小青年。”饶点点应声“噢,你们的校长是周骏鸣吧(周骏鸣,时任第三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三野司令部青年干部学校校长)。”转身向办公桌走去。我回答“是的”,跟他走到写字台旁,见宽大的写字台上放着两部电话机,桌子中央摊着白底红格子竖写的文稿纸,稿纸上端和右边写满铅笔字。看来他正在修改文稿。他在办公桌后椅子坐定,翻开讲义夹看电视。

艾处长示意要我到门左侧的沙发上坐下,他自己去外屋了。我坐的长沙发面对办公桌,左侧

他临时团务开支。江津办一百三十余团,筹款19万元,在粮上附加每石三十元,不足之数拟拨救济院基金及中签债券挹注。

仅仅就这些不完全的记载,也可想见当时人民在军费上的负担有多么沉重。

这时四川农村已不是“隐忧堪虞”了。张澜1933年12月再电催中央速拨赈款及建设费,称“当发巧电时,蓬安营山尚未克复,今营蓬收复后,本会调查该县情形,房屋则拆毁将尽,田地荒废,已过耕种之时,粟米无颗粒之存,货财已丝毫无有,人烟断绝,闾里为墟,少壮者为该匪裹胁以

去,老弱奄奄垂毙,无以为生,其逃亡者,又以无依无食,不愿还乡,此仅就营蓬两县而言,其他失陷较久之仪陇苍溪阆中昭化广元,预计情形之惨,当较此十倍,至通南巴三县更无论矣”,“合计统筹需款甚钜,川省现筹剿赤经费,已经罗掘俱穷,至此项建设赈济之款,更丝毫无着,伏恳中央俯念川民,查照前次巧电,一面拨给款项,作建设经费,一面速筹赈款,救济难民,仍令四省农民银行,仍来川省立分行,以活金融,而资周转”。■

(作者单位为重庆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 黄钟)

有把单人沙发,在其背后靠窗墙角有个衣帽架。抬头望去,写字台前侧紧靠东墙有两把椅子;写字台背后和靠西墙各有两个书橱。整个办公室约二三十平方米,陈设简朴,除了地上铺有地毯之外,与普通办公室并无区别。我正在欣赏着首长办公室景物,见饶在电报稿上签字后,将讲义夹合上,我连忙走过去接过来。他把讲义夹递给我时说:“你们办公室就在院子里,送批电报还是装在皮包里安全。”我解释说“我带皮包的,在艾处长桌子上”。饶微笑地点点头“噢”了一声。

艾丁大约听到我们的谈话声,推门进来。我向饶点头告辞。当时我参加机要工作才几个月,初次见到照片上十分威严的高级首长,比较拘谨。几次接触,留下深刻印象:他是位敦厚可亲、平易近人的长者。

### “高饶反党联盟”才是第一冤案”

第二年,机要处搬到延安西路33号办公,我再未给饶漱石送过电报。两年后我在市委机要处从电报上得悉饶漱石调到北京工作后出事了。但“高饶事件”正式传达后没有多久,我在五原路上意外地遇见艾丁,他热情地同我打招呼,并手指身后一幢公寓楼说他就住在楼上,邀我到 he 家里聊天;我出于好奇,随他上楼坐了片刻,他告诉我现在在工厂工作,我问他“高饶事件”中受苦了吧,他说“还好,还好”。他听我说市委机要处就在附近丁香花园,要我向认识的同志问好,有空时到他家里玩。但因嗣后政治气氛关系,我们在五原路上相遇多次,相互点头问好,再未登门看望过。直至1999年春天,原华东局机要处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工作过的老同事,商议



陈 毅

编撰反映老机要工作者足迹的纪实文学集《无形战线》,由市委机要局、档案局原局长姜文焜牵头组成编委会,我为执行编委,并邀请市委老领导胡立教和当年华东局机要处处长肖光、华东军政委员会机要处处长艾丁以及著名作家杜宜为顾问。为此,我多次拜访艾丁。

有一次因一篇文稿中提及饶漱石利用陈毅同志谦让,未经常委讨论,发电报蒙骗中央,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我对此写法有疑惑,专程去请教艾顾问。他听后说,这本书是反映机要员的足迹,怎么写高层争斗的是非了,这件事是个“谜”,你们不知道底细,

何必跟着人家扯淡,“删去删去”。接着,他说现有人称“潘汉年事件”是“共和国第一冤案”(这是公安部部长王芳作序的一本书名)其实“高饶反党联盟才是第一冤案”。但他说罢,马上又申明,这是随便讲讲,事关重大,还是以中央文件口径为准。我告辞时,他又关照“刚才随便说的话,勿张扬”。我感到多年政治运动改变了他年轻时精干豪爽性格,谨小慎微了。

### 放声痛哭,悔恨说了不实之词

几个月后,艾丁住进华东医院东楼20层病房。我去看望时,他多次向我打听是否有关于高饶案件的小道消息。2005年春天,我把书摊上购得的刊载高饶事件回忆文章摘要的《作家文摘》报,带给他。他看得非常仔细,当看到有篇文章提到饶漱石抓住时机反党,平时又善于伪装,所以在他身边工作多年的政治秘书艾丁说饶漱石是个“伪君子”。艾丁坐在床边沙发上拿小报呆呆地反复看。过了一会儿,忽然侧过脸,呜咽地放声痛哭。我面对84岁老人悲痛表情,惊得

不知所措。沉默了几分钟,他站起身走到洗手间用毛巾揩洗了一下,重新回到座位上说,他是讲过这句话的。那是1954年饶漱石在北京被软禁后,上海凡在饶身边工作过的人,集中起来学习文件,提高觉悟,划清界线,揭发问题。他是1953年2月离开北京,返回上海已一年多,仍被召去学习、揭发问题,而且他是这些人中在饶身边工作时间最长(6年)、最贴近(政治秘书)的,被视为知情人中的重点对象,反复启发他站在党的立场,揭发饶的反党言行。他说,讲实在话,饶漱石平时除了工作、开会以外,就是看书看报,很少交友闲聊,哪有什么反对中央领导的反党活动。但当时面对中共中央文件,岂敢说个“不”字,实在无奈,只好说从文件中看到饶漱石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但他在周围工作人员面前从来不露声色,都被蒙在鼓里,他“是个伪君子”。没有想到他说的“伪君子”一语竟然被写进中央文件,成为形容饶漱石人品的定语。这使他无可奈何。

艾丁说:杨尚昆曾告诉他,饶漱石在交代中则说:“我对不起艾丁,他是中央社会部派到我身边工作的,我怀疑他是来监视我的,所以我的反党活动不让他知道的。”这是饶身处逆境,所以这样说是保护我呀!我却说他是“伪君子”,每每想起此事,深感内疚。

## 艾丁抱病释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原委

2006年夏天,我去华东医院看望艾丁时,其夫人麦加也住在病房里,她见到我高兴地说,陈邦本你来,老艾喜欢看你写的文章(艾丁看了我在《无形战线》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后,曾夸奖我的文章有功力又生动,把机要员朱子良、侯德华以及廖昌英写得有声有色,希望有

新作能借来一阅,我遵嘱凡新发表文章都给他一份),他有件事要同你说。麦加转过身对艾丁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说吧,不要把它带走了。

我听了很茫然,不知何意。艾丁让我在他右侧沙发上坐定后说:“就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事,以讹传讹多年了,成了个‘谜’。我来日无多了,把这件事原委告诉你,将来总有一天可以写成文章的时候,你来公诸于世吧。”我看着他恳切期待的神情,点头倾心恭听。

艾丁沉思片刻说,这件事原由是毛泽东的主意。1949年9月中旬,饶漱石从北京汇报工作回沪后,在办公室向陈毅同志通报情况时,讲到中央要求将华东军政委员会组成人选于10月底上报。关于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同志说,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原则上由大军区司令员担任,考虑到华东沿海军事任务繁重,他说已同你商议过要我兼任。不过我认为既然其他大区均由司令员担任,华东还是由你担任,乃“顺理而成章之谓”。

陈毅同志马上回答说,这件事主席早在与你谈话之前,同我商议过。主席考虑是周全的,这是从实际出发,如果照常例办,他用不着同我、同你个别交谈了。

饶坚持说,我认为还是你出任为妥,请你再考虑一下。接着,饶谈了副主席人选的设想,陈毅同志表示赞同。最后,饶说待刘晓(华东局组织部部长)和胡立教、潘汉年把军政委员会委员名单拟就后,一起提交华东局常委会讨论。陈毅同志点头赞同。

大约10月初,刘晓拿来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名单(草案),饶同刘晓一面看,一面议,增加了几个委员后,由我交办公厅秘书室打印作为华东局常委的会议文件。



饶漱石

华东局常委会开会前一天上午,饶要我拨通南京的陈毅同志电话。饶在电话中告诉陈,明天华东局常委会讨论华东军政委员会人选,希望陈毅同志能来沪参加会议。大约陈说军区事多不能来沪了,饶说:“你实在抽不出身来沪,我们在沪的几个常委讨论了。……你对名单草案有何补充修改意见?”接着饶说:“军政委员会‘军’字在前,主席一职还是由司令员担任为妥……那就提请常委会讨论决定。”饶挂了电话后同我说:“陈毅同志不能来参加会议了。对送去的军政委员会委员、副主席名单均同意。主席一职,他还是要我兼任。说我是军区政委,是现役军人,并无不妥。这件事只好交常委讨论后报请中央定夺了。”

那天下午,秘书长魏文伯来向饶汇报说:陈老总不能来沪参加常委会了。要我在会上向常委们转达他的意见,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由饶政委担任为宜。他本人因军区的事太忙,无法分身,不参加军政委员会工作了。饶说,上午已同陈毅同志通过电话。

那次华东局常委会是在江西中路建设大厦二楼会议室举行的,出席的在沪常委有饶漱石、曾山、舒同、张鼎丞、刘晓,还有秘书长魏文伯、组织部副部长胡立教、统战部副部长潘汉年。饶漱石主持会议,先征求大家对事先印发的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委员的名单(草案)有何意见?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然后,饶漱石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人选,请大家一起商议……这时,魏文伯插话说,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饶政委和陈司令员互相谦让。饶政委说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都是司令员任主席的,所以建议由陈毅同志为主席,陈毅同志委托我向常委们转达他的意见,华东情况特殊,华东沿海军务繁重,他兼上海市市长,常在上海、南京之间奔波,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请饶政委担任为宜。曾山、舒同、刘晓等发言都说,陈毅同志确实太忙,主席一职就由饶漱石同志兼任吧,没有不同意见。饶在会上没有再推让。他说,既然大家都是这样意见,报中央审批。

会后,随即将经华东局常委会讨论通过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名单电报中央。

艾丁说,这件事整个过程符合程序,尤其饶、

陈两人再三商议,相互谦让,最后经常委会讨论后上报中央的。1949年12月初中央人民政府第四次会议讨论通过,饶漱石为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粟裕、曾山等为副主席的华东军政委员会成员人选。

后来中央文件上说,饶漱石利用陈毅同志谦让,未经华东局会议讨论,用不正当手段,谋取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至今还是这样传。

艾丁对此事忧思重重。那天因医生、护士为麦加检查身体进进出出打扰,我们的谈话断断续续长达几小时。艾丁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讲完后用面巾纸揩擦头上虚汗,在沙发上闭目养神了。

这时,麦加说,这件事在饶漱石问题发生时,老艾同我简略讲过,没有这样详细。当时他说这是件不该知道的事,可能会惹祸被抓起来,让我心中有数。

我不解地问,当时知道实情的人不止是你,大家都没有出来讲话。艾丁歪躺在沙发上扬头说,中央文件下达后召我们去学习,揭发问题,大家按文件口径讲,谁敢讲真情,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吗?常委会由陈麟章(原华东局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后来接替艾丁担任饶漱石政治秘书)作记录,案发后会议记录簿和发给中央的电报原稿都收交送专案组了。

艾丁讲完这件事全过程,异常沉重地含着热泪说:“饶漱石冤案,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的,我是看不到了。待到真正能‘实话实说’的时候,拜托你把我的这些话公诸于众吧”。

这次谈话后时隔两年,2008年6月麦加同志病故。2009年初夏,我在书摊上购得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的原高岗秘书赵家樑著《高岗在北京》一书,书中说“高饶反党联盟”是乌有的事。我急忙去华东医院准备给艾丁同志看。踏进病房,见艾老身上插满管子,我以为他在治疗,在留言簿上写了一段话,请护士待后转达告。护士告诉我艾老已昏迷,恐怕难醒了。我走近病床见艾丁同志脸庞消瘦,眼眶下凹,已变形。8月去世。

看了《炎黄春秋》刊载的《知情人谈饶漱石》一文后,我感到艾丁晚年谈话,应该公诸于世了。■

(作者曾任上海市委机要处处长)

(责任编辑 黄 钟)

#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 王保春 王文耀

**口述者：**

王保春：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王文耀：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

**参加者：**

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

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

**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

**时 间：**2012年4月19日

## “文革”初期，江青对陈伯达还比较尊重，陈伯达也吹捧江青

**李宇锋**（以下简称：李）：保春老师、文耀老师，我们已经和很多工作人员谈过关于江青的事，你们作为陈伯达的秘书，也近距离地接触过江青，想听听你们谈谈你们所知道的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以及你们个人对江青的印象。

**王保春**（以下简称：春）：我是1951年到中宣部，一直在机要室工作。陈伯达的生活由中宣部管。1961年，因为陈伯达的夫人、也是他的机要秘书刘叔晏快生孩子了，需要派一个人去替班，组织就派我去了。原来是3个月到半年，结果一直待下去了。

**李**：那个时候您就住在他家里了？

**春**：住他家里了。那时候陈伯达住中南海迎春堂，离主席游泳池也就一百米。我刚去的那几年，据我所知，陈伯达和江青关系不那么密切，接触也少，好像根本就没有什么来往。从什么时候他们开始有接触的呢？我记忆中就是在1965年下半年。主席在杭州，通知陈伯达到杭州去。在杭州，陈伯达遇见江青，据我看，这时候江青对陈伯达开始有点想接触了。1966年2月，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搞了个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江青和张春桥搞了一段以后，江青送给主席看，主席看了以后说请陈伯达同志看看、改改，

给把把关。当时陈伯达在杭州，江青、张春桥在上海。陈伯达改过纪要后，一天给我交代：“王保春，交给你个任务，你到上海去送一份材料，一定要对党负责，不能泄密，不能丢失，这份材料很重要，你要拿党籍保证。”我说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他还不放心，由杭州的警卫处安排了一位警卫干部陪着我，我们两个一块儿坐火车去上海。到上海，上海警卫处到车站接我们，去见张春桥的秘书，我把材料交给他。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晚上。他们看后，又叫我拿回来。回到杭州，我把东西交给陈伯达，陈问没事吧，我说没事。他说：“好，你任务完成得不错。”事后我知道，这个经陈改过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稿子，江青又送主席看，主席又做了修改，并在“纪要”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6个字，这一加就提高了“纪要”的分量，也提高了江青的地位；因为江青在部队没有职务，毛泽东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就名正言顺了。这是我经历的陈和江交往的第一件事情。

**阎长贵**（以下简称：阎）：据《五一六通知》附件《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记载，毛泽东那次召见陈伯达等5人是1965年12月21日，就是在这次召见中，毛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在整理毛谈话纪要时，田家英把这句话删去了，这成为田家英“篡改毛主席著作”的一大罪名。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春**：这件事情我后来听说过，但我当时不清楚。修改“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陈伯达和江青交往的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当时，陈伯达一会儿上海，一会儿杭州，来回跑，但总的来说是在杭州。在上海时，周扬——中宣部常务副部长，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到上海来疗养，方便的时候想来看看伯达兄。我报告陈，说周扬到上海了，想抽空来看看你。我知道周扬和陈伯达的个

人关系一直不错,但这次他犹豫了一下。我想他可能问过江青,江青就生气了,说:“你不知道现在要批判他嘛,你还见?”这一来,他就不敢见周扬了,他说:“这样子吧,保春,你替我去看看周扬同志,告诉他我现在不方便和他见面,叫他好好疗养。”我就去了。见到周扬我就把陈说的这些话转达给了他,周扬说,好好,谢谢伯达同志,我一定好好休养。

据我观察和感觉,陈和江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到成立文革小组不长一段,他俩基本上还是配合的、合作的,矛盾不明显。

李:陈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江是副组长,按理说,陈应该是江的上级。

王文耀(以下简称:耀):关于陈伯达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事,他跟我们说过“这个差事我干不了”。为此事他和总理说过三次。总理最后跟他说:“你作为共产党员,中央不能给你分配工作了吗?”这样,陈就没话说了。

春:其实,同样的话,陈伯达也跟主席说过:“主席,这个事我干不了,我是个书生,康生干比我合适,他原来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干比我强。”主席回答他:“你把那个书生气去掉不就可以了嘛!”这他就更不好再说什么了,就这样他当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

刚开始,他和江青的关系确实还不错。举个例子:1966年8月下旬一天,在钓鱼台16楼开文革小组会,会议中间,陈出来上卫生间,我一看他的脸通红,就问,“伯达同志你怎么了?”我还以为他和谁吵架了呢!他说:“我有点不舒服。”我摸摸他的手和头,很烫,我让他稍坐一下。找来大夫,一量体温40度,这就不能开会了,需要去医院。江青说:“不行,‘帅不能离位’。把看病的设备搬到这里来!”后来一些老医生说:“有好多设备运不过来,不能搬。”最后还是决定去301医院。江青很生气,当着刘叔晏的面发火,怪她没有好好照顾陈伯达,刘叔晏也不敢吭声。把陈伯达送到301,刘叔晏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保春,你在这里陪着首长,有什么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在301住的是高干病房。在几天的时间内,我接康生的电话不下十次,每次都是他亲自打电话,说:“王秘书,情况怎么样?”我就跟他汇报血



压是多少,体温是多少,烧不烧。他问得特别细。有一天江青的护士许春华到301,她说是江青派她来的。她到陈床前,说:“江青同志让我来看看您,希望您早日康复!”

陈刚住院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来看他,请示工作。后来请示工作的人就少了。有次王力来看陈。陈问王力关于哪篇社论的事,社论这是他最关心的。王力跟他说:你有病好好看病,好好养病,有些事情你就别管了,都有人管了。文革小组的事情有江青同志管,宣传口的事情有陶铸同志管。说完以后,我送王力,在送他上电梯的一段路上,王力嘟嘟囔囔地说:“唉,真是的,有病就好好养病嘛,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又不是没人管,你管多了,别人会不高兴的。”正好这个话有几句被刘叔晏听见了,她听到后就给陈汇报。后来陈又把我叫去核实,我又把王力的话复述一遍。他听后心里不太舒服,就主动地给主席写了一封信,说:“主席,在我住院期间,文革小组的工作暂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送上去了。对陈这封信,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负责同志都圈阅了,并以中央名义于8月30日发了一个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

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8月31日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就是江青主持的。

我觉得陈和江之间的分歧,这是一个交叉点。他生病这一段把权就交了。不过,在陈心里还认为这是暂时的。当他还没有出院的时候,就一个劲地催,老怕他是装病不愿意出来。一会儿这个问,一会儿那个看的。

李:他们来的时候只是看一下,还是请示汇报,一大堆文件要他签字呀?

春:那时正常的文件找他批的不多,需要他签字的文件这时就少了。他就关心发表了什么重要文章,社论呀什么的,结果王力就说了一句:“有人管。”

耀:我觉得,陈在1966年7、8月份住院以前,江青对他还是比较尊重的。最突出的就是陈伯达那次有病需要住院的时候。这个问题,保春在前面已说过了,我再做些补充。当时陈伯达一听烧到40度,坐那儿就起不来了,后来就把他送到15楼。江青也跟去了,到那里就问:“刘叔晏哪儿去了?”我们说刘叔晏在搞专案,在新建胡同。江青说:“叫她回来,伯达同志都病了,还在外面乱跑什么呀!搞什么专案,叫她回来!”我们就赶紧把刘叔晏找回来。江青对刘叔晏说:“伯达同志病了,你得好好照顾。赶快把医生找来。”然后来了好几位医生。江青跟医生说:“伯达同志现在工作正忙,把病床就设在15楼,在这紧张的时候,‘帅不能离位’。”还对文革小组的人说:“有什么事情要随时请示组长。”江青走后,我们跟大夫商量了半天,大夫说这不行,有好多医疗设备没办法搬来,还是得住院。我们把医生的意见告诉江青,江青说:“设备搬不来,那只能去住院了。但北京医院不能住,那里净是老干部,不方便,住在301医院好些。”就这样,陈伯达就去了301医院。

这一段,从文革小组成立到他住院前,陈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还算名副其实。

阎:《五一六通知》主要是陈起草的,而据王力说,江青也是实际的主持者(或之一)。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担任副组长是不是陈伯达推荐的?但是,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召见陈伯达、田家英等五人的时候,讲“《海瑞罢官》的要

害是罢官”,据说陈马上告诉了江青。

江青7月20日回京后,在公开场合,第一个吹捧江青的就是陈。7月2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广播学院,陈讲话,就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在驳斥一个所谓“诽谤”江青的条子时说:

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好战友,很多敌人都诽谤她。

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的入党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很重要的开端,外国人也承认这一点。好人宣扬这一点,坏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而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同志是首创者。……现在文化革命是从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在内,都感激江青同志。

我们看到,陈伯达这次讲话,把江青吹得很高,可以说有几个第一:一、第一次称江青为“中央负责同志”;二、第一次把江青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三、第一次说京剧改革是江青“首创”,并说京剧改革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论断。

## 陈伯达对派工作组的态度

李:“文革”初期,以陈为组长的进驻《人民日报》工作组是中央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后来派工作组成为刘邓的一条罪状,而陈却没有因此获咎。他究竟对派工作组是什么态度?

耀:在“文革”中陈有个观点,就是群众对领导有意见,完全可以提,为什么不能提?最典型的一次,就是1966年6月底7月初的一天,我跟他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他不愿意张扬,在清华大学的大门外就下车了,步行进去。看大字报,一直看了好长时间。别人都不认识他,后来被派驻清华的工作组的成员发现了,就问我们工作人员说:“他是陈伯达同志吗?”我们说是。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工作组人员又来了,说:“伯达同志,光美同志请你,她出来不方便,所以让我来请你到休息室坐坐。”陈说:“不用,不用,我就是过来

随便看看。”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请他,就去了。去了以后,在会议室坐了几个人,穆欣在我旁边坐着,他那边是王光美,还有请我们进来的那个人。王光美开始时对我有点怀疑,以为我是学生混进来的。她小声问穆欣,穆欣笑着说,他是王秘书。这个时候王光美才开始放开说话。

李:她主要讲什么?

耀:主要讲蒯大富,怎么反革命,怎么厉害。陈就问,这个人是个什么人?——给蒯大富写的大字报很多呀。王光美说:哎呀,这个人,反革命气焰相当高!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和他辩论,他很厉害,在台上我们几个人轮流上去和他辩论都辩不过他,毛主席著作和马列的书他知道的可多了,都是一段一段地引用。我们觉得他这个反革命一定是外面有人支持他,要不开会他怎么能一次一次和我们辩论呢?夜里我们派人守着他,清华大学四周的围墙我们都看住,看是不是有人翻墙过来,后来没有发现翻墙过来的。我们又怀疑他家里可能有问题,我们就派人到他家乡去调查,结果发现他家不是地主,是中农。王光美说这些话,是我印象最深的。陈伯达始终没有表态。因为我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蒯”这个姓,印象也特别深。后来,王光美坐伏尔加到钓鱼台15楼找过陈伯达两次。来的时候她都没上楼,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两个人谈,不知道谈了什么。

李:时间长吗?

耀:时间不短,也不算很长。他们对蒯大富的看法肯定不同,陈伯达表示支持学生。这个时候毛主席还没回北京,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多次到主席那里汇报工作,主席曾说可不至于派工作组,但未提撤工作组。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概谈过几次,最后一次他提出暂时把工作组撤出的意见,说不能跟群众对立太厉害了。邓小平不同意撤工作组,说:“撤了工作组,乱了怎么办?”陶铸说:“你陈伯达自己不就是《人民日报》的工作组嘛,还撤?!”

说陈“自己就是工作组”是这样的:还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人民日报》老赶不上趟,老是《解放军报》带头把中央的精神传达出来,《人民日报》在后面跟着,刘少奇、邓小平说这不行,得派工作组,决定要陈伯达带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把权拿下来,不能把这个党报弄得没有威信,5

月31日,陈伯达就带着工作组到《人民日报》了。

在工作组问题上,陈伯达跟中央的很多同志意见不太一样,所以他当时垂头丧气地说:“我可能站不住了,要倒台。”

李:那个时候他就认为自己站不住了?就因为派工作组问题上与刘、邓以及陶的意见不一致?

耀:是这样的。到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到北京后,了解了一个礼拜的情况,毛主席讲,他回到北京后,感到冷冷清清,许多学校都关上门,表示要撤掉工作组。

李:按您的这个说法,撤工作组最早是陈伯达提出来的,毛回到北京以后是采纳陈的意见?

耀:对。

阎:关于撤工作组的问题,可能是,陈伯达在党中央的会议上第一次、也是第一个明确和正式地提出来,但不一定是他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王力反思录》是这样说的:“六月下旬,上海来电话给陈伯达,不赞成由原来旧的工作机构派工作组,陈伯达根据上海意见,在怀仁堂会议上递了个条子,说不要用工作组的形式,因为容易形成包办代替,妨碍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条子递给邓小平,邓小平批评陈伯达,自己解放自己,不就乱套了吗?会形成自发、自流、无政府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工作组是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才能保证党中央的方针贯彻。陈伯达说不出道理,在钓鱼台十四楼(应为十五楼)就坐在地毯上哭,说上海不要工作组,这里又批评得这样凶!他报告了上海,江青传过话来很厉害,说你们文革小组要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到有工作组的单位支持群众反对工作组。”在工作组问题上,陈恐怕还是要听上海意见的,或者陈在这个问题上有和毛不谋而合处。

## 陈伯达反对上海造反派夺权

阎:说到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和分歧,我顺便谈谈陈伯达和毛泽东在政见上有时也有不同,比如在上海造反派夺权问题上,陈和毛就不一致。1979年1月4日,中共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中说:“所谓‘一月革命’完全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这个结



论根本与事实不符。

这里,我仅谈谈陈伯达的看法。上海造反派是1967年1月6日宣布夺上海市委的权的。1月14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了10万人参加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陈伯达讲话,说自下而上,只能监督,不能夺权。我们如果用监督的形式就更好、更主动一点,当然个别地方、个别机关也可用接管的办法,但大量的不要用接管,大量的接管是要上当的。上海自下而上的夺权,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周恩来讲,赞成陈伯达的意见,说要“防止接管风”。毛泽东听到这个情况,马上开会批评陈伯达。毛主席说,上海造反派组织起来夺上海市委的权,怎么能说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就是要夺权,就是要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手里夺权。毛泽东就这事讲了一大篇话。

你们两位对这件事情,即陈伯达不同意上海造反派夺权的观点和他受到毛主席批评的事都知道吧?

春:知道。14日那天的会,我们都跟着首长去了,听了陈和总理的讲话。当天中央又开会,会后,我们只看到陈脸挂着,不高兴,但他没说什么,我们也没问。对毛主席批评陈的事,当时我们不清楚,只是前几年在《王力反思录》中看到了。

阎:还有上海夺权前一个多月发生的“安亭事件”,陈伯达和张春桥以及毛泽东的态度也不同。1966年11月10日,赴北京告状的1000名上海“工总司”成员,在安亭卧轨拦车,造成京沪线中断三个10小时。对这个事件中央非常重视。总理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陶铸、李富春、陈伯达、康生和文革小组的人都参加了。会上,大家一致认为不能中断交通,要给华东局和上海造反派分别发电报。这两份电报都是陈伯达起草的。给华东局的电报说,不承认跨行业组织,卧轨拦车不对;给造反派的电报说,你们的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影响全国交通,应该改正,立即回上海,就地解决。会议决定派张春桥去处理这件事,而张春桥到上海没有贯彻执行中央会议精神,他在工人造反派提出的要求书上签了字。后来毛肯定了张春桥的做法,并说“先有事实后有政策”。“安亭事件”后,张春桥威风起来,从此他更只听江青的,更不把陈伯达放在眼

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所反映的是陈伯达和张春桥的矛盾,也是陈伯达和毛泽东的矛盾;正因为这样江青也就更看不起陈伯达了。

耀:你说得对,张春桥对江青的尊重远远超过对陈伯达的尊重,在他那里,江青的话跟“圣旨”差不多,而陈伯达的话,则可以应付,可听可不听。

阎:说到这里,我再补充一点江青对陈伯达的看法。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1962年重新修改和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是陈伯达、康生操办的,具体经办人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文革”中北大的造反派“勒令”《红旗》杂志“交代”“黑《修养》”出笼经过,由当时《红旗》杂志社的文革小组成员林杰做了一个书面答复,讲到《修养》在《红旗》“出笼”“是由邓力群等人……”(大意),这个“等”字非同小可,实际上就把陈、康屏蔽掉了(陈、康当时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邓力群是被打倒的走资派,林杰不便说、不能说、也不敢说陈和康的名字,所以就用了“等”字)。当《红旗》杂志社有人把这个“答复”报告给陈时,陈非常生气,就跟江青说了,江青立即找关锋谈话,江青说:“关锋同志,你不要反对陈伯达嘛!”关立即表示:“我反对陈伯达不成反革命了吗?”江青安慰关说:“也不必说那么重,陈伯达不过是个过渡式的人物。”

李:是不是可以说,中央文革事实上是江青专政,文革小组成员对陈伯达是不予尊重的,因为他们要看江青的眼色。而且可以说,即便在“文革”初期,陈与毛、江在一些问题上的认识也不完全一样。

春、耀:是这样的。

## 江青组织会议批判陈伯达

杨银禄(以下简称:杨):江青跟我说过,陈伯达封锁主席的指示,这是怎么回事?

春:就是有一次宣传会议,批陈伯达那一次。

耀:“九大”以前。有一次,陈伯达从大会堂三楼下来,看到下面有一个会,这个会他根本不知道。

李:谁在开会?

耀:江青他们组织的一个会。陈不太清楚,结果一去,看人已经坐满了,江青在那儿主持会,大家都坐好了,说让陈伯达做检讨。陈伯达愣了,做什么检讨?说他封锁主席的指示。陈伯达

说我没有呀。江青问周围的人：“什么没有呀，主席最近关于日本问题那个批示你们看见了吗？”康生搭腔：“反正我没看见。”陈想说话，江青却把麦克风拿过来，说“你不检讨，就不要讲了，我来揭发。你还穿军装、戴军帽！”陈一听，这是批斗他的会。陈气呼呼地说：“穿军装，大家都穿嘛！也不是我一个人穿呀？”江青接着大声说：“我要摘你的领章帽徽！你知道红五星的来历吗？”陈伯达很不满，把帽子一摔，说：“大字报上街！”这时叶群站起来，举手说：“拥护江青同志！”结果下面没人吭声。江青就在那儿讲红五星的来历。陈伯达生气得不得了，回来以后还很难受。经过这次会，陈伯达第二天就到《红旗》杂志社，在会上说，我有很多缺点、错误，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给我写大字报，也可以批评，《红旗》杂志半年不出版我有责任。

李：《红旗》杂志半年没出版？

耀：所谓封锁主席的指示什么意思？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倒台后，《红旗》杂志半年没出，因为陈伯达是总编，毛主席对这个事不满意，批评过陈伯达。江青就拿这个事做文章，批判陈伯达。是半年没有出版，因为当时没有人管。在江青组织和主持的批判陈伯达的会上，陈说些气话，什么“大字报上街”，与会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李：是不是王、关、戚被“端”出来后，陈伯达的危机感更强烈了，江青对他也更不尊重了？

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也不知道哪一天就被批斗了。

耀：在那个会上，江青当时还宣布：“大家不许说出去，至于做笔记的都留下，不许拿出去。”

## 关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的论争

李：陈伯达以一介文人卷入“文革”这种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本来就力不可及。他的地位上升，所倚仗的，说到底，就是毛的“笔杆子”的身份以及毛本人的信任。如果与毛和江有了矛盾，失势是早晚的事。

春：矛盾最尖锐的时候是在什么地方？就是起草“九大”政治报告。当时中央委托，实际上是主席叫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负责起草

“九大”报告，这个报告当然是林彪作。他们一块儿到毛家湾去了一次，当时他们是怎么谈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回来以后，陈和我们商量，他说自己写。我们说，自己写还是得要别人帮帮忙吧。他说，我们不是有个政治研究室嘛，那里有十几个干部，要他们帮着查些材料。他在家琢磨写，先拟了个提纲，十四条还是十五条？我就到沙滩找政治研究室的同志谈，说要起草“九大”报告，委托你们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资料。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新恢复的政研室，办公地点在沙滩。政研室有史敬棠、张作耀、徐景安等，一共有十几个人。说到徐景安，还有个插曲，在我给陈伯达组织这个班子的时候，老头子还挺灵，一看“徐景安”这个名字，问我，徐景安和徐景贤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说我查一查，后来我一查档案，根本没关系，他才放心。

后来他拟了个提纲拿着到毛家湾，回来还和我们两个交流。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陈伯达老往毛家湾跑。根本不是这样。什么老往毛家湾跑啊？别的不说，就起草“九大”报告，在我们的记忆里，他去毛家湾最多三次。你看第一次他们谈的，第二次他拿着那个提纲去的，后来最多再去过一次。陈伯达拟的这个提纲，林彪没有什么意见，回来就按照这个提纲准备材料。叫新华社找资料，找谢富治要北京的材料，但是谢富治不给，说如果文革小组要，要多少我都给，你个人要……我为难。意思是开始有人管这事了。（郑插话：谢富治他很了解情况。）再一个我找了李雪峰，河北给提供了一些资料。在他的报告里讲的一些生产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河北省搞的一些不错的厂矿。

在起草这个报告时期矛盾最尖锐。他整个报告主要讲的是要抓生产。在陈伯达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不断地给我们打电话，说这个报告怎么写呀，等等，我们请示陈伯达，他说：“告诉他们，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先写完再说。”他都不出主意。各写各的。可能那边人家也没闲着，也许早写出来了。后来中央碰头会开会讨论已写出的部分初稿的时候，张春桥提出来，说你光讲生产，不讲运动，意思是唯生产力论，陈伯达就回了他一句，你们写的我看了，就是伯恩斯坦的观点，“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



江青

切”。这就僵在那儿了，一个要搞生产，一个要继续搞运动，抓阶级斗争。主席到后来讨论时说过一句话，说陈伯达有一些意见可以采纳。但到底采纳没采纳我们就知道了。

李：我看到一个说法，说是主席把陈伯达的稿子给原封不动地退回来了，陈伯达一看很难过，有这么一回事儿吗？

耀：有，那是“九大”以后。原封未动。还有一个就是老催他，在起草初期，那两个人在盯着，人家想跟他一块儿写他又拒绝，说他们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说我现在身体不舒服，拒绝见，就是自己在那儿搞。我跟他说过好几次，这个东西呀你得给主席送一部分看看，另外他们两个问你你不理会人家，把别人抛在一边不合适。他说，那行，给主席先送一部分。还解释说主席有个习惯，要全稿一口气看完。接着他写了一个大信封，把第一部分装进去，就让我给主席送去了，结果就没消息了。有次开会，主席上来就问陈伯达，你写得怎么样了？陈伯达还没说话，总理就说了：还不行。主席说，不行就重写。重新组织班子让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写，就这样陈伯达没有说话，会散了以后，他就问总理，说我这个稿子就剩一点了，总理说，没关系，那你就写吧，写完它，写完了留作个纪念也好嘛。回来后，他挺丧气的，到后来，“九大”开完了，主席就把陈伯达写的稿子给退回来了，我一看还是陈伯达写的那个信封，主席在上面写着：“退伯达同志。毛泽东”。主席根本就没拆，开完会就退回来了。我给陈看，说没拆，他一看就觉得很难受，说主席根本没看。我自己在想，你在起草报告的时候老在那儿

卡着，人家一天到晚到主席那儿告状，主席已经知道了争论的内容，耳朵早就听烦了。所以不看，就扔到一边了。

李：既然没看他的报告，所谓“陈伯达有一些意见可以采纳”，也就是说一说而已了。

耀：那是指讨论的时候，陈伯达讲的一些关于抓生产的意见。

郑：“九大”的召开，事实上毛和林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毛已经在抛弃陈了。

## 关于刘叔晏和陈伯达离婚的事

李：除了在这些公事上的纠葛，在私人关系方面，陈伯达和江青是怎么相处的？

阎：我举个例子吧，是关于陈伯达夫人刘叔晏的一件事情。1967年11月中旬，我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刘叔晏11月底或12月初的一天给我打电话，对我的文章夸了一番，什么理论性强啊，水平高啊，等等。我说：“叔晏同志，您有什么事啊？”她说：“我想请您跟江青同志说一下，麻烦江青同志给我安排一个工作。我原来是搞范若愚（《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专案的。我想进一步研究一下知识分子演变的规律。江青同志有什么指示，您写个条子转给我就行。”我说：“好吧，我帮您问问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从十七楼看完电影回十一楼，是走回来的，同平常散步时一样，她走一段要坐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在她休息时，我向她报告了刘叔晏请她给安排工作的事。江青气狠狠地说：“陈伯达的老婆怎么叫我给她安排工作？她的工作应该由汪东兴安排。这个地主婆不好好干事，还叫我给他安排工作，别理她！”江青叫我“别理她”，我当然不能给她传递什么信息，但我感到没法交代——因为她毕竟是陈伯达的夫人啊！在一段时间里我很怕碰到刘叔晏……

春：这件事情，江青当着陈伯达的面，说：“你老婆让我安排工作，那好吧，她不是愿意搞专案嘛，陆定一专案让她搞去。”这样回来，陈伯达和刘叔晏讲了，说让你搞陆定一专案，刘叔晏说：“搞专案？！我不干，这个我可干不了。你答应了？你答应你去干。”刘叔晏把陈伯达骂了一通。陈伯达为难呀，说那怎么办呀？后来陈和江

青说，刘叔晏不干，江青说：“她不干你干。”江青把老头给吓着了，陈就被架起来了。他求谢富治说：“我干不了，绝对干不了。”后来就让谢富治拉一个班子干。这个专案组，我见过有部队的几个人，在中南海甲区西楼给腾出一间房子，专案组在那里办公。陈伯达去过一次，后来交给谢富治，他就再也没有管过。

杨：陈伯达刘叔晏离婚，是谁提出来的？

春：刘叔晏提出来的。她对陈伯达说你搞不了“文革”这个事情，早晚也要垮台，离婚书先写下来放着，以后好办。刘叔晏有政治上的敏感，她觉得陈伯达早晚得倒台。

杨：闹离婚的时候，江青说给她弄走，最后给她弄到山东青岛去了，说她有神经病。

郑：弄到青岛给她安排了什么事情吗？

耀：没安排事情。她自己说要回来，派中宣部来人陪她，给上面说了，上面说不让她回来。后来刘叔晏就发神经了，在大街上骂人等。当时杨得志在山东，赶紧把那条街封锁，把两头都掐死了，戒严了——意思是你爱怎么闹怎么闹吧。实际上江青把她弄到那儿就等于关起来了，说是让她休息。

在中南海住的时候，大概是1968年，刘叔晏制造了一个案子。不知道是装修工还是电工在后院墙上看见了一个脚印，她怀疑这是偷盗，自己找来参加范若愚专案组的公安部的一个人去查，还拍照。这事汪东兴知道了，和江青一说，江青就火了，说：“她派人到中南海来查案？给我赶出去！”不让陈伯达在中南海住了，这就搬到新建胡同。

杨：陈伯达最后和刘叔晏真离婚了？

春：反正总理批了。

## 在华北会议上江青大骂陈伯达

阎：我们今天谈陈伯达和江青的关系，关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上陈、江的关系及其以后的情况还没谈到。

春、耀：九届二中全会以后陈伯达倒台了，我们也被整了。这次全会我们没跟着去，是另外一位秘书缪俊胜跟着去的，会上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会后的情况，我们也只是偶尔听到一些。所以这一段，我们谈不出什么。

阎：缪俊胜同志在外地，我们没请他来，他过去也谈过一些。我想根据我看到的资料补充一些这方面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的情况人们谈论很多了，那是毛泽东和林彪矛盾大暴露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不好直接针对林彪，毛把陈伯达作为“牺牲品”抛了出来。毛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毛把陈伯达选的关于“天才”的语录称为谣言和诡辩，说：“我们只有站在马列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这样，陈伯达就倒台了。

九届二中全会后，1970年11月16日，中央发出《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全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1970年12月16日，毛在三十八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这都是中央文件。

春：我看这些文件说的完全不真实。

耀：说什么“中央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我明明听陈跟我们说过，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根据主席指示，做了分工：周分管中南和西北，江分管华东和西南，康分管东北，陈分管华北。陈去唐山、保定、石家庄等地都是报告了总理和总理批准的，汪东兴也知道呀，怎能说他“乱跑”呢？

阎：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但毛泽东金口玉言，一言九鼎，言出法随，陈伯达的命运就定了。1970年12月22日，召开了有400多人参加的华北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揭发、批判陈伯达以及河北省革委会主任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这个会议开了一个多月（1971年1月24

日结束),江青两次到会讲话,点了好多人的名,批了好多人,主要是批陈伯达、李雪峰、郑维山。她说:“听说北京军区有七个军,陈伯达他辖七个军,还不是太上皇!”“陈伯达是你(指李雪峰)的太上老子!”“这几年我受小人的气,大阴谋家的气。陈伯达提出个口号‘揪小爬虫’,他说他是‘小小老百姓’。什么小小老百姓?他才是个小爬虫呢!他是小小小爬虫,他是王八蛋,两面派。六八年后就是一面派了,他勾结人整我、压我。”“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要打断我的脊梁骨!傅崇碧冲进去,是由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勾结进去的。”“陈伯达是刘邓路线的,最初是王明的人,吹捧他是‘大理论家’。这个大‘理论家’,我接触他四五年,可厉害啦,经常吵架,贪生怕死。在庐山有人说怕他自杀,我说,我观察了几年,不会。”“‘八条’(指1967年1月公布的《军委八条》)是怎样来的?就是陈伯达这个王八蛋反对文化大革命,和几个老总压着林副主席要文化大革命刹车,逼着林副主席搞了几条。”“《红旗》是独立王国,总编辑、副总编辑都是大坏蛋,以后主席就不叫他管了,让姚文元去管,他恨透了主席。他对主席没有办法就恨我,恨姚文元同志。郑维山、李雪峰你们支持的就是这群王八蛋。陈伯达这个大坏蛋,他可能是苏修特务,他和王明一块的。他说:‘你们可不要说我给苏修当特务’,这不是做贼心虚吗?”“陈伯达很狡猾,他仇恨革命,仇恨主席,仇恨我。”……

江青这种充满漫骂语言的讲话,还要放录音,还要印发。总理说:这需请示主席。关于江青这两次讲话,毛批示:“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做内部材料保存。”毛没有批评江青的这两次讲话,“做内部材料保存”,实际上,也就是批准了江青这两次讲话。

## 陈伯达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

李:你们二位作为秘书,能不能谈谈对陈伯达的总的看法?

春:前面说到起草“九大”报告的情况,陈伯达强调搞生产。这确实是陈伯达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一直比较关心经济,注重生产。这恐怕也是他和江青等人最大的分歧。他觉得不抓生产不行,抓科研,

抓生产,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就一直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八大”的时候陈伯达不是提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观点嘛,也有强调发展生产的内容在里面。1963年陈伯达还提出发展现代工业要“以电子为中心”,这是很有前瞻性的(批判他的时候,说他以“电子中心论”对抗毛主席的“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6年我陪着他到西南去,考察攀枝花大型钢厂,三线建设,成都有好多兵工厂他都去看,然后提建议,说要“搞尖端的”。他说我们现在和日本的差距,只有7、8年,所以他当时对生产一直不撒手。他跑首钢,跑清华大学,跑新华印刷厂、酒仙桥的电子城,把清华大学的学生组织起来搞科研,搞激光照排。他提出建议,搞矿石直接炼钢,看能不能行。这是一种探索性的想象吧。我记得陈丕显从上海来,还给他带来一大块,说伯达同志,你提出那个想法炼钢,炼到这种程度还不成钢,实际上还是个铁块。那说明还在摸索、研究的过程中。搁在他窗台上一大块铁疙瘩。他一直抓这个事。

耀:当时看了以后他很高兴,陈丕显说还不行,含铁性太高,他说:“那没关系呀,叫它逐步地好,能炼出来就是很大的胜利。”

阎:讲到搞生产、搞建设,陈伯达确实一直很强调、很重视。“文革”前,他搞工业调查等等,做了很多工作。至于提出“电子中心论”,那确实有先见之明。这点不用说,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发展已经证明了。当然,他也有错误的调查,如在“四清”中关于天津小站的调查,就是一个极“左”的东西,起的作用也很坏。在“文革”中他也犯有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但客观地、全面地和历史地说,陈伯达是人们公认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我亲耳听到周总理在“文革”中不止一次讲:“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最能把毛泽东思想融会贯通的人”;陶铸在毛泽东把他提到中央常委第四位时,他去见主席,“要求把陈伯达提到第四位来”,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参见《一个革命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陈伯达从上世纪30年代就出名了,他提出和发起轰动全国的主题为“抗日和民主”的“新启蒙运动”,在延安时还研究古代哲学思想,新中国建立后,参与起草《共同纲领》、《宪法

草案》、《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等重要文献，在文化科学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如此等等。

本来有些事情是陈伯达做的或有他的份，“文革”后也通通抹去了，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本来是陈伯达、胡乔木二人把田家英推荐给毛泽东做秘书，“文革”后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只剩下胡乔木一人了。实际上，连胡乔木做毛泽东的秘书，可以说陈伯达也有推荐之功。1939年，胡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陈看后赞赏有独特见解，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说“乔木是个人才”，从1941年初毛就亲自点名让胡做了他的秘书。

郑：陈伯达是位复杂的历史人物。陈伯达的文才，在中共的历史上，特别在毛的嫡系中，首屈一指，似可和林彪的武功相媲美。但建国以后，林彪有近十年的韬晦，而陈伯达一直紧跟毛的战

略部署，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他的恣肆文辞。林、陈在毛发动“文革”以后，算是毛身边最后的一文一武；但在九届二中全会后也被整肃下去了。林、陈的结局，事实上宣告了“文革”的彻底失败。陈伯达和林彪一样，对于发动“文革”以及“文革”初期，都有突出的表现，应负有一定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从“九大”到九届二中全会，他们与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开始分道扬镳，无疑是有正义性的。毛泽东把林、陈打成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政治骗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是不能成立的。我还认为，“四人帮”垮台后，两案对他们的宣判，对陈伯达和林彪集团成员的长期关押，应属冤案。今天有必要重新加以清理。至于对他们全部历史、一生功罪如何评判，则另当别论。■

（阎长贵、李宇锋整理）

（责任编辑 黄 钟）

编 读 窗

##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今年第一期发表的宋恩荣、张睦楚的《1950, 晏阳初在去留之间》一文(以下简称《晏》文)文说:晏阳初的第三个儿子晏福民一直在国内,“解放前曾是学生运动领袖、中共地下党员、后任中国国家体育委员会高级干部”,在“文革”中“被迫害含冤卧轨自杀。有很长一段时间家里人没有向晏阳初讲明实情。后来福民的夫人孙叶青到美国来,经不住老人不断追问,只得说出实情,使90高龄的晏阳初悲伤不已。”这些说法有的过于简略,有的不符合实际。由于晏福民是我于1946~1948年在北大的老同学,我在1946年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和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与他有交往,又经过我向北大老同学梁思萃、赵立生和晏福民夫人孙叶青等人了解,在这里特作以下补充与订正。

晏福民是四川巴中县人,1928年生,1940年至1946年就读于重庆南开大学(网上资料说晏福民是在一所教会中学读书,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因此在“文革”中受审查,此说不确),后考入北大经济系,积极参加学生民主运动,思想先进,才华出众,曾任北大大地合唱团指挥,1948年3月参加中共地下

党,8月国民党政府大逮捕时被送到华北解放区,曾在河北正定县华北大学政治部十三班学习,我比他早半年多就险奔解放区投身革命,他到达正定时我已被华北大学研究生部选拔为研究生。我与他在解放区又会面了。12月他在短期训练班毕业分配到河北阜平中央青委工作,1949年3月任全国学联副主席,8月作为中国大学生男子篮球队领队到布达佩斯参加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9月作为最年轻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1950年任全国体育总会秘书,1952年成立国家体育委员会后一直在国际司工作,先后任科长、处长,兼任过党支部书记,得到体委主任贺龙元帅的称赞。“文革”中因其父被误认为是美国特务,他也被隔离审查。1968年12月23日夜,他背着沉重家庭包袱,在崇文门外卧轨身亡。1978年他大姐回国探亲时已得知详情,1984年他的两个女儿已送到菲律宾由其祖父培养,那时晏阳初正在菲从事平民教育。《晏》文说是1980年晏福民的夫人孙叶青访问美国时晏阳初才得知晏福民已含冤逝世的实情,这是不准确的。晏阳初痛失他的爱子晏福民之后,不计前嫌于1985年和1987年以95和97岁高龄两次返国,依旧雄心勃勃,还想在国内继续重办他的平民教育事业。一代爱国知识分子,拳拳爱国之心、殷殷兴国之志,亘久长存,令人感佩。

北京读者 高 放

# 关于毛泽东遗体保存的回忆

○ 于书吉 口述 程宏 采访整理

[整理者按]1976年毛泽东逝世,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保护保存毛泽东遗体列为“一号任务”,后来任务总量扩大和期限延长,遂称“一号工程”。其主要涉及了三大类工作,一是遗体的防腐(后改称卫生保护);二是水晶棺(后改称纪念堂专用设备)的制造;三是陵墓(后改称纪念堂及雕塑)的设计建造。“一号工程”在时间上分为三个阶段,吊唁瞻仰期间为遗体应急性早期保护保存阶段;追悼大会后为研究性中期保护保存阶段;遗体迁入纪念堂后为规范化长期保存阶段。在早期阶段,医学与化学卫生保护方法,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组为主负责实施,物理低温保护保存方法,主要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为主提出了方案和进行了实施,在中期阶段后,物理所又领受承担了光整容等三项任务。物理所组织骨干力量全力以赴,最终完成任务,并于1978年获得国家科委的“重大科学成果奖”。

“一号工程”是一项举国范围的技术集成系统工程,动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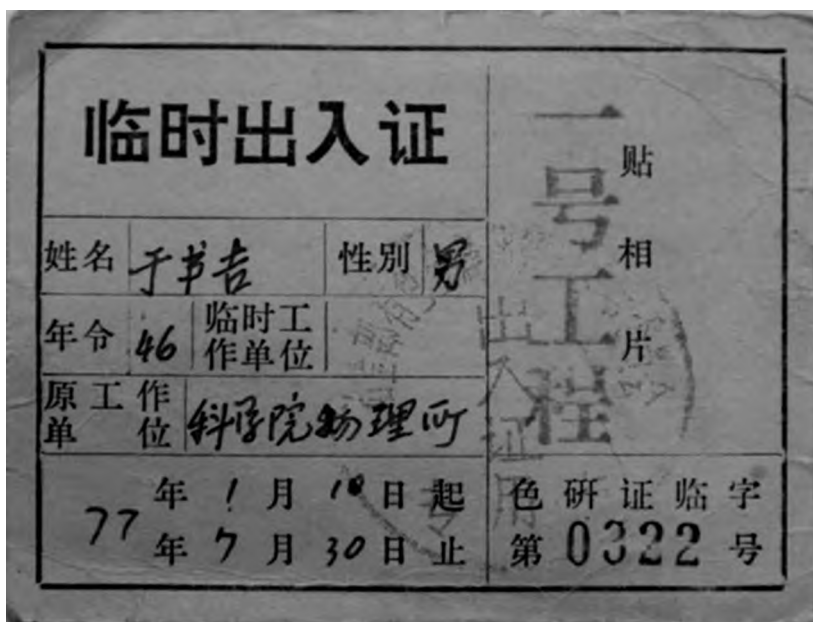
年在特殊时期的政治背景下,“一号工程”早期任务十分紧急,一些程序没有走常规,留下的文档资料不多,一些当事人的口述资料至今未见公开发表,特别是有关低温保护和光整容任务的资料更为匮乏。受访者于书吉先生是早期低温保护和中期光整容任务的领受者和参与者。

20世纪50-70年代,我在中科院物理所附属工厂和光学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为科研一线工作服务。1976年在“一号工程”早期阶段,我为中科院物理所领受和亲自参与了低温保护保存遗体任务,进入中期阶段后,又领受了“光整容”等三项光学任务。当年有关领导都强调不能打听与自己工作无关的内容,要永远保密,因此我也没有留心观察和刻意记住,37年的光阴又磨平了我记忆中的刻痕,很多细节想不起来了,但作为我一生中的重大经历,一些大事件和关键点的记忆应该差不多。

## 突来低温保护任务

1976年9月11日晚9时,时任物理所革委会副主任常龙存让工厂支部书记杨风台到我家通知我:“晚上在家待命,不要走开,有车接你参加重要会议。”但具体时间、地点、内容和有关与会人员等,杨风台都不知道。

当晚大约11点钟,所里派了一辆小轿车到中关村69楼305号我的寓所接我,车里只有所里的司机和我。车子飞快地奔向三里河,到了科学院院部后换了一部小轿车和一位司机,车子里还有一位陌生军人。那位军人神情严肃地问我



在实施“一号工程”中,进出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的临时出入证

“你是物理所的吗？”我说“是，咱们去哪里？”“到了你就知道了”，之后我们未再说话。差不多半夜12点钟，我们到了人民大会堂，那位军人把我领进了大会堂的北京厅。

北京厅内大约已经有十几个人就座，有一些穿军装的人，还有人陆续进来，不一会儿人数达20-30人。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等政治局常委进来了，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副总理谷牧、卫生部长刘湘屏等党政军领导在场。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主持会议并首先说道，政治局已经决定和开始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为期一周的瞻仰吊唁活动，本会议是研究在吊唁活动中如何确保毛主席遗体安全的问题。这时，我才明白这个会议实质上是国家领导人向有关专家咨询如何保护保存毛泽东遗体的工作会议，与会者应该多为医务界和工程技术界的领导和专家。华国锋讲，白天在举行瞻仰吊唁活动时，吊唁大厅温度过高，对遗体保护很不利。原来白天有机玻璃棺罩尚未做好，遗体直接暴露于室内环境，尽管启动大厅内所有风冷设备，撤出管乐队现场演奏，也抵不住大量流动瞻仰人群带进室内的初秋热浪和人体散发的体热，使得室温很难降到保护遗体的要求。

华国锋说，中央已经决定永远保存毛主席的遗体，所以方案不仅要满足当前需要，还要从长远考虑，提出“万无一失”的永久保存的稳妥方案。大家围绕着遗体的保护保存技术展开议论，主要都是医学和化学方面的问题。会议中间江青进来，在华国锋身边讲了几句话又离开了，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则自始至终都没有讲话。华国锋对保护保存遗体非常上心，讲话的神态语态，都表现出心急如焚的状态，我对此印象很深。华国锋指出将棺罩内温度降到安全范围是一个最紧迫问题。

在短时间内将保存遗体的棺内温度迅速降下来，并达到均匀一致，显然一般民用制冷技术不行。华国锋说遗体最好保持在4℃左右环境中，并让大家就如何控制棺内温度问题发表意见。与会者彼此相互私下议论，但始终没有人提出具体解决方案。这时华国锋问道“科学院的专家来了没有？”全场无人回答。华国锋换了个词语，急切地再问道“科学院有人来了没有？”我看

了看周围，仍然没有人回答，于是我站起来答道，“来了！我是科学院物理所的职工，不是专家。”华国锋说“也好，你来也好，就谈谈你的意见吧！”

我首先向华国锋和大家介绍道，“物理所有个低温物理研究室，还有个生产液氮的车间，掌握低温制冷技术”，接着我大胆提出了我考虑的设想：“我多年来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液氮冷却工艺，我认为先利用液氮冷却惰性气体氩，再用低温氩气冷却遗体并同时驱走棺内氧气，从原理上讲，可以达到快速降温、均匀冷却、减少氧化的要求。”华国锋让在场专家评论一下我的设想。当时与会者都表示认同这个技术方案，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最后华国锋讲，“就按科学院的这位同志提出的办法办”。我接着补充说，“但这个方案是否真正可行，我没有把握，需要回所与专家讨论并需做实验后方能实施。”华国锋指示道“你现在就回去，抓紧落实实验，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要耽误”。此时差不多已经是9月12日凌晨4-5点钟了。大会堂派小轿车把我送回物理所，我向所负责人汇报传达了华国锋和中央派给我们的任务和要求。

物理所对“一号任务”非常重视，所里立即组织了有关专家和科研人员开会研究这一方案。低温物理专家洪朝生等都认为这个方案合理可行，至于棺内外温差可能导致的棺外表面结霜问题，只要在棺体外周设置冷风幕即可解决。

会后五室（低温物理室）和物理所工厂等单位组织人员分头行动，上午工厂员工用有机玻璃板搭成一个实验用模拟水晶棺，调集了氩气和液氮装置，准备好了实验条件，下午实验成功。当晚这套装置就被运到人民大会堂安装启用，所里派我和另外三名操作维护人员杨克剑、王昕元、王殿英等到场，见到了刘湘屏，我们连同设备一并归遗体保护小组指挥派用，吃住在现场，一直持续到9月17日遗体瞻仰活动结束前。

## 再领受光整容任务

遗体瞻仰活动结束后，遗体进入中期保存阶段，我们这些有关人员都临时转移到历史博物馆。大约9月19日左右，专门负责遗体保护的国



务院“第九办公室”派人找到我,将我带到一个小会场,谷牧和水晶棺组副组长肖秧在场,此外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

谷牧说,水晶棺小组和纪念堂设计小组正在展开工作,接着谈了三个问题,首先是如何消除遗体在棺壁上的反射像,其次是为了将来瞻仰时让遗容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不能使用化妆用品,要使用光,第三是要滤除照明光中的紫外线和红外线,严格控制其辐射安全剂量。由于谷牧等中央领导已经了解物理所在降温任务中的工作能力和实际表现,对我说“物理所要多做些工作”,期间肖秧还代表水晶棺制造厂家发表了一些技术意见。谷牧最后对我说“你们中科院物理所就承担这三项工作吧”,我立即表示一定将任务带回物理所。

第二天上午,我向所里汇报了中央指派的任務。所里马上做了研究部署,将这三项光学任务交给了第三研究室(光学物理室)。这三项光学任务都涉及一些技术工程领域,需要向所外的有关单位寻求协作和帮助。此前我在三室工作过四年,所里决定仍让我继续参与协调和上传下达的联络工作。物理所很快制定出工作计划,展开了实施。

关于“消除棺壁反射像”的工作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设计出合理的棺侧壁倾斜角度,确保在两米外眼高1.5至1.8米处看不到棺壁映射重影,这项实验工作由三室的杨国祯等进行了理论计算;二是在棺侧壁上镀光学增透膜,降低光线反射率,从而降低重影的强度与数量,基本消除反射像。这在理论和实践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最大的困难是工艺问题,在当时国内谁能镀2米以上的大膜?镀层能否均匀不“花”?这需要验证。

1976年9月下旬,我带了一块光学玻璃板,乘飞机去合肥的安徽光机所做镀膜试验。当时北京到合肥的民航飞机还是苏制短程伊尔-14型客机,大约30人,途中颠簸得很厉害。结果合肥



补发给于书吉的奖状

的设备由于文革封存多年没人管理而无法启用,后来所里陈庆振又去过,还是不能工作,同时了解到中科院另外三个光机所也不能镀。

1976年深秋,三室的聂玉昕陪着肖秧等人开了半天车,一路颠簸跑到中科院北京天文台兴隆站,观摩了大尺寸玻璃板材镀膜过程和结果,验证了2米尺寸材质的镀膜工艺问题可以解决。出于加工方便的考虑,水晶棺组决定要另外制造一台镀膜机。两个多月后,北京兰州等地的真空设备厂和科研单位联手造出了一台当时全国最大的真空镀膜机,放在了北京玻璃总厂内。

1976年12月9日下午,华国锋等在历史博物馆现场视察“一号样品”光学玻璃棺,当晚水晶棺组组长韩伯平召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指示意见。我因为其他任务没有参会,会后物理所给了我一份会议纪要。纪要显示,中央领导指示当前重点是消除棺壁反射像,第二是保障光整容效果,同时还对棺形设计、棺底材质、升降设备、大厅装饰等做了事无巨细的指示。华国锋说“要搞成世界上最好的”,叶剑英说“要后来居上,比胡志明和列宁的(遗体保护保存)都好,要世界上第一”。

在“紫外和红外光辐射安全剂量”的研究工作中,1976年9月底我和三室的吴令安到北医三院取来一个替代尸体头颅,在物理所受控核聚变楼的大厅隔离搭建起一个临时房间,吴令安、杨国祯等人与北京医学院在此合作研究,提出了紫

外和红外线的过滤方法和在遗体长期保存状态下的安全辐射剂量。

在“光整容”的工作中,北京玻璃总厂提出“内投射光”方法,用光导纤维将水晶棺底部氙灯的光引入棺内,通过棺顶的反射镜再投射到遗容上,杨国祯参与了光路的设计计算。物理所提出“外投射光”方法,从棺外向遗容两侧投射整容用彩色校正影像,改变凹陷和胖瘦感觉。外投射光整容效果好,其工作量很大,参与者很多,分工很精细。我记得有许祖彦、吴令安、王玉堂、俞祖和、朱化南、刘承惠、卢振中和工厂技师蔡妙全、张勇等人,他们在中科院感光化学所、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中国煤矿文工团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等单位配合下完成,彩色胶片拍摄、色彩校正、布光等工作都在复制模型及那个替代尸体头颅上做了大量试验,并研制了一套投光仪,将其隐秘安装在墙壁外的专用投光工作室,光线穿过墙壁孔洞投射在遗容上,达到了颜色和形体修正的双重视觉效果。

1977年8月下旬,遗体移入纪念堂,三室人员多次到现场,赶在9月9日纪念堂落成典礼之前,安装调试了设备。至此物理所完成了“一号工程”中期阶段的三项光学任务(注:据了解,物理所在“一号工程”中期阶段还承担完成了另一项基础性工作——模拟遗体形变研究)。

## 尾声与两个不明白

在遗体保护保存中期阶段的光学任务中,我的工作基本上是辅助性支持工作,1977年春,“一号工程”中期阶段进行到一半,我被调派到其他任务。1977年夏,“一号工程”其他绝大部分核心内容基本完成,纪念堂工程现场指挥部召开了总结工作和表彰先进大会,物理所十余人获得“先进工作者”称号的奖状。我徒弟张勇去开会时没有发现我的奖状,想当然以为我已经提前领走,回来后询问我,才知道我没有。张勇找到物理所领导询问,结果物理所领导发现由于负责人更换,工作交接不完整等阴差阳错原因造成了遗漏,最后上报到科学院,由院补发给我一张。

物理所对“一号工程”极为重视,组织骨干力量,全力以赴。1978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物理所承担的“一号工程”任务获得国家科委的“重大科学成果奖”。一些参与“一号工程”的青年专家,后来在各自领域内成长为有名气的科学家甚至为院士。

当年我是科学院物理所附属工厂的技术工人,不是科学家,也够不上所级中层干部,竟然有机会与国内顶级专家一起参加华国锋召集的专家咨询会议,简直像个天方夜谭,若干年后发现其中有两个想不明白的问题。

一是在科学院内,物理所论规模算是个大所,人才济济,专家遍是,为什么指派我出席会议?2011年,常龙存从美国回国探亲时来看望我,聊天时我就这个问题问起了他,他说这是所革委会研究决定的,只记得是革委会副主任、“三结合老干部”郭佩珊提议的,而郭佩珊于1985年去世,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录,这个问题无法直接考证了。

二是在那个专家咨询会上,我的学术辈分很低。我提出两级冷却遗体的方案实在算不上什么尖端和创新的科学技术,当年与会的科学家中应该有人知道,起码是听说过“液氮制冷”吧,但是无人站出来提议或推荐相关领域专家和单位机构,也有点不可思议。

如今回过头去看历史,结合当年知识分子的地位处境和政治气候,或许我这两个问题也不算个问题。

(采访整理者单位为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本文是采访者单位在承担中国科协课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采集工程》之一的衍生采访,文责个人自负。2013年5月于北京中关村)■

(责任编辑 黄 钟)

###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  
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  
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 崔秀岭**

**手机: 13611159388**

**电话(传真): 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 102488 收款人: 崔秀岭**

# 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

○ 洪振快

## “特货”即鸦片

谢觉哉在日记中多处提到中共在延安时期经营“特货”、“种某物”等。“特货”就是鸦片，证据如下：

其一，在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用“特货”指代鸦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普遍用法。在贵州从事鸦片生意18年的商人伍效高，回忆自己经营鸦片业的经历，就说到“续办特货。……代理……鸦片购销业务”。（《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0页）当时鸦片商人以“特货”指代鸦片，经营鸦片的商行被称为“特商”，鸦片税也叫“特税”。

其二，特货以“两”为单位，且价值奇高。按1942年延安市主要物品价格比较，该年12月，小米一斗为125元（边币），而特货一两是1400元。（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

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摘编》，以下简称《财经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四册，第438-439页）这意味着，特货一两，值小米11.2斗，特货一斤，值小米5376斤。延安时期，粮食供给“标准每人每天吃粮一斤四两，只军队多些，每人每天一斤八两。”（《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454页）以此标准计算，只需约1000斤特货即可解决一支一万人的军队的一年的口粮问题。

其三，当年军队走私鸦片产生的纠纷案中也提供“特货”即是鸦片的信息。（年份不详，疑为1942年）8月24日下午，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率领禁烟督察队到绥德义和镇“督征特产兼查缉私货”，“区政府即向督察队报告，当时并说龙国华在义和镇私贩烟土”。龙国华为留守兵团供给部管理科长，当时在其住处（出差住店）搜出鸦片30两。龙国华态度强横，拒绝接受检察，与督察队先谩骂进而相互殴打。事后，11月12日，留守兵团组织部写信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说被搜出的鸦片不是龙国华



龙国华案档案，陕西省档案馆藏

的。龙国华在给贺龙等兵团领导递交的报告中说，督察队“将店内收(搜)出之特货，诬认为我所购”，同时还告了霍维德一状，说他“以残酷手段对待革命同志，实有违党中央之政策”，要求为自己清洗耻辱。林伯渠收到材料，转给了财政厅。(见史志诚主编：《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以下简称《禁毒史料》，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261页)在这个事件中，“特货”、“鸦片”、“烟土”是 synonym，清楚显示“特货”就是鸦片。

其四、中共内部秘密文件透露的情况。1943年8月1日，延属地委发布了一个关于禁种特产规定的秘密通知，由时任延属地委书记张邦英、代专员王震、延属分区专员兼延安市市长曹力如联合签署。“秘密通知”多次提到“烟苗”、“烟户”，要求：“(一)立即深入的调查留有烟苗之人家、亩数、收获量，以便有计划的进行没收，最低限度公家要没收到全收入的80%。(二)在没收时，烟户最多只能留到20%。”此秘密通知中提到了“特货”，显示“特货”即是“烟苗”的出产品。其要求第四点说：“各县现存之特货，无论旧存或新收均\*立即送交专署，统一出售，不得拖延，不得隐瞒，也不得在下边出卖，续收到的，应随时送来论价出卖。”“通知”最后强调“以上办法，只作执行之准则，不许宣布，并须严格切实执行，对群众仍称没收处罚”。(《禁毒史料》第137页)

其五，销售鸦片人员的直接回忆。据当年受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1988年出版，第99页)

## “特产”贸易及其在边区财政中的地位

要了解中共在延安时期为何经营“特货”、“特产”，需要了解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军被改编成八路军和新四军，每月国民政府拨款60万元(法

币)。从1937年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外援，比例占到51.69%—85.79%，合计为82.42%。外援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国民政府拨发的经费，二是海外华侨及后方捐款，而前者为较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3、427页)由于国共军队冲突，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此之前的1940年11月起国民政府即停止拨款，继而对边区进行封锁，从而使边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了极大困难。按毛泽东的话说，“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又“渡过了困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东北书店1948年出版，第748页)那么这个困难是怎么渡过的呢？一个办法是征公粮。1937年征1万石(担)，1938年征1万石，1939年征5万石，实际收到分别是13850石、15971石、52251石。(《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53页)而1941年猛增到20万担。当年征粮虽然达到了任务，但引起老百姓很大不满，故而第二年减少了4万担。

1948年2月18日，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了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其中对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为了渡过难关，1941年，通过开发食盐、加强税收工作、清理公产、发行建设救国公债(618万元)、征收公粮(20万石)、公草(2600万斤)、禁止法币发行边币(1054万元)等动作，想尽了一切办法，“经过整年的干部动员，县长、县委书记亲自带上运输队露宿风餐，往返运盐，征粮工作团有的除夕还在催收粮款，大家都拖累了，群众也烦了，年终结帐还差568万元(占岁入22%)，不得不祈灵于印钞机”。该年“虽然勉强叫各级党政军人员没受冻馁，但是人民的负担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了”，“机关部队斫公树，拆庙宇，毁钟，挖墓，在各县成为一时的浪潮，至于烧酒贩毒等违法行为，更是司空见惯”。

“一九四一年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尚因为库空如洗不敢确定统筹统支的方针，愁煞了当时的财政当局。元旦那天，财厅长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这十三箱肥皂就成了一九四二年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方针之物质基础。”显然，这里的“肥皂”不是普通肥皂，否则如何能成了“统筹统支为主的财政

方针之物质基础”？

“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又为下半年的财政打下雄厚的基础,八月后新货收起,再加下半年税收增加,各机关部队继续从事生产自给,这样就勉强的渡过了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特产收入139623000元,占全部岁入40%……由于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大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谓“财政上找到了出路”,就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随后即谈这个“特殊财政内容的根据”：“边区财政若想打破难关……除大量生产外,则必须借助于特产。”

报告称：“靠陕北三宝(食盐、甘草、皮毛)输出,也很困难,甘草因运费大,不能大量出境,绒毛多自用,出口很少,只有食盐尚可能维持,经党政军大动员,一九四三年才运出价值72709万元的食盐,占全部输入13.50%,绝不能解决问题。”

“靠印钞机更是危险,1943年八、九、十三个月发行边币十亿元,就使边币与法币比价从六元跌到十三元。”

“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并专利代销晋绥的特产,不但解决了当年的财政困难,还盈余了27%(108773000元),支持了一九四三年春季的财政,一九四二年也靠它解决40.82%的财政收入。”

之后,算是开始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一九四二年边区高干会上,毛主席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工作总方针,一九四三年初为统一陕甘宁、晋绥两解放区财经领导,成立西北财经办事处,由贺龙亲自领导。”该年,“特别主要的是这一年晋绥给以很大的帮助,送来大量特产,并由陕甘宁代销晋绥特产抽20%的贸易税,作为财政收入,其余作为财政家务之积累,这样建立了雄厚的家务,使党政军人员生活,进入相对的丰衣足食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也发生了严重的贪污和铺张浪费现象。”(《财经史料》第六册,第15-2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较为简略,有些具体的情况还可以从陕甘宁边区负责财经事务的财政厅和负责物资进出口事务的贸易局、物资局的报告中获得,并可相互印证。

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棉花、洋纱、土布、军工器材、电讯器材、医药器材等

物品需要大量购入,尤其是棉花和布匹。边区棉花缺口甚大,负责物资进口的贸易局估计,1943年全边区政府与人民需布20万匹,为此需棉花300万斤,而边区所产不过100万斤,200万斤“需依靠贸易机关帮助解决”。(《财经史料》第四册,第175页)棉花等物资需要大量外购。外购拿什么去交换?主要就是靠“特产”。1942年边区贸易局所做的总结说:“在出口货物中,特产占出口总值的68.66%,食盐占13.59%,二者共占出口总值82.25%,如不算特产,食盐则占了出口总值半数左右,占边产品出口总值的三分之二。由此可见,运盐出口还是边区对外贸易中的命脉。”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不算特产,食盐则显得非常重要,但如将其与特产相比,真正的命脉无疑是特产。

进 口			出 口		
商品种类	金 额	百分比	商品种类	金 额	百分比
布匹类	439,920万	67.83	特 产	368,325万	68.66
桐毛及其制品	67,309万	10.4	食 盐	72,709万	13.59
杂货类	45,482万	7.03	油 类	30,129万	5.63
烟 酒	35,059万	5.42	杂货类	24,232万	4.52
五金类	23,722万	3.68	药 材	19,705万	3.67
食品类	14,925万	2.31	皮毛及其制品	6,403万	1.20
迷信品	8,125万	1.26	牲 畜	11,696万	2.18
文具纸张	7,405万	1.14	木材石炭	2,980万	0.55
牲 畜	3,992万	0.62	合 计	536,472万	100.00
医药器材	1,325万	0.21	总值	1,153,736万	
合 计	647,264万	100.00	入超	110,792万	

陕甘宁边区1942年进出口情况(《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0页)

1943年,边区银行研究室主任苏子仁在讨论《边区金融总结》时说,解决边区财政问题的方法有三个:“1、收税;2、借债;3、膨胀通货。在边区税收(包括公粮、贸易税等)不够开支,公债行不通,不采取通货膨胀,困难就难以渡过。事实上几年来我们解决问题所依靠的物质力量,按其重要程度排列次序是黑(特产)、黄(公粮)、绿(纸币)、白(食盐)”。(《财经史料》第五册,351页)他说得很明白,在边区财政中,“黑”——特产的重要性排在第一位。

所以,特产在边区财政中尤其重要。财政厅对1942年的工作总结透露:“戊、特产营业为了弥补本年财政预算3000万元的巨大赤字,并为明年财政奠定基础,不得不利用特产营业以渡过难关。全年共收99022181元,若连存货则达11000余万元,占本年全部财政收入的42%强,这

说明了本年如无特产营业,虽有各机关生产,仍难渡过难关。”(《财经史料》第一册,第171页)

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贸易在财政收支中的比例:

#### 边区特产贸易收入统计

年代 收入金额

1942 139623000(边币)占岁入40.00%

1943 65347927(券币)占岁入40.82%

1944 13538877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26.63%

1945 757995348(券币),解决财政开支40.07%

(《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26-427页)

特产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而上述材料也表明,所谓特产,就是鸦片。

另一个问题是:1941年以后的数年间,大致每年销售了多少“特产”?约略如下:1941年8月15日-11月30日,三个半月,销9260.5斤(《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95页),平均每月约3000斤。1942年,销出3.12万斤。1943年,“原定计划为37500斤,实际只推销36250斤”,约略说是3.6万斤(自营、代销合计)。(《财经史料》第四册,第73页)1944年的销量可能更多。1944年6月1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谈上一年贸易问题:“特产出口最多的地区是关中,占31.86%;陇东次之,占26.9%;……最近据关中的同志谈,今年销量可比去年增加60%;又据新从陇东归来的同志谈,陇东今年的销量,也可较去年增加一倍多。由此可见,去年特产滞销,主要也是由于我们贸易局工作的缺点(如下半年定价过高,没有积极去想各种推销办法等等),而不是其他。”(《财经史料》第四册,第58页)如以较上一年增加60%-100%计算,则销量当有6万斤上下。

“特产”销售在各地具体是怎样操作的?据梁爱民的陈述,可简要归纳如下:

“我接受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改扮为商人。组织交待任务时说,如果被敌人发现,只能说自己是私商,说出真实身份,就被视为叛变。”问题是,鸦片值钱,在运输过程中如果没有保护,则可能被劫被抢。所以作者到达陇东后,即去找驻军385旅旅长王维舟、政委甘渭汉,提出困难:“现在我以私商

的身份经营‘土货’,路上的安全问题不好解决。”甘政委答道:“这好办,我们派人护送,随叫随到。”“三八五旅对我们的工作全力支持。从驿马关到西峰镇有二三十里路,匪情严重,路途极不安全,货物往返非有部队护送不可。只要我事先给王旅长打个招呼,他马上就派一个班护送。”

作者说,他通过向国统区销售“土货”,换回了“法币、金银和我们所需的商品”。刚开始,是秘密进行;1942年,业务即扩大,人员逐渐增加,“于是我们租了间房子,开起门市来。但这不是我们的真正业务,而是起掩护作用罢了。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向地委和部队提出要人,很快得到支持。人员多了,就向下面延伸网点。首先在西华池和驿马关设了店。接着,在五个口岸(与国统区接壤的地方)设了店。这些分店都设有门市部。……各分公司的业务重点是发售‘土货’,再根据交通情况进购商品。”业务越做越大,到1944年,“我们公司开始办工厂。在庆阳开办了榨油厂、毡房和过栈行。在西华池办起了卷烟厂……”在经营过程中,“延安粮食奇缺,要我们支援。我们立即在陇东大量购粮,然后运往延安。”(《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112页)

## 南泥湾有没有种罌粟卖鸦片?

根据现有资料,359旅在南泥湾既卖过鸦片,也种过罌粟。直接证据就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南泥湾调查》。

1943年,西北局对南泥湾进行了调查,其中有一段涉及了“特产”和“收烟”的问题。

据此调查,南泥湾是1940年被发现的。同年末,中央财经处开始计划开发。1941年初,仅有中秘、中财、中组、中青四个农场,7月增至14个。5月,八团到金盆湾;7月,炮兵团到南盘龙川,11月警卫营开到。1942年,成立农场管理处,以军委农场李世俊为主任。3月,特务团开来驻马坊;6月,九团开来驻九龙川;8月,四支队来驻南泥湾,“皆曾种地,但中心在种特产”。本年农场增至30余个。该年全区种地面积共约计15000亩;其中川地9000亩,内民种6000亩,机关部队3000亩;山地6000亩,内军民各半。

调查中说,部队开到南泥湾后,“种特产向老

百姓调剂了几千亩川地”。

1942年各单位的种地情况,有一个调查表,

一九四二年各单位种地面积调查表

项目 单位	粮 地			特 产 地			菜 地		共 计	材料来源
	亩数	收烟数	每亩产量	亩数	收烟数	每亩产量	收菜数	每亩产量		
八 团	4000	327石	8.2升	1000	300两	3.3两 即烟地	54000斤	540斤	5000斤	陈团长谈
特务团		100石 干草七万斤			100两		20000斤		900斤	八团级干部谈
警卫营		50石			800两		50000斤		700斤	李世俊
九 团									850	同上
炮兵团	329	47石	1.4斗	600 (只80 亩发芽)	几十两		120000斤	540斤	1149	西参谋处材料
四支队										未评
共 计									8500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一九四三年(一),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4年出版,第272页。

如下:

表后还有说明:“估计八团有一部分不在南泥湾境内,但各团种地至少五〇〇〇亩以上,据许多同志谈,去年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而种特产的缺点,第一,贪多;第二,缺乏经验,未好好的采访老百姓的意见,如炮兵团下种时,老百姓说太早,种了不出来,我们不听,结果六〇〇亩只出八〇亩。其他施肥割烟皆不熟悉;第三,种子不好也有关系,老百姓存的多是一九三五年以前的种子。”

这个调查表和后面的说明透露了很多信息。从表中看,土地分成了三种用途:粮地、特产地、菜地。粮地是种粮食,菜地是种菜,特产地是种什么特产呢?其中八团一栏,特产地下有用地1000亩,收烟数300两,每亩产量“3.3两,即烟地”的说明。特产是“烟”,而每亩产量仅仅3.3两。从中看出,调查表中所谓的“烟”,不是普通的烟草,而是特殊的罌粟。其中缺点的第三条,即种子多是1935年前的种子,也是一个旁证,因为1935年国民政府开始严禁鸦片,种植罌粟变为地下活动,老百姓留下的多是该年以前的旧种子。

调查材料还说明几点:一,种特产(罌粟)的地是向老百姓调剂过来的几千亩川地,不是军队自己开垦的。二,“吃亏处在把农业生产中心放在特产上”,“贪多”,可见“特产”成了生产中心(调查报告前面已明确说“中心在种特产”),种粮倒在其次了。三,没有经验,又不听有经验的农民劝告,种罌粟不得法,以致炮兵团下种600亩,

只有80亩发芽,收成总共只有几十两,亩产可能连一两都不到。四,3000亩川地,只收获不到

1300两的特产,成效很差,但若以1942年12月的延安市价来看,这些特产大致值1400石小米,比起种粮所得为多。五,参与种罌粟的有八团、特务团、警卫营、炮兵团,其中除炮兵团外,其余都属359旅。六,信息来源可靠。八团即718团,其团长为陈宗尧,与材料来源中所说“陈团长谈”相符。特务团、警卫营的材料来源则是李世俊,李世俊是农业专家,也是农场管理处主任。显然,陈宗尧和李世俊都是开发南泥湾的权威人士,其信息是可靠和可信的。七,炮兵团是八路军总部炮兵团,这意味着其他部队也在南泥湾种了罌粟。

359旅曾经种罌粟,还有一个佐证,即前文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提到:“一九四二年春季边区各县特产……八月后新货收起”,“一九四二年边区自产特产”,说明1942年边区各县曾“自产特产”,春季下种,8月收成,359旅种植罌粟“自产特产”与之相符。

现有资料也显示,延安时期种罌粟的不止359旅,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前述刘向三1944年的调查报告,提到其他部队机关种罌粟的有:保安纵队、二团,地点都在关中分区。

而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也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罌粟。王锡富,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该年5月,他被分配到政委会开办的元兴商店工作。“到总店报到后,才知道这个商店不是做买卖,而是经营大烟的,凡调去的同志都不愿干,争着调出,经店领导开会动员,再三说明生产大烟对支持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大家的认识才慢慢提高。”后来,他被分配作复查员工作,任务是“确定每亩烟的生产产量,收割后再复查是否达到预定的数量”。“确定亩产烟量时,要根据烟的品种、土质的肥沃程度,烟苗的疏密,长势情况及烟桃能割浆的刀数等条件来核定,同时,要考虑到割烟的技术水平,如将烟桃割漏了就会不出或少出浆液。

一经核定测量后,烟户如交不上来,则由驻在所(分店在中心村镇设的机构)人员向烟户催要。更有的个别户隐瞒留用,欲私卖钱,只交部分烟土。这样就达不到定量要求,驻在人员只得动员说服,必要时有的个别驻在人员(都是出院的伤病员)就用皮带逼迫这些烟户上交烟土。……我记得有一位妇女被逼上吊致死。”

王锡富在文中说,“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胜利后,在解放前实行土地改革,组织大生产。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文中还说,1947年播种后的大烟长势良好。文中也点明,“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他点出了一个他熟悉的人,“我认识一个名叫宋嘉仁(后任伊春市财政局局长)的就是在大烟地里复查烟产量时熟悉的,当时他是通化林木公司(即辽东林营局)西大川事务所所长,他身背一支七九式步枪,也跟在烟地里劳动。”宋嘉仁算是机关的,部队也有,紧跟着的后文说:“在复查部队生产的烟量时,有位营长(关里来的老干部)单独告诉炊事员给我做了两碗面条,可以说是很好的保健饭了”。部队殷勤招待了这位复查员,显然他对评估“部队生产的烟量”有一定的权力。(《伊春文史资料》第八辑,1993年8月出版(内部发行),第216-219页)

359旅不仅在1942年“自产特产”,其后数年中也应该一直在贩卖鸦片。前述刘向三的调查报告,对1944年359旅在酃县的走私情形,一共举了六个例子,但“仅举典型报告,如有需要容后补充”。除此之外,359旅所属大光商店因贩卖鸦片还与子长县政府发生纠纷,把边区军队、政府最高领导都牵扯进去了。

1942年6月12日,山西人高光富等人携带鸦片,由358旅715团运输队保送(每两鸦片保送费法币8元),到达子长县,由359旅718团开的大光商店出售,被该县瓦市公安局查获,高光富等被抓。公安局要求大光商店交出鸦片,但大光商店开始不承认,后承认买了200多两,但拒绝交

出鸦片。由于没有赃物不能判刑,而高光富等又是外省人士,不能长期羁押,子长县陷入了为难处境。事情拖了将近半年不能解决,12月5日子长县县长黄聚俊、裁判员李桂荣向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呈文汇报,要求“速示办法,以便遵照宣判”。19日,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向联防司令部贺龙发去公函,认为犯人已经在押,则作为赃物的鸦片,“亦当随案移转,不应仍存大光商店为合法”,为了“不致使以后工作发生困难”,询问“究应如何处理?尚希查明并裁酌示复”。公函由边区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转呈,29日贺龙、徐向前、肖劲光复信,答复:“第七号公函接悉!内转呈子长县为烟土案与七一八团大光商店纠纷事,业经去函查讯,并着转饬该店将存货如数交出,给予惩处,特复。”1943年1月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签署给予子长县县长的批答,告知贺龙等复函内容,并表态:“现在你们就照联防司令部贺司令的这封来信办理好了。”按理,有了贺龙批示,事情就好办了。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1月31日,子长县县长、裁判员再次向林伯渠、李鼎铭呈文,告知情况:“奉令之后,即将该商店尹主任转案讯究,追要所买烟土,尹主任声称:‘我买烟土,是拿棉花和布匹换的,货物已由高光富的团伙董姓驮去,况烟土已交给团部了,不能交出等语’”。后面,他们分析说,高光富和大光商店鸦片交易还没完成即被逮捕,“连打条登账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给棉花布匹?他们说好是两个月后给布,又哪里是马上给?“该店买烟,不肯交烟,而该犯高光富等又不能长期管押不判,所以我们的意见,将该烟犯高光富等解送钧府处判较为便利,是否可以?请批示示遵!”看起来,尽管有贺龙、徐向前、肖劲光等边区军队最高领导层的批示和边区政府最高层的批示,大光商店仍然不愿遵守边区法令,而子长县也奈何不了,所以只好将难题往上推给林伯渠、李鼎铭。此案最后如何了结无从知晓。(《禁烟史料》第243-247页)然而,此事比之一年多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仍属较小。

1943年3月20日,边区政府禁烟督察处在绥德的督察队接到密报,说359旅合作社张主任经常在东关零销鸦片,当晚又将卖鸦片50两,“该处即派督察队长及缉私员等四名前往缉私”,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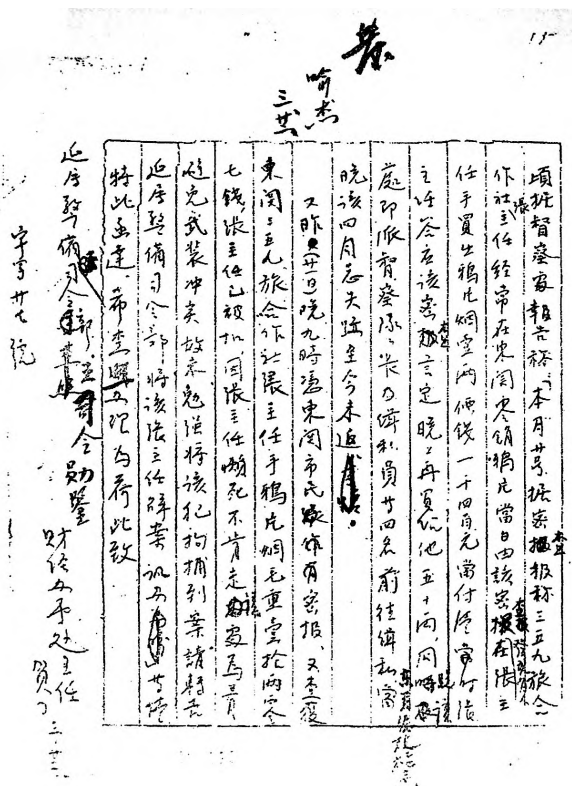
烟史料》第264—267页)贺龙说“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而没有说私贩鸦片是违反禁烟法令,显然是对内说的,因为鸦片统一由叶季壮任局长的物资局统一销售是内部政策,而对老百姓来说私贩鸦片是犯法的。

## 边区党政军在“特产”贸易中的冲突

上文359旅合作社和禁烟督察处的冲突,暴露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就是贺龙所说的“私犯(贩)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此事的背景,是边区贩卖鸦片政策的演变。从现有资料看,为了渡过难关,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财政厅主张向国统区贩卖鸦片以维持贸易平衡,解决财政难题。刚开始时,贸易由边区政府贸易局下属的光华商店具体负责。但这只是在边区政府系统,部队和机关所属的公营商店各自经营“特产”贸易,边区政府也管不了军队,所以未能归于统一。1941年8月,贸易局会同各方组织西北土产公司,实行“特产”专卖。1942年初,贸易局转归财政厅领导,同时成立了禁烟督察处,由财政厅副厅长霍维德兼任督察处处长。到1943年初,禁烟督察处与贸易局合并,成立物资局,下设土产公司,禁烟督察处处长由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兼任。同年11月,为加强缉私工作,各级禁烟督察机关一律并入保安机关。1944年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土产公司不变。(《财经史料》第四册,第94、167、187页)

由于边区负责鸦片贸易的职能部门是财政厅、贸易局、物资局及禁烟、缉私部门,它们“既要禁烟,又要经营,但不允许别的部门和单位经营”(《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但是,鸦片贸易利益极大,而边区党、政、军是不同的部门,各有自己的利益,各有自己的生产任务,这就难免要发生冲突。此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靠“特产”贸易最赚钱,部队机关生产人员普遍产生依赖“特产”赚钱、完成生产自给任务的心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在缉私工作上,我们的困难是相当的大,首先是军队机关为了完成生产自给的任务,他们不顾整体,漠视政府的法令,武装包庇走私,包庇偷税”。(《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6页)陇东负责鸦片贸易的人说:“因为大家都想抓钱,以解决自己的困难,有些机关、部队也在私下里经营大烟土买卖。这



东关枪声案发生后,贺龙给叶季壮的函(陕西省档案馆藏)外的情况发生了,“当晚东关发现枪声,该四同志失踪”。第二天晚上,又查获张主任出售了鸦片毛重10两7钱(上晚因买主未到交易未成,次日继续交易),于是张被扣,但“因张主任赖死不肯走,该处为着避免武装冲突,故未勉强将该犯拘捕到案”。第三天,四名失踪人员仍未发现,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的贺龙,接到禁烟督察处报告后,给359旅旅长兼延属警备司令部司令王震去函,转去禁烟督察处的要求——“请转告延属警备司令部,将该张主任解案讯办等情”,希望王震“查照办理为荷”。同时,贺龙也给兼任禁烟督察处主任的叶季壮去函,告知已将来函转给延属警备司令部,让王震“查明办理”。显然,359旅的人,没有王震点头处理不了。至于此事最终如何,王震如何“查明”,如何“办理”,因未查到相关史料而无从知晓。但3月24日贺龙再次给王震去函,是绥德市民张作有告状,说21日晚张主任交货他是协助交易者而被抓,但因未从中获利而被放了,“不料九旅反将民之老母拘捕至今不知生命如何,并闻将封闭民家捕捉民等”;贺龙的意见是,“查私犯鸦片即属破坏统销,拘捕人民立系违犯法令,如所述属实,请查明办理为盼”。(《禁

给财政带来了严重混乱。”(《延川文史资料》第三辑,第99页)而刘向三1944年的报告中则指出:“许多经济干部思想上没有彻底改变,以为只有大烟才能解决大的问题。因此,轻视其他生产。”“从四一年到现在我的经验特货发财思想是继续着的”。另一份反映358旅种罂粟、卖鸦片的报告中,716团干部说当年他们的生产计划是每人种地15亩,调查者问:“去年二十五亩多都不够吃半年,今年为什么又少了呢?”回答是“有别的补助办法”,亦即种罂粟,“说每人在开荒地这隐蔽地方种五亩大烟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而“在八旅团以上干部会讨论生产问题时六团政委颜金生(说)如果各团能种点大烟比开荒强多少倍”。(《禁毒史料》第221-223页)颜金生是358旅716团政委,可见从团领导到普通干部看法是一致的,思想是统一的。

第二,从事“特产”贸易的部门相当广泛。从事“特产”贸易是边区财经部门的本职工作,这已如上文所述。但边区其他部队、机关从事“特产”也相当广泛,而军队尤其严重。359旅种罂粟自产的鸦片看起来是通过自营的大光商店售出。其他部队、机关卖鸦片的例子也很多。据一份报告,358旅的贩卖鸦片的情况,严重程度与359旅有一比。(《禁毒史料》第221-224页)贸易局则提到385旅在陇东“用食盐掩护特产出口”。(《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4页)

贸易局曾经抱怨:“关于特产走私多的时候或代销货多的时候(虽然经过土产公司的,但是自找买主,自定价钱自收物资和外汇),就会影响特产的推销,并影响到一切的贸易管理,换不进物资与外汇。”(《财经史料》第四册,第484页)“公营商店违犯法令,搞特产生意,延市(晋绥、大光、运合、民兴、汇兴隆、金隆、大成永、公裕栈、西北商店)就有1781斤。”此处的几个商店,晋绥(过裁栈)属于120师后勤部,大光属于359旅旅部,运合属于南区延市合作社和西北商店,民兴属于中央警备团,汇兴隆属于教育厅,大成永属于独一旅,公裕栈属于延属地委。(《财经史料》第四册,第82页,第251-255页,第276-277之间附表)由此可见,参与“特产”生意的部门很广泛,党、政、军、学都参与了。前述刘向三报告也印证了此点,报告中提到走私鸦片的有:在郿县,358旅的警备

营、八团,炮兵团走私鸦片;在关中分区,军队方面如警一旅,358旅的五团,轰一旅等;属于地方党政机关的,如地委总务科,分区保安处缉私队一面缉私一面走私,新正运输合作社,财经分会领导的衣食村煤炭公司。报告中有一句总结的话:关中分区鸦片走私“除专署尚未发现外,其他机关或多或少,或先或后都曾做过”。(《禁毒史料》第268-272页)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也说到:“按走私的部份来说,军政走私多于群众走私,军政走私有两种类型:第一,自己贩运(或武装贩运),第二,包庇私商(大部分是武装包庇)。如绥德分区缉私委员会主任系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人员兼任的,而他们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即无私不走。”绥德的驻军是359旅,绥德分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即是王震,而司令部直属的商业生产部门,主要是大光商店,可见此处说的是359旅。此文后面还说:“驻在边区的野战军各旅部队的商店,更是仗势进行着违法走私,破坏金融,××旅在绥榆两区进行走私时,常跟从武装护随,无人敢于问津。新×旅、独×旅、教×旅、×旅去绥德经营商业,绝大部分是进行投机,敌币、白洋、特产、查禁品,真是无私不有,缉私机关不敢过问。”(《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这里提到了很多旅走私“特产”,说明军队经营“特产”的普遍性。其总结是,“军政生产人员走私多”(《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4页)。

(年份不详,可能是1942年)4月15日,霍维德就禁毒问题给“高书记”(可能是西北局书记高岗,或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高自力)写信并请阅转陈云:“严禁机关、部队、公营商(店),不能做此生意,违者应严办”。话中隐含的意思是机关部队经营的商店有很多在做毒品生意,需要严禁,违者应严办,建议“破获后警备区延长延安等地应杀人严办才行”。(《禁毒史料》第225页)

1941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副主席李鼎铭发给绥德县县长曹力如指令:“十一月二十六日呈悉。查该吉镇人民合作社在固临县境出售烟土,既系触犯政府法令,即不应姑息宽假,自坏法纪,所请发还该项烟土一节,殊属不当。且根本禁绝贩卖烟土,本府已于上月与八路军总部会衔布告在案。”(《禁毒史料》第227页)这说明绥德县长曹力如支持下属经营鸦片生意,对

抗边区政府法令,在鸦片被查出没收之后,还想“发还”,被认为“殊属不当”而驳回。

负责缉私工作的部门自己也走私“特产”。1946年有关部门所做的税收工作总结中就说:“税局本身缉私工作差,走私多”,“缉私人员取消改为验货员以后走私更多了”。(《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5页)

第三,职能部门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前文提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到了军队武装走私让缉私机关“不敢过问”。报告中随后举了个例子,1945年,“因税局检查×旅九成商店,结果几个缉私员被该店在屋内打得头肿眼青,专署地委不能解决,后绥德税局长亲到延安西北局也未解决”。举的例子还有:“三边司令部的营业部门将私货放在窑内,门上贴着,‘军事重地,闲人免进’字样。关中驻军商店贩运私货,当税局缉私人员去执行检查时,威胁说:里面有炸药,炸死你们不负责任。”(《财经史料》第六册,第40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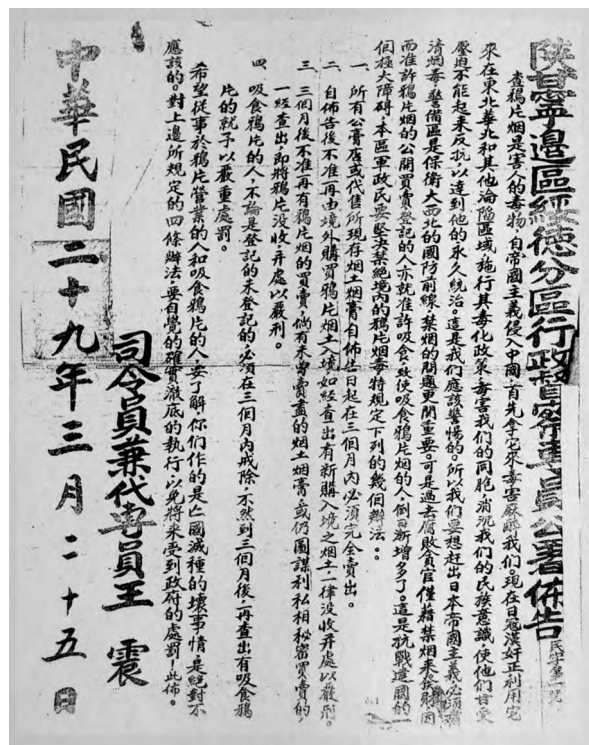
但是,边区政府毕竟负有筹措经费、维持边区财经稳定的责任,也不可能完全任由走私蔓延,所以摩擦时有发生,359旅因私贩鸦片就与边区政府有关部门多次发生矛盾,案例已如前述,独一旅也有贩卖鸦片与禁烟督察处发生冲突的事例。

此外,还有一种矛盾,是边区政府法令不准部队机关私卖,但可交货给职能部门去代销,有些委托售货的部门对低价售货而使他们吃亏不满。1943年5月,物资局局长叶季壮在一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中专门分析特产贬价导致的事件。据他的分析,贬价是为了和“顽方”(国民党军政力量)竞争,因为他们“多方设法贩卖特产以与我们竞争”,双方在打价格战,“特产又是我们最主要的出口品,万一顽方的计划实现,则我们的出口货即减少三分之二,财政与供给固然无法保证,金融与物价,更无法稳定。在这个时候,是空想高价卖不出去好呢?还是贬价以争取胜利好呢?”“我们的存货又多又坏,坚持高价听其卖不掉而腐坏好呢?还是贬价速售,加速资金的流通(这是最平常的商业常识),并以此做抢购新货的资金好呢?”(《财经史料》四,第431-432页)答案当然是后者。尽管他的分析应该是符合情理的,但其他让其代售的部门未必这么看,对把鸦片交给物资局统一出售有意见。比如358旅,“在后

方卖大烟和打埋伏走私”,“因在团以上会讨论交各单位大烟去物资局是有些干部不满……(四)六团供给处人说旅部要我们交大烟,为什么他们还有一个房子装大烟呢?(他在B供住着算账时看见的)”(《禁毒史料》第222页)

## 中共高层对产销鸦片的争议

中国近现代受鸦片伤害很深。对于鸦片的危害,社会早有共识。如1940年3月25日由王震签署发布的《陕甘宁边区绥德专署关于查禁烟毒的布告》里面说:“查鸦片烟是害人的毒物。自帝国主义侵入中国,首先拿它来毒害麻醉我们”,“过去腐败贪官仅藉禁烟来发财,因而准许鸦片烟的公开买卖”,“希望从事于鸦片营业的人和吸食鸦片的人,要了解,你们作的是亡国灭种的坏事情,是绝对不应该的”。1940年5月15日陇东分区庆阳县政府发布彻底禁绝烟毒的布告,内说:“查烟毒为害,倾家荡产,贫国弱民……际此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之危急关键,凡种烟造毒及贩卖吸食之人,如不悔改振奋,岂非羞愧难当?”1941年10月23日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的禁烟布告(总司令朱德和边区



1940年王震签发的查禁烟毒布告(陕西省档案馆藏)

政府主席林伯渠签署):“查烟毒之危害,人所共知,小则毁身败家,大则亡国灭种,事实昭昭,毋待详述。”(《禁毒史料》第143、178、55页)

但是种植罂粟、贩卖鸦片,延安时期党政军学、部队机关多有参与,这种情况在边区内部高层中引起什么反应?

前文述及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中说,为了解决财政难题,1942年元旦那天,边区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亲自带上武装缉私,到保安司令部军需处缴获肥皂十三箱”,暂时解决了困难。从现有材料看,边区政府自己进行鸦片贸易的政策是南汉宸提出来或其与副厅长霍维德两人商议后提出来的。南汉宸1939年9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毛泽东亲自召见,畅谈四个小时,委任其为边区政府财政厅长。

由中共山西省委支持编写、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说:“南汉宸从军需处回来,还没等坐下喝一口水,副厅长霍维德神情肃穆地走了进来”,沉默了一刻来钟后,霍维德告诉南汉宸,“边区政府那边打来电话通知你4点钟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经营土特产的问题”。南汉宸知道出事了。霍维德告知:“我们几位老同志,对于经营土特产都提出了意见。有人还专为此事给毛主席写了两封长信,历数经营土特产的弊端!”“西北局的几位领导,包括高司令在内都是一个意见,简单地说就是一句话:宁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买卖。他们说,陕北根据地坚持这么多年,条件比这还困难也没有做过这个买卖!”南汉宸去见毛泽东,“毛主席缓缓地说:‘关于经营土特产的事儿,许多同志都来反映意见,而且是相当的尖锐,今天找你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为好!办呢,还是不办?’”南汉宸“便将当时我们所面临的窘境和所能采取的唯一对策,一五一十地对毛主席汇报说:‘我们眼下是栈道已毁,只剩下暗渡陈仓一条小路了。不走陈仓小路,我们就都得憋死、困死、饿死,除此之外,不会有第二种结论。’”所谓明修栈道,是指运盐。南汉宸向毛泽东汇报,尽管已经想尽了一切办法,1941年财政收支还是亏空40%，“现在,会计科长那里是一个钱也拿不出来。我们边区5万多的部队、机关、学校要想正常地工作下去,学习下去,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剩下一条我们不

愿意走的陈仓小道了。”(邓加荣、韩小蕙:《南汉宸传》,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257页)

此段描述,也说明了对于经营“特产”,中共内部曾有不少反对意见,但最终经毛泽东拍板。不过,中共高层是否就此开过会议,形成统一的意见呢?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涉及了这一问题,并且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形成了共识,达成了一致意见。

《延安日记》1943年9月22日写到:“政治局已任命任弼时为‘鸦片问题专员’。……要隐瞒特区鸦片生产的真实规模,是不可能的。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任弼时想为这项‘买卖’制造理论依据。从一次长而乏味的谈话中听出来,与中共领导的说法相反,特区的经济和财政形势,极为严重。通货急剧膨胀。财政工作日趋困难。已经发行了六百万元的货币!可是,这并没有改善经济状况。任弼时详细谈了经济困难的情况。所有在特区的人,包括我们在内,都感觉到了这些困难。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鸦片的事情,就是说罂粟的种植与加工,大部分将由部队来管。贺龙的120步兵师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鸦片的地区(这个师已长期做这项生意)。发布了一项大量进行鸦片交易的命令。鸦片体积不大。把鸦片运到延安或特区其他指定地点,再从那里送往中央政府所辖各省,以高价出售,并不困难。在谈话结束时,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是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任弼时想指点我,使我能‘正确’理解中共领导的‘鸦片政策’。任弼时要苏联记者理解这个决定。我说,我会把这情况告诉我们小组同志的。说完后,我们就分手了。”(《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66-167页)

不过,政治局是否开过那样的会,还有待档案或其他材料证实。■

(责任编辑 黄 钟)

# 读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 应克复

可以说,李慎之的《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一文,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对于“反右斗争”的错误和所造成的损失,许多人的认识仅停滞于:使三百多万的知识精英受到迫害。

对于更为严重的后果,至今似无人提出。那就是:当时“右派分子”所提出的一些意见,其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对中国的民主化、现代化都是大有其益的。但当时都当作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加以批判了。

以李慎之的“认罪书”为例,他当年就提出:“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提出“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希望实行“大民主”,“全民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希望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还提出:“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的建言。

这些意见堪称真知灼见,金玉良言;在那个年代却统统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论,痛加批判。作为被批判者只有认罪的份,没有争辩的权利。

如此,使中共建政之初已出现的若干重大问题,非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坚持,并在之后的实践中变本加厉地滋长起来了。国家的发展走了弯路,党国精英和全国百姓无不深遭苦难!

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些问题才重新被人们与中共自己提了出来,其中有些问题成为共识而在实践中有所改进(如废除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必须对权力实行制约等),中国的发展才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有些问题至今尚未获得解

决,致使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停滞难前。

我认为,对于“反右运动”这个历史问题的清理,一方面应当对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几百万知识分子进行平反甄别、赔礼道歉,补偿其物质和精神的损失;另一方面当局有关部门应组织力量挖掘、整理当年右派们所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由于遭到批评而视之为思想垃圾被历史的尘埃所掩埋了,很少为后人所知。其实,这是很宝贵的思想资料和精神遗产。56年前它们被当作毒草作出了颠倒是非的评判,到了今天,我们应当从地下将之发掘出来,作出客观、历史的正确评价。这是一件被遗漏的应予拨乱反正的大事。完成这件大事,可以对“反右运动”的历史错误有更深刻的认识;可以对右派分子言论之价值以及在当代中国民主史上的地位作出应有的评价(仅此可以撰写一篇专题论文);还可以为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

《炎黄春秋》在发表《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一文时,没有编者按语,亦没有发表任何评论。因此,编辑部在推出李慎之的“认罪书”之后,可能会引发读者各种遐想……他们会猜想:是否暗示,李慎之和当时类似的一些右派言论,对他们的批判、定罪与惩罚,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今天要重温当年的反右斗争,以敲起警钟,避免重犯当年右派的同样错误,维护和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不搞西方国家的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那一套?还是,以李慎之的所谓“认罪书”作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文献资料,公之于世,说明当年右派分子所提出的关于不搞党国体制的意见,关于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等建言,是何其正确,多么重要!……我认为,只有后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是正确的。■

(作者单位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责任编辑 黄 钟)

# 有关高岗“轮流”说的考证

○ 林蕴晖

当年定高岗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主要“罪证”之一，是1953年12月，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是否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一事，高岗出面反对，主张由中央书记处成员“轮流”主持。

最早公开披露这一情节的是薄一波，他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说：高岗明目张胆地要取刘少奇而代之，是1953年12月。当时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他休假期间委托刘少奇代理中央领导工作。这时，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正当大多数同志表示还是由少奇同志主持，不赞成搞轮流时，高岗立即出面反对，主张要“轮流坐庄”。他一再坚持说：“轮流吧，搞轮流好。”

从中共党章规定的内容来看，在党内商讨问题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纯属正常情况；如果在会议已经做出决定，再私下活动反对，就为党的纪律不容了。那么，高岗究竟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轮流”的呢？

##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提出问题的？

关于195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在他外出期间，是明确交代由刘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征询由谁代理他主持中央工作？目前所能见到的正式出版物，所说的情节均甚模糊，极不一致。现就本人所见的几种说法列举如下：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说：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指12月中旬——笔者注），毛泽东决定外出休息。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谦逊地提出，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

同意由刘少奇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刘少奇的面目又进一步暴露。（《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80页）

彭德怀在1962年向中央递交的“八万言”申诉书中，专就1953年12月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讨论由谁代理他主持中央工作一事，对会议讨论的具体情景作如下叙述。彭说：

1953年12月，正在召开军队系统的高干会议期间，我参加了由主席在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少奇同志首先提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并提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周恩来同志再三推辞。高岗赞成“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朱德同志也说“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我第五个发言，当时我很激动，心里想：就是轮流的话，轮到你朱总司令或高岗时，就敢肯定不出问题吗？所以我当时说：我不赞成日常工作轮流主持，因为日常工作事情多，如果没有一个同志认真来研究是不行的，日常工作仍应由少奇同志来主持。主席当时说：“怎么样？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吧。”当时少奇同志仍在推辞。我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最后，少奇同志同意自己来主持了。

马云飞在《刘少奇曾被确定为“接班人”吗？》一文中写道：

在1953年年底。这年年底，毛泽东外出到杭州主持新宪法的起草工作。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做出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之所以把这个决定称之为“特别”，是有特定原因的。就在这次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高岗坚决反对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提出“轮流吧，搞轮流好”，刘少奇也表示

“轮流负责为好”，最后是毛泽东毅然拍板做出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党的文献》2011年第2期）

杨尚昆在谈“高饶事件”一文中说：

1953年秋后，高岗竟去邓小平、陈云处“煽风点火”。……小平和陈云同志都感到这个问题很严重，及时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有意亲自“测试”一下，在同年12月24日向政治局提出：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本来，这已是近几年



高 岗

年的惯例，高岗却表示反对，主张由几个书记“轮流坐庄”。这一试，果然使他露了底。（苏为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历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以上提供了这样三种版本：一是《毛传》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二是彭德怀说：主席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马云飞同此说：毛泽东征询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谁主持工作时）三是杨尚昆说：他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三种版本实际上反映出两种语境，一是如《毛传》所说，毛明确提议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二是如彭德怀所说，毛以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

从刘少奇接着毛的话茬，立即表示：“主席外出后的日常工作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显然，毛泽东在会上是向大家提出问题，征询大家意见，并未明确指定由刘少奇代理。

## 为什么没有依照惯例指定刘少奇？

1953年，毛泽东所以没有依照惯例指定由刘少奇在他外出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以征询意见的方式提出问题，是有政治原因的。这就是在建国之初，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出现了分歧。择其要者，如：

刘少奇1949年4月受毛泽东委托到天津视

察，着力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存在的主要倾向——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解除资本家担心共产党将发动工人对他们的剥削进行清算斗争的疑虑。在与天津资本家座谈中，刘少奇曾说过，资本主义剥削，在现实的中国不是罪恶，而是有功劳的话。东北局书记高岗不同意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他对东北局几个常委说：“少奇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4页）高岗还说，他把刘少奇的信送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气得发抖，脸色都变了。薄一波也证实：“据高岗说，他收到少奇谈话（指天津讲话——引者注）记录后，在北京面交毛主席，毛主席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1950年初，东北局组织部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共产党员发展成富农怎么办？刘少奇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首先是，凡雇人劳动，扩大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不能叫做剥削。而且，现在是私有制的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交公也交不出去，国家也不会要他的马，不得已他只有暂时的私有。如果他现在发展了生产，将来在实行集体农庄时又能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并说，即使将来东北有一万个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而且，这一万人中可能会有五千是愿意留在党内的。现在才开始建设新民主主义，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也允许雇人，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思想。

1951年，当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报告中提出：为制止互助组织的涣散趋势，应该把互助组提高到生产合作社，我们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刘少奇批评说：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

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当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

就在这个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毛泽东明确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肯定了山西省委的主张,并由此制定了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责成杨尚昆检查未经他看过以中央和军委名义发出的电报和文件,严厉指出:“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同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又严肃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提法是“右倾的表现”。更有甚者,1953年初,毛泽东竟然要高岗查“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页)

这一切表明,在1953年这个时候,刘少奇不仅在政治上,甚至在组织上,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但刘少奇终究是中共七大以来仅次于毛泽东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还必须观察一下其他中央领导人对刘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何以不直接指定由刘少奇代理,而用征询意见的口吻提出问题的真实原因。

刘少奇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在毛泽东提出征询意见时,立即表示由书记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高岗显然了解毛泽东的意图,故而说出:“轮流吧,搞轮流好。”朱德与毛泽东并肩战斗二十余年,对毛泽东更有了解,不然也不会轻易表态“轮流”。

## 历史事实是中央先后作过两个决定

马云飞的文章说:“在12月24日毛泽东临行前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特别做出

决定:在毛泽东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事实上,最初讨论问题的会议,是12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这次讨论的结果也并非决定由刘少奇代理主持。请看《邓小平年谱》中的记载:

“1953年12月15日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

上述表明:会议日期是1953年12月15日,会议性质是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的决定是“毛泽东外出期间中央书记处会议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而非“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毛泽东的本意。

因此,在这种党内高层会议上,在讨论问题的语境中,高岗、朱德表明自己的意见,完全属正常现象,何况“球”是由毛泽东亲自抛出来的。

可见,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高岗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证是不能成立的;把朱老总也赞成“轮流”,说成是老总想“黄袍加身”,有“野心”,在高、饶问题上“有账”等等指责,也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检验的。

问题是在15日会议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于是,在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为了表示对刘少奇的信任,会议又另作了一个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邓小平年谱》记载:“下午,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草案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可见,这与高岗提议“轮流”,根本不是一个会议了。■

(作者为历史学者)  
(责任编辑 黄 钟)



# 从一家民间智库说开去

○ 李 锐

最近又与王德禄交谈,使我决心介绍他的事业,即科学与民主在中关村所结的果实,而中国的希望,始终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自由民主精神的发扬光大。

## 独立的民间智库

我认识王德禄有20年了,他原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工作。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上马的决定后,由我的朋友范岱年介绍他来采访我。不久,这篇采访记就发表在刊物上。没想到,第二年他便下海创办了民间咨询机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这是他经过慎重考虑后的决定。因为他想以“经济独立”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从属于人的生存方式。

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缺乏独立的人格和应有的地位,我在许多文章中论述过,以下作一些引述:“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士人习惯依附权门,揣摩皇帝脾胃做文章,有的变成‘奴才学’大师,代有传人。北宋以后,称夷为父,变为奴才的奴才,如秦桧(状元)、贾似道、洪承畴等。当然也不乏人格独立的学者,如叶水心、顾亭林、黄宗羲、王船山等。我国自古无科学传统与民主传统,甚至不存在对自由的向往。无视自由妄谈民主,实缘木求鱼。个人自由乃民主社会的前提。西方经过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二三百年的努力实践,实现了工业革命,发达了自然科学,人权、自由、民主这些问题早就不在议事日程了。”

“共产党的创始人以及后来的许多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出身,可是为了所谓‘不断革命’,知识与知识分子却化为异己的对立物。这个问题不彻底弄清楚,我们走过的可怕的弯路不彻底弄明白,我们的社会主义是搞不好的:我们必须从理论到实践澄清这些问题。”

毛泽东“长期把知识分子视为异己力量,理

论上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是‘毛’,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面。为什么对知识分子持这种态度?我认为我们大家应该回顾一下,把问题弄清楚。对待知识分子,从理论到实践,我们长期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和错误的认识”。毛泽东“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是由来已久的”。“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这也是从农业合作化的困难而言。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才能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毛泽东“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绝对化,将知识分子与剥削阶级完全等同起来,把他们完全归属于旧的统治阶级,从而总是将知识分子当作异己力量看待”。

“我这里只简单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过去叫做‘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关系到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问题。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和他创造的剩余价值论,都值得重新研究,现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方面的专著不少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体力劳动是简单劳动,似容易说通;但应用到复杂的劳动上,就比较困难了:尤其应用到脑力劳动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更说不通了。人的智力、灵感这些属于知识水平与思维能力的脑力劳动,因人而异,是不可能量化的。《红楼梦》只有曹雪芹才能写得出来,你怎样计算其劳动价值?现在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宝贵的

财富,如何计算其价值?比尔·盖茨的资产几百亿美元,怎样计算他创造的价值?科学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同工人、农民体力劳动创造的价值,怎样对比计算?历史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其载体是知识和知识分子,是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是硕士、博士、博士后,还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所有这些人、这些知识分子同工人一样,都是生产力,都是创造劳动价值的,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因此,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以人体作比喻,知识分子是人的头脑。”

以“独立、科学、低调”为其生存之道,二十年来,王德禄创办的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的快速发展,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一个进步。1986年万里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讲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改革。在我看来,如果社会上不存在独立的民间咨询机构,不存在独立的民间智库,没有他们做出的独立性研究和判断,政府就很难做到决策的科学化。2011年5月6日,王德禄和范岱年又来我家时,送我他这几年的《博客集》共四本,知道他在市场经济具体事务的所思所想,特别他在硅谷与各种人物交流,所体现出新经济的新模式时,感到兴奋。他还谈到,不要称“海归”要称“海鹰”,同硅谷的有关人士应经常来往。2012年,我与王德禄见面时,主动为他大写了“民间智库”四个字,这里面既有我对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期许,也有对长城所取得成绩的赞誉。

### 新技术革命与民间智库

由于我对王德禄的一些咨询实践很感兴趣,就关心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王说他是中国石油大学毕业的,他的导师是戈革。戈革是研究玻尔的权威。王2010年6月21日《在哥本哈根拜访玻尔研究所》这篇博文中说:“这次欧洲之行中,瑞士的苏黎世和丹麦的哥本哈根对我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在苏黎世我拜访了爱因斯坦生活和工作过的苏黎世理工大学;而在哥本哈根则拜访了另一个上世纪伟大的科学巨匠尼尔斯·玻尔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玻尔研究所。这两位大师和我是有渊源的,我的大学老师戈革先生一辈子都在研究尼尔斯·玻尔,而影响我最深的许良英

老师则一辈子在研究爱因斯坦。这两位长者对我的人生有巨大的影响,从七十年代末至今,我都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今天行将拜访的玻尔研究所,我有很多的期待。”参观完玻尔办公室后,他在留言簿上的留言是“玻尔是新经济的先驱”。

中国的新经济发展,发端于上个世纪80年代,胡赵执政时期的“新技术革命”大讨论。当时关于新技术革命大讨论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人认为“新技术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概念。然而胡耀邦有一句反驳的话,很经典:“我们要过的两条河,不是长江与黄河,是愚昧与贫穷。无知是可以的,但是狂妄自大是不对的。”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把全面应对新技术革命的问题与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问题结合起来,提出了建立技术市场、鼓励创业、发展风险投资以及建立科技园区等一系列政策。在国务院总理的主持下,国务院批准了中关村一个科技园区,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现在看来胡赵时期对新技术革命的讨论,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深远的。可以说,改革开放为王德禄他们下海提供了机遇,新技术革命为长城所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王德禄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正是受到新技术革命影响很大的一批年轻人。他回忆说,当时三本美国未来学家的书使他心潮澎湃:丹尼尔·贝尔1973年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阿尔文·托夫勒1980年的《第三次浪潮》和约翰·奈斯比特1982年的《大趋势》。他正是受这些影响,选择了咨询业创业,决定用大脑里的知识、智慧创造财富,独立思考养活自己,贡献国家。

### 中关村文化的核心是科学与民主

我在“十八大”书面发言中专门讲到科学与民主:“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的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

今年2月12日王德禄与范岱年、刘志光来我处,整整谈了一上午。我同他们谈到,如果说世界上有些独裁者用专政的手段统治,毛泽东是他们中最厉害的,因为他想尽办法给人洗脑,都当螺丝钉(学雷锋就是当螺丝钉)。中国要走向民主、走向宪政,必须彻底从毛泽东的阴影中走出来。我在总结毛泽东的历史教训方面一共出了5本书,《早年毛泽东》、《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晚年悲剧》。我最后出的一本书是香港版《何时宪政大开张》。因为毛泽东继承了中国传统帝王的权术,又吸收了近代专政的手段,所以我认为总结毛泽东的教训是比较难的,从中国人来讲,政治家玩弄权术似乎非常自然,政治家从来没有感到权力容易给人民造成伤害;对西方人来讲,似乎很难理解中国文化传统中帝王的权谋。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对温家宝的关于“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表述,有一个很好的诠释:温总理说得很诚恳,很多都是对的,温总理表示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却对权力的可怕性缺乏警觉。西方有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他没有意识到,权力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东西,它像一只老虎,随时会侵害无辜的人。权力不但侵害无辜的人,也会侵蚀执掌权力的人的心灵。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意识到了权力的可怕,认识到权力就像一只老虎,所以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没有对权力产生过恐惧。当权者一旦拿到权力,往往就在某些方面丧失了自制力,开始玩弄权术,丝毫不会意识到自己心灵的扭曲;比较好一些的,尚能在操守上把持住自己,但这并不等于对权力的警觉——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产生坏的结果。所以,一定要监督权力、约束权力。“如何来约束权力”,正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是让媒体监督权力,第二是让权力多元化,第三是让权力受到真正的制衡。

中关村成为中国的科学城,可追溯到清朝末年的清华学堂和近代的燕京大学,陈毅决定科学院选址在中关村。今天,在市场经济和创业自由方面,中关村做出了很多探索,并取得了成功。在读王德禄的博客时,我注意到了关于“中关村

文化”的讨论,核心观点是:中关村的文化是“科学、民主、与时俱进、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可以说,五四以来“科学与民主”精神,只有在中关村的发展中才真正得到了继承。

首先,中关村发展的“科学”突出体现在两点:一是依靠科学技术创造社会财富;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和新经济的发展规律。中国传统体制将科学与经济分离,其负面影响至今还需持续清除。历史上中国不遵循客观规律的事太多了,并因此拖了中国发展的后腿。而这两点,在中关村都有本质的改变。

其二,中关村发展的“民主”,突出体现在基于市场规律的经济民主,以及创新型企业内部的思想民主。没有前者,就没有今日中关村数以万计的自由创业者,也无法形成政府服务于企业的新型的政企关系;而没有后者,则无法出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大公司。

其三,中关村的成功,也得益于思想自由,这种思想自由体现在对“想法”的尊重、对“创业”的尊重,许多自由思想来自于从硅谷回国的创业者。

2012年12月13日,温家宝考察中关村时说,中关村发展的经验,一是人的解放,让人活起来,自由地去创造。这是科技创新的根本,也是中关村发展的根本。二是体制创新,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经济与科技紧密结合,这是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也是中关村成功的道路。我认为温家宝的这两点说到了根本。

## 中关村是中国的希望

王德禄告诉我,近几年,他频繁来往于硅谷和中关村,并且写了《硅谷中关村人脉网络》一书。他说,如今硅谷许多经济现象都出现在中关村,像系列创业家和天使投资网络等等。

在王德禄的《博客集》里有一段发人深省的反思:2012年2-3月,美国副总统拜登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更大的开放性和普世人权的保护是促进所有国家创新的最好方式,中国也不例外”,认为“专制体制限制人们的思考,禁锢创新精神”,“美国的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至少有一个关键的优势——创新”,而这种优势又依赖于“美国自由”。他认为“美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而“依中国目前

这种体制,中国无法主导世界,美国才能主导世界”,并不客气地说“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王德禄由于做“海鸥”的身份,感触太深,才引出拜登这段话。这里,我举出一个统计数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美国占70%。这就说明,美国建国二百多年,确实在一张白纸上画了最新最美的图画,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应该说,“创新”是美国人真正值得骄傲和沾沾自喜的地方。的确,自由主义的文化,创新条件的完备,大量技术移民的融入,全球经济霸主及新兴产业引领者的地位,等等,使美国在全球呈现出创新环境最好、创新群体最大、创新能力最强、创新阶段最高的发展态势。中国在中长期科技规划后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后,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创新方面的努力。拜登的这次讲话应该理解成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泼了一次冷水,应引起中国各方面关注。中国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存在高端创新领军人才匮乏等现实障碍,还存在长久以来传统思想文化的历史包袱,也存在限制人们思想自由、抑制原创等不利的体制、机制障碍。不过,拜登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不同的国家或时代需要有不同的创新范式,而不同的范式则取决于一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及战略需求。就技术层面、需求层面、竞争层面而言,发达国家往往需要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而欠发达国家更多的需要集成性创新、适应性创新和跟随式创新。对于中国创新发展的判断,首先应该立足于中国欠发达的发展阶段,着眼于中国的赶超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就是通过大量跟随式创新紧紧跟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提出,我们确实需要从原有的创新范式逐步向集成创新、适应性创新同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和引领性创新并重的创新范式转变。但是,创新范式的转换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仅要弥补人家发展几百年沉淀下的差距,还要破除几千年来留下的思想文化包袱,更要扫清60年来累积下的体制机制障碍。就这一点而言,拜登说的是正确的。

我认为,中国经济未来有没有希望,在于今后的30年是否能走上原始创新、原创产业发展之路。所谓原创,必须来自思想自由,从本质上

来说,只有在思想自由的条件下才能出现原创。要想真正做到思想自由,就必须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目前的中国急需第二次思想解放,只有打开一切束缚人们手脚的锁链,才能最大地激发人的潜能,发挥出无限的创造力。

中关村一直在努力追赶硅谷,与硅谷间建立起了发达的人脉网络,二者差距正在缩小。根据长城所的研究,中关村是世界第二大高新区,仅次于硅谷。近些年,中关村出现了很多“海鸥”、系列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也出现了怀揣改变世界梦想的创业者。他们来到中关村,为中关村发展带来新的活力,而中关村也越来越强调原创、鼓励改变世界、不断扩大思想自由。

科学、民主、自由的深化与相应的新的制度安排,已渗透到中关村的所有人、所有事、所有环节中,并且作为一种文化而存在。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责任编辑 黄 钟)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邮箱: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733086、57192229、57733087、57192223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文馨、顾娜、高晶、牛萍萍(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正能量”的正解与邪说

○ 崔 敏

汉语的词汇极为丰富,并且总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和不断扩充。就近期来说,2010年流行的新词是“纠结”;2011年流行的新词是“给力”;2012年的十大流行语则首推“正能量”。

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每当一个新词汇出现之时,自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解读。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人们都试图将新的词语引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很快就会出现各种推力,给新词语赋予各不相同的含义。眼下,“正能量”刚刚闪现,便出现了相差甚远的说项,很值得仔细品味。

## 一、正 解

“正能量”一词,原本是自然科学的专用术语。一说是天文学术语,源自中国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发布的天文学专有名词,即以真空能量为零,能量大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正,低于真空的物质能量为负;另一种说法是指物理学名词,最早见诸剑桥大学教授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一书,他在书中论证了“宇宙中的物质是由正能量组成的”。

“正能量”被延伸到社会人文领域,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其中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在2012年伦敦奥运火炬传递期间,有人在网上发表“点燃正能量,引爆小宇宙”和“点燃正能量,运气挡不住”的博文,这两句富有诗意的话便迅速被网友跟进和模仿,成了时下网络最热门的词语。后来,网友把“点燃正能量”的励志口号与火炬传递结合起来,奥运火炬成了“正能量”的代言物,“正能量”一词也借此在中国走红。当下,“正能量”已成为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泛指一切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给

人以希望和追求的动力和感情。

## 二、邪 说

眼下,有关“正能量”的说辞颇多,某些官场人物发表的高论尤为抢眼。他们自封为“正能量”的化身,试图操控一切舆论,对不顺耳的声音一律打压,不许发声。众所周知,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时,把对“唱红打黑”提出质疑者,一律斥之为“杂音”、“噪音”,说“这些人都不是好人,因此决不会受他们的干扰”。发誓要把“唱红打黑”进行到底。近日,人们又看到这种高论的另一个代表——《红旗文稿》刊发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任贤良的一篇宏文,题为《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该文把一切不悦耳的声音统统归入“负能量”之列,公然提出要“禁言”。

让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副部长是怎么说的:

“当下中国,客观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党刊党台、通讯社为主体的传统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兴媒体舆论场。两个舆论场传播基调和诉求表达长期分离对立,不仅直接挑战党管媒体的原则底线,而且导致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

“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如同党管军队、党管枪杆子,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只能加强、不能放松。即使对那些强势媒体、知名网站和名人博主、微博大V,在管理上也必须敢于碰硬,该警告的警告,该禁言的禁言,该关闭的关闭。”

该文还提出:“党心与民意,就是两个舆论场最大的‘交集’”,他要求“管理部门要采取多种手段,转化、扶植和培育一大批理解、认同、赞成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领袖’,通过他们来影响网民、引导舆论。同时,要倡导党员干部上

网、开微博,替党和政府说话,培养我们自己网上的‘说话领袖’,占领新媒体这一新的舆论阵地。……策动两个舆论场齐唱同一首歌。”

这可真是一篇难得一见的奇文,作者把“党心”和“民意”直接对立起来,将“正能量”定义为“替党和政府说话”;对网络上出现的不同声音则视为敌对势力,公然宣称要实行“禁言”和“关闭”,进而“扶植和培育一大批理解、认同、赞成党和政府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领袖’,通过他们来影响网民、引导舆论”,使“两个舆论场齐唱同一首歌”。

这篇奇文,奇在它从头到尾充满了霸气,居然目无宪法和法律,将宪法规定的“公民有言论自由”踩在脚下,更把执政党早已宣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弃如敝履,试图消灭一切他所不喜欢的民间舆论。众所周知,“文革”中“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还保留了八个“样板戏”,而这位副部长,竟要强令13亿人“齐唱同一首歌”。它所信奉的只有“党管媒体、党管舆论,如同党管军队、党管枪杆子”,总之是要统管一切,民间舆论则不许发声。

某些主管宣传工作的官员,口口声声“坚持邓小平理论”,然而在他们的脑海里,“邓小平理论”早已不见了踪影。须知,正是小平同志告诫全党:“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还指出:“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小平同志的教导言犹在耳,居然又出现了试图压制民间舆论的奇文!

像这种只允许“为党和政府说话”,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的说教,背离了民主与法治原则,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表明它已经误入了歧途,由此绝不会引发出什么“正能量”,只能起到开历史倒车和误党、误国、害民的作用,显然是自欺欺人的伪科学。

### 三、以“左”为正,祸害无穷

《统筹两个舆论场 凝聚社会正能量》一文,颠倒了是非,混淆了敌我。然而,在作者与发表该文的刊物主编等人看来,却是最正确、最权威的正统说教,否则也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地广为宣

传。可见,对于同一个事物,人们的看法会有极大的不同。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概由于立足点不同,或曰立场不同。在中国,在执政党内,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些年又忽视了对于极“左”思潮的批判与清算,“左”的影响根深蒂固,遇到一点小小的火星就会死灰复燃。

极“左”思潮的主要表现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所谓“斗争哲学”。那些自视甚高的“左派”理论家,唯我独尊,自封完全正确,仿佛他们就是“正能量”的天然代表,进而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将一切与其不同的意见和主张,都看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必欲铲除而后快。这一套做法,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中屡试不爽,提出的口号和使用的花招则不断翻新。例如“插红旗,拔白旗”,“政治挂帅,四个第一”,“兴无灭资”,“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196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节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分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判,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随后在全国展开的“清理阶级队伍”,共有3000万人被批斗迫害。例如,仅在吉林省,“清理阶级队伍”导致2127名干部“非正常死亡”,3459人终身残疾。),“清除精神污染”,等等,自以为得计,试图统一思想,造成舆论一律的表象。实践的结果却适得其反:由于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权利,全民噤声,万马齐喑,造成全民族的精神空虚。这些年来,弄虚作假、坑蒙拐骗无所不用其极,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张口即是,假货、假药、假酒充斥市场,在宣称反腐倡廉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贫富悬殊和官场腐败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反思的声音和批评的声浪鹊起,无非是想要促使掌权者汲取经验教训,切实进行改革,重振朝纲,这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正能量”,也正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希望所在。

互联网上传播的资讯不可能全是正面的,其中确有一些不健康的现象。问题是:对新兴媒体的作用如何评估,对民间的舆情如何正确对待?必须肯定,以互联网为纽带的新兴媒体是民意表达的重要途径,自由传播的各式各样言论,正是民意的晴雨表。常言道:民心不可违,民意不可辱,人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连封建帝王都知

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将宣泄的窗口完全堵死，绝非治本之策。对于极少数人散布虚假信息，也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草木皆兵。人民群众不是阿斗，大多数人都会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况且，有比较才会有鉴别，真善美只有在同假恶丑的比较中才能充分显现出来。对于某些突发事件，关键是要建立健全预警和应急机制，事发时能够从容应对，指挥若定，而不是一遇到某些状况就惊慌失措，进退失据。因噎废食是缺乏自信的虚弱表现，如果把民众因对某些事项不满而发发牢骚，或者对某些政策措施提出批评，都看作是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那就会人为地激化矛盾，徒增对立情绪，使社会的裂痕进一步扩大，造成亲痛仇快的结局，它对和谐社会的破坏是难以估量的。

#### 四、加强自身建设是激发“正能量”的必要条件

把“社会阶层分裂对峙、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

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归咎于两个舆论场的“诉求表达分离对立”，完全是颠倒了因果关系。常言道：“身正不怕影子斜”，“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所以出现“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党的执政基础腐蚀削弱”，主要是由于执政党没有搞好自身建设、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所造成的，绝不能怨天尤人，把问题推到网民的诉求表达不当。要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只能从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根治腐败抓起，而不能依靠“管理部门采取多种手段”去打压民间舆论。否则只会激起网民的强烈反弹，后果不堪设想。

古人云：“正人者必先正己。”己不正，焉能正人？要引发社会的“正能量”，首先是执政党要管好自己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作者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责任编辑 黄 钟）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sw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准）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 / 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 关于对鲁迅的阅读与研究的一点建议

○ 曾彦修

关于鲁迅的研究以至于阅读,现在似乎相当沉寂了。鲁迅确实是我们的“民族魂”,解放后一下子把他变成了“民族神”,尤其是把他作为一个搞一切极“左”运动时的打人工具,这就使人们很怕鲁迅了。实际上,这是完全歪曲了鲁迅,甚至毁了鲁迅。现在是:对鲁迅歌颂的老调子已经唱完,而切实的新研究又不敢讲,所以鲁迅就被冻在那里,或被误解在那里。这真是太不幸了。鲁迅是我们全民族心灵上的消毒剂,比什么都更可贵。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地研究鲁迅呢?根本上是首先要将鲁迅请出神坛,当成一个可以评论的思想家包括文学家来研究才行。

## 一

毛泽东对鲁迅的各种封号我以为均只能参考或多予尊重,但绝不要把它作为自己头脑的凝固剂。

这件事情清楚得很,从鲁迅逝世的一周年起,毛泽东对鲁迅的一系列论断,就使得左翼人物的鲁迅研究的自由完全失去了。

在解放后更是被凝固和扩大了。凡要整人的时候,就必定要把鲁迅抬出来做帮手不可,以致在不少情况下,都使人觉得鲁迅是太可怕了。其实大谬不然。下面要提出此点谈谈。

1936年10月在上海安葬鲁迅的典礼中,沈钧儒在匆忙中写下了“民族魂”三个字在锦缎上,用以覆盖鲁迅的遗体。此论一出,全国进步人士一致拥护,全无异议。

不久,毛泽东的很系统的评价发出来了,从此,对鲁迅的评价就只限于歌颂比赛,而谈不到什么研究与评论了。

1937年10月,全面抗战已开始了三个月,全国进步青年中的先锋,也开始陆续向延安跑了,延安已经首先成立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两个

大规模的青年抗日干部学校,紧接其后的是鲁迅艺术学院。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开了一个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纪念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一个重要演说。这个演说称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很巧,1980年前后,我有机会遇见写这篇报道的人,场合是在当时北京城内沙滩北大旧址前饭摊之中。时由张黎群招数友人饮于此。我于座间请教萧泽宽,萧告诉我,他当时在陕北公学,不久就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他把毛的这篇演讲整理成文,呈与新华日报潘梓年,潘说《新华日报》不敢用,因这不是中央交下来的正式稿件,叫他投与胡风的《七月》,潘并说,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延安出来的,因此就在《七月》发表了。这篇文章中的三个“家”——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与“当代中国的孔夫子”,都是这次讲的。

## 二

“当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一说如何呢?这当然是歌颂到极点了。孔子当然有很多伟大的思想,他的那个核心的“仁学”,他的很多“以人为本”的讲话,无论如何你也不可能把它打得多么“反动”的。但孔子又为历代皇帝奉为神圣,这又说明他又在实际上是代表了最高统治者的利益。在长期的历史上,孔子已经成了皇帝、大小官员、各阶层普通百姓最尊重的神,包括不识字、不信神的人在内。不敬孔子就不是个人。因此,“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这个“神”,应该说是比诸神都还要重要的神。到了1972或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后,孔子为什么一下子又成为万恶不赦的反革命罪人的标本了,谁也不懂。一个“当代的孔夫子”是赞美无边的话,一句“当代的孔夫子”又成了万恶之源,这是怎么回事呢?谁能讲得清呢?



## 三

十年“文化反围剿的总指挥”问题。上海十年间左翼文化运动及其领导者的问题,我以为上世纪20至30年代抗日战争以前,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极其光辉伟大的成绩,基本上是在党的领导下的,根本上也始终是由党员和坚定的左翼分子们坚持下来的。而不是在鲁迅个人领导下的。这在形式上确是难于找出一个地下党委或地下文委连续的、一以贯之的、有组织领导的正常轨迹。但在实际上这个领导是由非常隐蔽、形式上非常奇特的种种人物传承下来的。这股党的力量,到了1935年下半年“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的时候,又重新集结成为一股领导全国的庞大的力量了。而鲁迅在1933、1934年这些最黑暗的年代里,他的文章也往往成为革命地下工作者们的一种激励。(按: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是在上海市文救会成立之后。)

1927年后的三四年,上海文艺界主要还是创造社的天下,其中众多名人,除了郁达夫与张资平个别人外,如成仿吾、冯乃超等一大批名将,均是共产党员,哪里谈得到受鲁迅的“指挥”呢?他们都相当忙于批评鲁迅。而创造社恐怕是当时所有文化团体中党员最多的。这种相骂资料多而分散,好在著名编辑专家常君实,在四十多年前已收集相当完备,早已在香港出版了。

在那个十年中总的说来是进步文艺即左翼文艺大放光彩,其中尤其是小说、电影等,几乎全是左翼垄断了全国的市场,成绩之佳,出人意料。这中间是谁在指挥?仍然是已被打的很破碎了的共产党在领导。真正在其中坚持干的,还是大量的地下党员(包括失掉了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白区工作百分之百失败了”,这是我听过多次的延安后期的正式提法。但解放后也听过一些老党员、尤其是“特科”情报系统的老党员有不同意见。这个1927年以后短短的十年,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十分奇特的十年。在这十年中,革命的文化运动,尤其是其中的文艺运动,进步之速,规模之大,影响中国青年思想之大,我想请教历史专家一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否是空前的呢?

既然说鲁迅是十年“文化反围剿的总指挥”,那么,这条路线当然应该是正确的、革命的、红彤彤的了。怎么从上世纪60年代起,又说上海党领导下的一切文艺工作,全都一下子变成一条“黑线”了呢?这么一来,鲁迅岂不在分秒之间一下又变成“黑线总指挥”了吗?“红司令”“黑队伍”怎么说得通呢?“文革”不但要把这段非常光荣的党史完全涂黑,也是要把中国的历史完全涂黑。

那十年有没有文化反围剿总指挥呢?我以为仍然是被打得相当破碎的共产党,通过各种成型的、不成型的党员核心在起领导作用。这件事同所谓十年白区工作完全失败之说有关,是联在一起的,而此说完全不合事实。

## 四

我以为,对鲁迅的研究,应该着重放在他的前半期,即1927年前的时期。这个时期,他显得雄视一切,显得他大大高出于其他一切大大小小的思想家,显得他对于中国的痼疾看得最深最透。(当然,对于中国的整个出路问题,他当时也还未找到。)因此,我觉得对鲁迅的研究,应该重点研究1927年前的,这个眼光高于其他一切人的伟大思想家。

## 五

鲁迅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对这个问题,他在《答有恒先生》中曾经明白说过,1927年以前他是个“进化论”者,1927年以后,他就是个“阶级论”者了。这是鲁迅一次最公开的表态。这是一个伟大的表态,但不一定能说鲁迅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看起来,他似乎终身是个战斗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鲁迅在冯雪峰面前就对无产阶级专政表示了明显的不满。

我们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人类精华中的精华,所以就非把鲁迅定为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证据之一是他买了很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的书,和二三十年日译苏联有关文学的书。

鲁迅并没有认真读过马克思本人的多少书,他一生好像也没有引证马、恩、列的一句话来作为他立论的根据过。他自己讲的很清楚,他是为

# 我上门批判孙大雨

○ 武振平

1957年7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发表,上海全市震荡。反右派斗争在复旦大学迅速展开。但是,却碰到一块“又臭又硬”的大石头——孙大雨。这位研究莎士比亚专家,解放前是上海进步教授,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治,为民主革命作过贡献。但在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中,和在“肃反”运动中,大概受过不公正的“批判”,吃饱了一肚皮气。在大鸣大放中,孙大雨曾经为此“出气”发泄过一通,这次又被当成右派来批斗,更是怒火中烧。他耿直敢言,不但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反守为攻,开口骂人,把批判他的人都骂成是“反革命”,骂金仲华是反革命,骂《解放日报》、《新闻日报》里也有“反革命”。并且拒不出席批判他的斗争会,弄得批判会也开不成。

在此“僵局”下,1957年7月4日,在茂名公寓(现锦江饭店南楼)七楼孙大雨的家里,却演出了一场“上门批判”的闹剧:你不参加斗争会,就上门到你家里来开,躲也躲不掉。于是,一群不

了要看看郭沫若和他的同伴们讲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叫“卡尔主义”之类)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才咬紧牙关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鲁迅确实读过的,是他自己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这本书对鲁迅的帮助很大。中国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界读过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实主要就只有此书的鲁迅的日文转译本。鲁迅之学习马克思主义,意不在使自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为了同他的论敌们(郭沫若等)作斗争时,自己不要少了这门武器。这与终身不变的“信仰”,不能说全是一回事。以鲁迅的叛逆性格和俯视一切的性格来说,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他似乎不会“信仰”什么主义似的。我的这个看法,可能很不合理。但也可能并不全是异想天开。鲁迅在1936年冯雪峰去上

速之客,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工人的名义,还有广播电台记者带着照相机、录音机,不顾孙太太的阻挠,闯进了孙家小客厅,对孙大雨“面对面”批判起来。他们抓住了把柄:“你骂人家是‘反革命’,拿出证据来!”孙大雨骂人的这些话,本来是逼出来的“气话”,哪里有什么证据?上门批判者当然是“得胜而归”,并且提出了要对孙大雨提起法律诉讼,“控告”他的“诽谤”之罪。第二天1957年7月5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一版头条位置,就登载了这条“新闻”,大字标题如下:

“工人学生登门责问孙大雨到底谁是反革命?”

那么,这场闹剧是不是“两报工人”的自发动?不是。闹剧的导演,正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两报工人”不过是前台的演员听从摆布而已。作为《解放日报》的记者,我不但参加了这场闯进私宅的“上门批判”,写了这场“批判”的报道,而且从源头上了解这场“批判”的精心布置的过程,了解这篇“假新闻”的精心制造的过程。

海后,似多少受了一些“真的”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了,不幸得很,那已经是日丹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了。客观效果如何,今天我们应该讲几句真话了。在延安,我曾在1938年初秋,在马列学院学习时,听过陈云讲课,对冯雪峰批评的很严。话不多,但同称赞饶漱石、潘汉年是连在一起的,听的人很多,我无从造假,此处从略了。(陈对冯的相当严格的批评,解放后一字也未流传出来。)

打破镣铐,对鲁迅真有研究或能够研究的人多得很,只要不限制他们只能作歌颂比赛,而把鲁迅勇敢地请出神坛来研究就行了。

以上意见,平常得很,能作为鲁迅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参考就好了。■

(责任编辑 黄 钟)

“文革”后，饱受十几年苏北农场劳改冤狱的孙大雨先生，重新恢复了他的尊严和学者地位；在他逝世多年之后，我作为一个亲历者，除了深感内疚之外，也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

7月4日上午，当时负责《解放日报》日常领导的总编辑冯岗，急急忙忙来到我的办公室，把我拖了就走，说：“柯老”有急事，要我们马上就去。柯老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执掌上海的党政大权，是报纸的顶头上司。跟着冯岗上了小车，赶到市委“海格大楼”，柯庆施正坐在办公室等我们。当时房间里只有三个人，他对我们面授



孙大雨

机宜，亲自布置。原话已经记不清楚，但意思很简单明确：复旦正在批孙大雨，他到处骂人是“反革命”，骂了金仲华，也骂了《解放日报》，但他赖在家里不参加批判会，就想到一个办法，由《解放日报》和《新闻日报》两报派人出面，到他家里上门批判，并且发表消息。当时听了，觉得这个办法有点“怪”，但这是市委书记亲自布置，一言九鼎，得此“重任”，哪敢怠慢。回到报社后，冯岗就派我和另一位记者，当天下午，两人一同来到锦江饭店南楼公寓孙家，进了小客厅，看到已经来了十几个两报的“工人”，不一会，孙大雨出来了，坐在凳子上，来人就围着他不断进行“责问”，电台的记者对好镜头，放好录音机，我的任务是写报道，记录下大家对他的“批判”以及他的回答，大概搞了约一个小时，才结束收场。大家还未走出门，又听到孙大雨气愤地骂了一声“可耻！”于是我们又回过头来，继续“批判”了一番。

事后知道，这场“上门批判”的闹剧，还有更深层的背景，此时毛泽东正在上海指导反右运动。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局以上干部会议上作重要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的标题是：“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讲话中，就列举了北京、上海著名“右派”的一长串名单，三处提到孙大雨其人。最近，在《上海滩》杂志上，看到范征夫同志一篇文章，说“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有不

把他打成右派的意思”。可是，细品上下文，毛泽东的“意思”未必如此，虽然他说对右派“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但紧接着他又说：“也许有一些人是不愿意过来的。像孙大雨这种人，如果他顽固得很，不愿意改，也就算了。”（《选集》第455页）其中“也就算了”这几个字，也许就为孙大雨此后十多年劳改定下了基调。

回过头来看，这场“批判”也不是偶然的，这篇假新闻也不是偶然的。在当时制度下，新闻路线离不开政治路线，而且是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反右派运动中，新闻报道

当然必须贯彻党的“左”倾政治路线。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工作者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跟着“左”的路线走，还是跟着客观事实和独立思考走？我们这些“老报人”一直受的教育是，报纸是党的“驯服工具”，报人当然也是“驯服工具”。叫你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不允许你有什么独立思考。新闻工作者为“左”倾路线鸣锣开道，摇旗呐喊，祸国殃民，害了许多人。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这条路线的受害者，如果你敢于服从真理和事实，坚持自己的思考，结果不免挨整，甚至也成了“右派”。有些人虽然在反右运动上跟着做了，但是头脑里还“残存”一些“独立思考”的“私货”，还是要被揭露出来，也不能逃脱挨整的命运。作为总编辑，冯岗同志对反右派宣传跟的也算“卖力”了，但是他头脑里的另一些“资产阶级办报思想”还要显露出来，结果还是挨了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

柯庆施书记在上海反右中积极推行“左”倾路线，祸害了好多人，孙大雨仅是其中一例，我们新闻界很多同仁也成了右派。但是也还是这位书记，保了冯岗和马达、钦本立三个总编辑，降职另用，没有戴上“帽子”。■

（作者曾任解放日报评论部副主任）

（责任编辑 黄钟）

# 1949年后胡适形象演变

○ 董立功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胡适绕不过去。这不仅是因为胡适对中国社会富有预见性的观察,更是因为他的道德文章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但从1949年至今,大陆出版各类辞书中的胡适形象却经历了“批判”、“大落”、“修正”、“再起”等几个阶段。

## 一、20世纪50年代

在20世纪40年代末,有一种辞书很是流行,即上海春明书店出版的《新名词辞典》。这种辞书印量很大,曾多次再版。1949年10月后,大陆出版的辞书首先要通过出版总署的审查,内容没有问题方可出版。所以,《新名词辞典》等辞书中“胡适”词条的内容,实际上也代表了官方对胡适的一种评价。

在上海春明书店1949年12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五四运动时,与陈独秀等办《新青年》杂志,推行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后来创办《妇女周报》,和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更后又创办《独立评论》。但思想已日趋落伍,不如先前之进步。且依附何键等军阀,甘作清客,士论薄之。抗战时任驻美大使,利禄熏心,遂沦为美蒋走卒;一面仍挂自由主义学者招牌,企图蒙混人民,更倡“和比战难”之谬论,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其诗作《过河卒子》,恰为自况他的伪自由主义分子的悲哀,现已避居美国。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 400-653-6199

在1949年12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是一个“思想已日趋落伍”的学者形象。对胡适的评价以胡适1931年创办《独立评论》为界。在创办《独立评论》之前,胡适的形象尚属正面,辞书中既承认胡适是“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又承认其“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但之后胡适的形象大不如前,称他“依附何键等军阀”,“利禄熏心”、“沦为美蒋走卒”、“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等,典型一个“失足学者”的形象。

六个月之后,《新名词辞典》对胡适的解释悄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如将胡适的头衔由“伪自由主义分子”改为“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将胡适“公然为反动统治者辩护”改为“公然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辩护”。在上海春明书店1950年6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新文学运动的最初发动者之一。五四运动时,与陈独秀等办《新青年》杂志,推行新文学、提倡白话文,对于新文学运动影响颇大。后来创办《妇女周报》,和徐志摩创办“新月社”,更后又创办《独立评论》。但思想已日趋落伍,不如先前之进步。且依附何键等军阀,甘作清客。抗战时任驻美大使,利禄熏心,遂沦为美蒋走卒;一面仍挂自由主义学者招牌,企图蒙混人民,抗战结束后更倡“和比战难”之谬论,公然为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辩护。其诗作《过河卒子》,恰为自况他的自由主义分子的悲哀,现已逃亡美国。

上述两个版本“胡适”词条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方面承认胡适早年在新文学运动中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对胡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表现持批判态度,而且这种批判的力度在逐渐加大。

仅仅过了一年,辞书里对胡适的解释就完全不同了。在上海春明出版社(由原上海春明书店改组而成)1952年6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



《胡适思想批判(论文集编)》第一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  
“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表现得相当集中和典型,而且是有全国性的反动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他曾经对溥仪下跪,称“陛下万岁!”五四时期,反对李大钊,反对共产主义。段祺瑞军阀时代,参加过善后会议。抗战时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驻美大使。后来又任北大校长,伪国大代表及制宪会议主席。又后来北京快解放,乘飞机逃难到南京,成为“逃兵”;南京解放前夕,又渡海到台湾、美国,终于成为“白华”,这就是“自由主义”天生的行径。

在1952年6月版的解释中,头一次给胡适加上了“战犯”的头衔,而且是“头等战犯”。这个解释不仅只字不提胡适早年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而且加上了子虚乌有的胡适向溥仪下跪的情节,更将1919年胡适与李大钊之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说成为“反对李大钊,反对共产主义”。

到了1953年,胡适的面目变得更加“狰狞”。在上海春明出版社1953年4月版的《新名词辞典》中,“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头等战犯之一,伪自由主义的无耻文

人。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表现得最为集中的洋奴典型,而且具有十足的帝国主义和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他曾经对溥仪下跪,还因此自以为荣。五四时期,反对李大钊,反对共产主义。段祺瑞军阀时代,参加过善后会议。抗战时充当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伪驻美大使。后来又任伪北大校长,伪国大代表及制宪会议主席。甘为美国走狗,蒋匪奴才。北京解放前,乘飞机逃到南京,自称“逃兵”;南京解放前夕,又渡海逃到台湾、美国,终于成为“白华”,最终走向死路。

在1953年版的解释中,胡适可谓面目全非。胡适的“战犯”头衔不仅继续保留,而且多了“洋奴典型”、“美国走狗”、“蒋匪奴才”等新头衔。更重要的是,将胡适从抗战到1949年担任过的职务统统称为“伪职”。

1954—1955年,大陆学术界、文化界对胡适思想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一些批判文章后来由三联书店汇编成册,编成《胡适思想批判》(第1-8辑)。这些批判文章是在官方主导下写成的,所以文章中对胡适的评价基本也代表了官方的意见。

195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关于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斗争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这篇谈话后来收入《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成为批判胡适思想的总概文。12月8日,郭沫若又在中国文联主席团、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号召文艺界、学术界“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郭沫若在发言中称胡适为“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头等战争罪犯”,因为郭沫若的特殊身份,这其实也代表了大陆官方当时对胡适的定性。

在郭沫若的号召下,学者们纷纷“各尽所能”,从各自专业角度对胡适思想进行批判。范文澜写了《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周一良写了《批判胡适反动的历史观》,夏鼐写了《批判考古学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思想》,冯友兰写了《哲学史与政治》,冯沅君写了《批判胡适的“西游记考证”》,何其芳写了《胡适文学史观点批判》,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进《胡适思想批判》。据我统计,共

收录了164位作者的173篇文章。通过这次集中批判,胡适在大陆的形象可谓“一落千丈”,胡适思想也成为学术研究的禁区。

## 二、20世纪60至70年代

毛泽东于1957年9月在上海正式决定修订老版《辞海》。1965年4月,《辞海》(未定稿)两卷本在内部发行。其中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良,为当时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右翼。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22年后,不断鼓吹“好人政府”,以麻痹人民革命意志。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积极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倡导亲美路线。1937年七七事变后,和汪精卫、陈公博等合组“低调俱乐部”,散播失败论调。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参加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活动。1948年逃往美国,后任台湾蒋帮的“驻美大使”、“外交部顾问”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并主办《自由中国》杂志,为美帝国主义效劳。1962年病死。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在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里,没有给胡适“头等战犯”、“无耻文人”等头衔,但安上了“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等新头衔,这可能反映了官方对胡适的新认识。后来据唐弢回忆,早在1956年2月,毛泽东就在一次知识分子的代表会上说:“胡适这个人可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可能只是一个即兴讲话,流露出来的意思是对胡适当年不愿留在大陆的一种抱怨,而不是

真打算替胡适恢复名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收录这个讲话。

毕竟是由国家层面组织专人进行编写,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在用语上显然更为成熟。例如原来“美国走狗”、“蒋匪奴才”等这些政治色彩明显的提法被去掉,而改成更为客观的“1948年逃往美国,后任台湾蒋帮的‘驻美大使’、‘外交部顾问’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提法。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里“胡适”词条的内容成为后来各版《辞海》修订的蓝本。

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有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胡适“逃往”美国的时间定为1948年。据《胡适日记》,胡适是1948年12月15日乘飞机离开北平前往南京,直到1949年4月6日才由上海乘船前往美国。可惜的是,这个错误在后来的1979、1989、1999、2009年版《辞海》中均未能改正过来。

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的一大“创新”就是首次增加了“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词条,内容如下:

1954—1955年全国学术界、文化界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动思想的批判运动。揭露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和它在政治上为帝国主义、中国大资产阶级服务的阶级本质;全面清算了胡适在哲学、历史、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形式主义等反动思想;并批判了胡适反动思想在当前学术界中的影响。通过这次批判,大大提高了文学界、学术界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平,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逐步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

文革期间,因为《辞海》未再版,所以也无从得知辞书中的胡适形象是如何变迁,但此时胡适早已被打入另册。而那些曾经追随着胡适的人,稍有不慎就会成为批判的对象。1966年4月3日、4月13日和4月24日,《人民日报》接连刊发了三篇批判胡适和吴晗的文章:《吴晗同志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胡适与吴晗》、《吴晗同志为胡适传宗接代》,在批判吴晗的时候顺带批判胡适。似乎是感到“意犹未尽”,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将1930至1932年间吴晗与胡适的通信公布出来,作为“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大陆对胡适的批判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仍在继续。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青年作家余秋雨

在1974年第1期的《学习与批判》上发表了《胡适传——五四前后》，文中对胡适充满了嘲讽，称胡适为“卖国贼”、“炙手可热的政客”、“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上仍不时有批判胡适的零星文章。1975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评金圣叹腰斩〈水浒〉——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在批金圣叹时又顺带批了胡适。

###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

1978年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渐回归正常，胡适研究不再全是禁区，客观、公正评价胡适也变得较为可能。80年代以来，辞书中的胡适形象也开始“回归”。197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现代学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肄业上海中国公学，1910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1922年宣扬“好人政府”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62年病死。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和《胡适文存》等。

1979年版《辞海》中的“胡适”词条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有了很大的改进，如不再称其为“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

但仍保留了很多不合时宜的内容，如将胡适与李大钊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继续解读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如将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上纲上线为“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

1989年，《辞海》进行了第五次修订。1989年版《辞海》的“胡适”词条有两个重要的进步，一是虽然继续提到了胡适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但未再将其解读为“与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对抗”；二是将1965、1979年版《辞海》中“1962年病死”的提法改为“后在台湾去世”，这体现了对逝者的尊重。198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现代学者。原名洪驥，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上海中国公学肄业。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七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

驥

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离开《新青年》，创办《努力周报》。认为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是“海外奇闻”，宣扬“好人政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并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名誉秘书。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并发表“全盘西化”主张。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后在台湾去世。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



胡适墓碑记

卷)、《胡适文存》等。

在1989年版《辞海》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将胡适与李达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重新定性为“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1979年版《辞海》本已将“指导中国革命”的字眼删掉,但1989年版《辞海》将其再次加上,这可能与时局有一定关系。

1989年版《辞海》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新增了胡适“代表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的提法。这一提法一直沿用至2009年版《辞海》。其实,这一提法并无依据。《辞海》中提到的《中美互助条约》准确的名字应为《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这个条约是1942年6月2日由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和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署的,而胡适当天的安排是“赴Baltimore Maryland Goncher学院代宋美龄接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发表演说《向前看》”。可见,《辞海》中的表述有误,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中美互助条约》的不是胡适,而是宋子文。可惜的是,这一错误在1999、2009年版的《辞海》中均未能纠正过来。

此外,1989年版《辞海》还继续沿用了胡适“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说法,其实,胡适当时是主张应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的,后来有学者专门对此进行论述。

1999年,《辞海》进行了第六次修订。可能是接受了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原因,1999年版《辞海》不仅不再保留胡适“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说法,而且称胡适在“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99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学者。原名洪驊,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尝试集》,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

府”和“省自治联邦制”的主张。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反对国民党实行独裁与文化专制主义,倡导自由主义。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主张“全盘西化”。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到了2009年,《辞海》中胡适的形象更加正面,不仅不再提胡适曾主张“全盘西化”,而且连胡适“反对文言文”也不提了。2009年版《辞海》里的“胡适”词条内容如下:

胡适(1891—1962)中国学者。原名洪驊,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发表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影响颇大。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宣扬“好人政府”,主张组织“宪政的政府”,实行“有计划的政治”。1925年参加段祺瑞策划的善后会议。1928年后,发起人权运动,倡导自由主义。1938年任驻美大使,代表国民政府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国民大会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1948年去美国。1958年后去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胡适文存》等。

上世纪40年代末的“无耻文人”、“美蒋走卒”逐渐发展为50年代中期的“头等战犯”、“洋奴典型”,到60年代中期的“买办资产阶级学者”、“政客”,再到80年代以来的逐步回归本来面目。辞书中胡适历史形象的转变,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变迁。■

(作者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黄钟)



# 胡绩伟周年祭

○ 袁 鹰

去年9月初,胡绩伟老人去世前数日,他的好友《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同志去医院探视,老人已濒于病危,无力多说话。握别时只用低沉的声音说要给一件冤案平反。杜老在电话中向我转告这句遗言时,我不禁眼泪夺眶而出,这就是胡绩伟!在生命垂危时刻,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最关怀的大事!几天以后,就传来噩耗。那几天里,我常常凭窗遥望云天,哽咽无语,六十年往事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2011年胡绩伟在家中书房

整整六十年前,1953年元旦后的一个晚上,《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约见我们四个刚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北京的人,询问每个人的经历和对工作的愿望,娓娓细语,使我们感到亲切,快结束时,一位矮矮个子的同志推门进来要同邓拓谈工作,我们当即起身告退,邓拓介绍说:“这位是胡绩伟同志,副总编辑。”绩伟同志含笑同我们一一握手,用四川口音说:“欢迎你们来《人民日报》一起工作。”

普普通通一句话,让我们增加了暖意,这第一面的印象,也让我一直记住。

胡绩伟同志(报社上上下下都称他“老胡”,如同称邓拓为“老邓”)作为常务副总编辑,长期主管编辑部日常工作和夜班,很少管我们文艺部工作,所以除去每天下午的编前会以外,我同他日常接触并不多。1965年夏他带队去北京郊区房山县搞“四清运动”。那时奉为“四清”指针的“二十三条”,第一次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新名词,我们工作队在学习阶段就没有完全搞通,怎么会土地改革十多年——公社化也已五六年之后,中国广大农村竟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势?我带一个工作队去的罗家峪大

队,是个贫困的半山区,严重缺水,也没有什么副业,社员日夜辛劳,工分值满分只有不到一毛钱。大队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天天带头劳动,辛辛苦苦,在群众中很有威信。我们按照“二十三条”,访贫问苦,仔细查账,忙了两三个月也没有发现多大问题,无非是有些账目不清楚,个别队干部作风粗暴这类事。“四清”没有成绩,工作队情绪不高,倒是同社员相处得很好。有一次老胡带了几位同志来检查工作,听了我们汇报后,轻轻叹口气:“这样贫苦的队,哪会有什么走资本主义当权派!”

我回答:“这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如果按‘二十三条’的干部标准衡量,不是一类干部也是二类干部。”全体工作队员齐声称是。老胡说:“那你们就从实际出发,多做一些提高党员和群众思想的教育工作,不要硬找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了。”他这话解除了我们工作队的思想负担,不禁大大松了一口气。当时怎会想到仅仅半年之后,一顶“走资派”(而且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大帽子竟然会落到他老胡自己头上呢?



2007年重阳节，胡绩伟和章世鸿、林钢、袁鹰（后排从左至右）合影

“文革”大动乱开始之日，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驻报社，夺了中央党报的大权。那个以写《中国四大家族》起家的陈伯达，一走上报社大礼堂讲台，就宣布吴冷西（社长）、胡绩伟（常务副总编辑）、陈浚（值班副总编辑）、王泽民（机关党委书记）是人民日报的“四大家族”，在打倒之列，号召全社职工造他们的反，揭露他们的“三反罪行”。一声令下，一群“造反派”闻风而起，大字报很快就贴满几层楼，在五楼大礼堂连续举行批斗会。报社各部门的领导人全都被罢官，到印刷厂参加劳动，随时接受批判。平心而论，当时报社的大小批斗会，像大中学校发生的那种拳打脚踢、揪头发、泼污水一类的野蛮残暴行为并不多，常见的是言辞粗野，人格污蔑，动辄上纲上线。在这类批斗会上，老胡都以冷静的态度相对，既不一味抗拒，也不随意给自己戴大帽子。有近一年时间，我和他都被囚禁在“牛棚”，限制人身自由。每天体力劳动和“早请示、晚汇报”之余，开批判会，所谓“批判会”，也就是静听监管的造反派任意点名辱骂一通，或者每个人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1968年一个寒风萧瑟的晚上，全体肃立，聆听广播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宣布“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大家震惊之余，愕然无语，都知道刘少奇同志要遭大难，却没料到竟然如此严酷。监管的造反派，在广播结束后立即到“牛棚”宣布开会学习公报，用揶揄的口吻冷笑

道：“看吧，你们的总后台完蛋了，你们还不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吗？”他指定胡绩伟首先发言，老胡似乎已有思想准备，低声说了几句，大意是“刘少奇的问题竟会这么严重，很出意外，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要认真学习公报，我多年来在工作中执行刘少奇的许多指示，肯定有许多错误，一定要认真检查。”他这么一说，我们几个原先在编辑部各部门任领导职务的“当权派”，也就照猫画虎地跟着说一通了事。其实，主持会的监管人员也是例行公事，一遇到发布“最新最高指示”，就立即开会学习，要“牛棚”中人联系自己发言表态，今天

也是如此，未必真的认为听到广播消息就能从“牛棚”里捞到有关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什么新的罪行材料。

有一次劳动间歇，老胡同张潮、高集和我坐在地头，忽然轻声询问：“你们说说，毛主席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为什么？”我们一时默然无语，他自己接着说：“要打倒刘少奇，开一次中央全会，像庐山会议打倒彭老总就行了嘛，何必搞全国规模的大运动？想不通。”我们也说“想不通”。他问高集：“老高，你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你说说国际上有多少真的是在搞修正主义的？”老高笑笑说：“我看也没有多少。”他又问我文艺界情况，我回答这些年来文艺界接二连三挨批挨整，帽子一大堆，都已经灰头土脸、不知所措了，谁还有胆子去搞什么修正主义？虽是地头闲谈，但我已感觉到老胡身处“牛棚”困境，不仅处之泰然，却已经对目前的“文革”以至“文革”前十多年的历史开始认真地思索了。

祸国殃民的“文革”十年动乱结束，老胡回报社担任总编辑，他带领全报社同事情绪昂扬、意气风发地着手在废墟上重建中央党报，坚决贯彻党中央拨乱反正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短时期内面貌大变，报纸销量激增至六百多万份，被遍誉为《人民日报》最好的时期。

1978年5月，我随他率领的报社代表团出访朝鲜。他曾于1959年访朝，这次是第二次，又是

“文革”结束后初次出访,理应轻松愉快,高高兴兴,但是我发现他一坐进车厢,便紧锁双眉,似有满腹心事。晚上到他房间里探询,才知道前两天报上转载《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重要文章和另一篇关于按劳分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引起当时主管宣传的一位中央常委大发雷霆,指责《人民日报》“不按党性办事”,说要查一查“《人民日报》代表哪一个党中央”。他的老同事吴冷西连夜来电话严厉责问,说“真理标准”一文“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连说“很坏,很坏”,咬牙切齿之声,隐约可闻。如此严峻的气氛,使老胡深切感到不只是报上一篇文章和他个人工作上的压力,更面临着不仅是理论上更是思想路线上的大是大非之争。他不能回避,更不能退缩,而是横眉冷对,迎上前去投入战斗。他在车厢里午夜梦回,耳听列车咆哮前行,思绪万千,枕上写了一首诗:

廿年颠沛再东游,虎口余生历春秋。  
斗鬼战神知左右,闯关跨江识友仇。  
誓学邻邦千里马,永当祖国一奔牛。  
老夫喜作列车颂,咆哮奔驰不回头。

胡绩伟同志一生追求真理,孜孜以求奋斗八十年。到了他生命后三十年,虽然迭遭打击,几乎被“革出教门”,但他不仅没有跌倒,坚强不屈,而且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峰,体现在晚年重要著作《胡赵新政启示录》这本著作里。三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凝聚了他一生的追求。在著作的开篇,他坦承“这是我七十年的思想总结,着重根据我信仰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的思想发展历程,解答我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的两个根本问题:一、我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正确的真理?二、我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不是走错了路?”他说“这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在心中酝酿了几十年,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一个是七十年前,我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信仰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加入的中国共产党,难道当时就错了吗?我这一辈子的六十多年中,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七十年后,他说:“对于这两个大问题,不能不从思想上认识上做出结论。否则恐怕就只有带到另一个世界去了。”这

两个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沉甸甸的问题,值得我们这些自认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有年的人严肃认真地反思。就如我自己,是老胡的后辈,自以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共产党也有六十多年,如果认真反思:年轻时信仰和追求的,同现在见到的是一回事吗?我信仰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吗?我究竟当了一个什么样的共产党员?恐怕也是要辗转反侧、心情不得安宁的。

近十年来,老人经历过几次大病,体力渐渐不如前,都从未被病魔击倒,精神越来越健旺,斗志越来越坚强。就如他自己所说:“百病磨出长寿命,千年炼出老精灵。”“下定决心埋头干,健脑健身战病魔。”他仍然笔耕不辍,一往无前。写了《胡赵新政启示录》那本巨著,还写了几篇论述和纪念胡耀邦的重要文章(《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胡耀邦》、《胡耀邦的思想体系》、《胡耀邦与西单民主墙》和《我经历的新闻出版自由》(2003年7月)、《靠假、大、空能兴党吗?》(2007年12月)、《〈人民日报〉究竟在为谁办报?——写在〈人民日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2008年5月))等等,都是振聋发聩的好文章。他胸襟广阔,坦坦荡荡地追求真理,维护真理。以衰病之躯继续严肃地思考人民的民主自由权益和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他的崇高品德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实在是我们后辈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从2005年起,他每年元旦都写一封信分寄好友,互相勉励,成为我们许多人最宝贵的新年礼物。每次信末,他都附一首新作。2012年,他已进入九六高龄,仍然兴致勃勃地写道:

神采奕奕九六翁,心有余而力不从。  
笔战报坛五十载,大半心安小半疯。  
卅年夜班一万夜,奉献良宵尽精忠。  
出版文集十七卷,五百万字舒心胸。  
勤者多助成大业,切莫抄手当衰公。  
“少慢差费”养老诀,依然静观普世风。

我拜读之余,感慨万千,去电话贺年后,也写了一首步原韵的小诗求教。现在抄在下面,作为小文的结束,并表哀思:

铁骨铮铮九六翁,冰刀霜剑自从容。  
一生心血求真理,廿卷文章矢素衷。  
举世滔滔难倒退,长江滚滚总朝东。  
期颐茶寿眼前事,笑对东西南北风。■

(责任编辑 黄 钟)

# 为地质学院造反派说几句话

——对《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的一些意见

○ 阎长贵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发表的《在〈文汇报〉北办的经历》，是朱维铮先生的口述，由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亲切。金光耀先生是历史学家，还钟情于文革史研究，我很敬重。我和朱维铮先生也有过交往，1982年，我（时任《红旗》杂志编辑）到复旦大学组稿，曾在他家和他晤谈，很投机，他还送我他著的书。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是研究文革史的一份重要史料，但他关于北京地质学院造反派情况的回忆，即他说：他1967年“4月下旬到北京”，这时，“地质学院的地派作为极‘左’的组织被搞掉了”。我认为，不符合事实。

说地质学院的造反派（其名称：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简称：“地院东方红”）“左”，没问题，所有造反派都“左”，而在所说的北京五大高校中唯独对地质学院造反派冠以极“左”的组织，其道理安在？“地院东方红”无疑也做过错事，如批斗地质部、地质学院的所谓走资派，降低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高薪（把有人345元降低到31元，287元降低到67元……），以及参加社会上的一些造反活动等，掌权后也有压制和听不得不同意见的情况等，有很多经验教训需要记取，也需要道歉和忏悔。但整个说来，或从总体上说来，“地院东方红”在运动中是比较注意政策和分寸的。比如，中央文革（戚本禹通过我）最先是布置他们到四川揪彭德怀的，当时他们的头头朱成昭接受任务派王大宾等人去，待接触彭总，和彭总谈话后，他们认为彭不反毛主席，也不反对文化大革命，不应该揪，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了报告，戚本禹看到报告，郑重地跟我说：“你看，叫他们去揪彭德怀，他们却被彭德怀征服了。”——在整个揪斗彭德怀的过程中，彭总认为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从始至终对他都是比较好的。彭德怀传记组编写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怀全传》讲到“文

革”中批斗彭德怀有好多学校和单位，但没讲到地质学院。看到此说法，我问地质学院造反派的一个头头，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当时我们地质学院没有轮到呀！可能上面也不信任……”，这也是地院造反派对彭总态度比较好的一个证明。——也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又叫韩爱晶派人去揪彭德怀……

实际情况，“地院东方红”在1967年4月下旬以后，恰恰不是“被搞掉”。第一任头头朱成昭，从1966年12月开始逐渐不满意中央文革的思想和行为，比如对逮捕“联动”分子镇压“联动”不赞成，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说陶铸是被抛出来的等等，受到陈伯达的严厉批评，在领导地院的运动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原来头目之一的王大宾取而代之，成为“地院东方红”的第一把手，1967年4月3日成立了院革委会，“地院东方红”依然活跃，在北京高校乃至全国，有很大影响力。

1966-1967年，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1966年12月改为“办事组”）的工作人员，和“地院东方红”是联系比较多的，不论和他们的第一任头头朱成昭，还是和继起的王大宾，都很熟，关系不错。我觉得“地院东方红”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地院造反派是保院主要领导的，即造反一开始就保院长（高元贵，一二·九运动中中国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行政八级，他担任院长是受师生欢迎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矛头对准院长和一大批中层领导，一些学生、干部和教师不同意这种做法，给工作组提意见，被整，就起来造反了。这在北京高校中，乃至在全国高校中，也是不多见的。

第二，“地院东方红”，本来也是少数派，但时间不长就一统天下了——不少党政干部和教师也都参加了“地院东方红”，在地院没有出现与之一对立和抗衡的另一个全院性的造反派组织。当

然,在“地院东方红”内部也有小的派别。

第三,地质学院的造反派不仅保护了本院的一些领导和教师,还保护了院外的一些人。关于这个问题,可举《炎黄春秋》2004年第1期所发李锐《从一个案情看一段痛史——〈回忆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中谈到的一个情况。李锐在这篇序言中有一段关于地质学院造反派的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黑体为笔者所加):

作者在记述“文革”时期颠沛流离的经过中,记下在北京地质学院接待站的经历,我以为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记录。通常,人们一说起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时,总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这里遇到的一些大学生,仍有着年轻人的热情和正义感,听了伯康的说明之后,就尽力帮助他们,想为他们讨还公道。尽管当时完全没有可能解决这样的冤案,但是这些大学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动的。这也使我们看到,即使在暗无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些好事。伯康说:“我们和这些青年学生相处一年多,在那动乱的年月,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过火越轨的行为。他们不辞艰辛,不畏风险,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地做了不少调查工作,无非是为了弄清我们问题的真相,辨明是非曲直,伸张正义。他们没有个人功利目的,动机是纯正的,为人是正直的。他们在我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写出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就可以增强对国人人性的信心,对我们民族未来的信心。

关于这件事,我问过王大宾本人。他告诉我们:我们确实保护过外单位的一些人,我们专辟一个楼做这件事情,除了四川的肖(肖泽宽,重庆市委组织部)、李(李止舟,重庆市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廖(廖伯康,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以外,我们还保护过其他一些干部(包括邓小平的弟弟武汉市副市长邓垦、重庆市委的刘隆华和吴海如等)和一些著名人士(如京剧表演艺术家、第一个演阿庆嫂的赵燕侠,歌唱名演员郭兰英,大导演崔嵬等),大概共有40多人,当时没人敢到地院揪人。对地质部部长、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我们专门发了保护声明,此事受到周总理表扬,说我们:“做得好!”王大宾说:保护干部和名人,这是周总理交给我们的任务,副总理李先念直接给我们学校拨专款——拨款最后没用完还交上去了。不管什么原因,这在文革中说来,都是一件

好事——大好事!

我说了地质学院造反派的几个特点,不知是否符合实际,还请原来地质学院的同志和了解情况的其他人指正。一句话,我认为,不论对造反派,还是对文革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把事实搞准确,并且注意人和事的复杂性,坚持分析的态度,千万不能和不要“一锅煮”,用一个名词和概念掩盖和混淆事物的真相。

顺便说说,金光耀先生采访整理的朱维铮先生这篇口述,还有不准确的地方。

1. 凡出现关锋的地方,都把关锋误写成了关峰。

2. 一面说“8月王关戚事件出来后……”;后面又说,“‘武汉七二〇事件’后不久,王力和关峰垮台了,戚本禹还暂时没被抓”。这两处叙述有矛盾。关于王关戚垮台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王力、关锋垮台是在1967年8月,具体说是8月30日被隔离审查,而“戚”(戚本禹)垮台即被抓是在1968年1月12日。■

(责任编辑 黄 钟)

## 一部传记片 光彩永流传

### 私人传记片

成功人士,就应该给自己树碑立传。

以前只有大人物才有传记片流传于世,现在,我们可以为您拍摄一部私人传记片(不公开发行)。它讲述您的奋斗与艰辛,展示您的成功与辉煌,总结您的人生感悟。

我们有资深的纪录片制作团队,曾给政界人士、社会精英、文化名流、商界巨子,特别是离退休人士制作过传记片,广受赞誉。

精美的影像画面,专业的配音和剪辑,一部高水平的传记片把您的精彩人生纪录在一张明亮的光盘上,永远流传。让亲友分享,让后辈铭记。

本片还可在学术交流、社会活动中播放和馈赠。

我们也可为您年老的父母拍摄纪录片,留下他们的音容笑貌、人生回忆。百年之后,它将是我们的缅怀父母最好的方式。

详情请咨询:010-68642488 010-53667361

15701519832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www.bjzsky.net

# 不因人废言,更不可因言废人

——《人权与宪政:罗隆基读本》序

○ 郭道晖



罗隆基

中国有一个不良传统:“因人废言”。当某人一旦被视为异己者、敌对者、麻烦制造者,被权力者所诟病,受到排斥、打压而沦落后,即使这之前或之后他的言行是正确的,有益的,都被一概封杀,落得和其人一样被废。而其人之所以被“废”,往往也是由于其言遭忌,“因言废人”。

中国现代史上著名民主人士罗隆基多少处于这种境遇。自从1957年那场狠整知识分子的运动中他中计落马,成为至今也不蒙“改正”的“大右派”之后,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进步活动和有关人权、自由、民主、法治的理论贡献,从此被人们遗忘、禁谈、消失。现今的一些中青年、乃至六七十来岁的老人,恐怕很少知道这个新中国时期被千夫所指的名士,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经是

一位为伸张人权正义而被国民党政府一度关进监牢的民主斗士。

下面简述民国时期的一场人权大论战情况,其主角就是胡适与罗隆基等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建立全国政权后,也曾在1930年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过一道《人权保障令》,这种“官方人权”只是表面文章。随着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的施行,国民党恣意实行专制,践踏人权,围剿共产党和爱国人士,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矛盾冲突也日益尖锐。

此前,一场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真正的争人权运动勃然展开。起因是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教育部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一个《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的议案,并获通过执行。该议案规定凡经国民党省党部或市党部认定是反革命的,不须经司法机关侦查,就可直接交付审判定罪。此案激起全国知识界哗然。胡适、罗隆基等新月派文人认为此案不讲人权和法治,起而论辩。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刚颁布“保障人权”的命令,就有安徽大学一校长因在语言上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另有唐山一商号经理被驻军拷打拘禁。胡适忍无可忍,针对国民党一面大谈人权保障、一面却又恣意蹂躏人权的丑行,1929年5月,致书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斥责只凭党部一纸证明便可定罪处刑实为世界法制史上闻所未闻,挖苦“中国国民党有这样党员,创制新制,大足夸耀全世界”,并将此信交国闻通讯社转送各报发表。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要求“以约法保障人权”。罗隆基也在同一期上发表《专家政治》,揭露国民党是搞“武人政治”、“分赃政治”,开始了民国时期一场人权大论战。随后梁实秋在该刊第3号上也发表《思想统一》一文,要求思想自由

和实行自由教育,反对思想统一。胡适在《新月》第4号上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批评国民党假借孙中山的遗教搞训政的错误,同时还转载胡适另一篇批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认为这种学说被军人政客利用来为其无知和专制辩护。这一期《新月》就被国民党当局以“侮辱总理(孙中山)”的罪名予以查禁。但罗隆基却继续在第5期上发表其人权代表作《论人权》,其中提出了35条(实只34条)“必争的人权”项目,主要是针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军事独裁的现状提出来的,其含义已经远远超出其他

“人权派”成员的人权思想范畴,从而成为当时“人权运动”的“人权宣言”,是一篇有系统的人权理论和争人权的纲领性战斗檄文。

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出罗隆基的人权理论轮廓。他认为凡是做一个人所必要的条件,都是人权,包括维持生命,发展个性,培养人格,达到人群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在人权与国家的关系上,罗隆基主张人权是“先国家而存在之权”,国家、法律只能承认人权,而不能产生人权;国家的功用在于保障人权,达到全体国民的共同幸福。国家是人的工具,而不是相反。在人权与法律的关系上,他认为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争法治者要先争人权。

随后他又发表了《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还通电发表《我对党务上的尽情批评》,指斥国民党的一党独裁。随即国民党政府又查禁了《新月》第5、6期,并在1930年11月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国家主义领袖和共党嫌疑”等罪名逮捕罗隆基。经蔡元培营救保释出狱后,罗隆基仍继续公开发表《被捕经过与反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乃电令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职,《新月》也被迫停刊。一场争人权的理论论战和社会运动宣告失败。

在这次斗争中,罗隆基显示了他人权理论上超越前人的水准,和他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



1949年,上海虹桥疗养院:丁惠康(左)、张澜(中)、罗隆基(右)

他也以这次“人权论战”的主将而名闻国内外。他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后来成为民盟的领袖之一、共产党的同路人,在争取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上是有贡献的。

读者读到以上历史片段的介绍,或许会悟出罗隆基超前的人权理论及其斗争的时代意义,而不再“因人废言”。读后再来浏览本书所收入的罗隆基本人的有关论著,一定会有所启迪。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罗隆基,不过凑巧和他也有过两次机缘。

一是我亲身经历的1951~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那时我还只是电机系毕业班的学生,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被党委抽调去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教学组组长,后来在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被派负责联系文、法学院和理学院的工作。运动中多数教师被迫或半自愿地检讨“从旧社会带来的旧思想”,号称“洗澡”,还组织学生批判老师。教授们反映:“洗澡水是滚烫的。”一般检讨1-2次过关,但对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先生则扭住不放。他在清华学校(中等科)时期与罗隆基是同学,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鼻祖,费孝通的老师,解放前后与罗隆基同是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政治上是反蒋的民主人士。但因为他们都是英美派知识分子,被中共领袖视为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把他们当

异己的势力。当时潘光旦兼任清华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清华“洗澡”重点是潘光旦。他在社会系和法学院全院大会上先后做了3次检讨,还不让过关,说他是“铁心皮球”(“外圆滑内铁硬”、顽固抗拒运动)。当时我想不通为什么要把他这样一个进步人士整得那么厉害。其实这并非清华党委的自作主张,而是由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掌握。我到市委统战部部长李乐光同志(他也是清华大学的老校友)家里去汇报,我说潘光旦已经检讨了3次,为什么还不让他过关?李乐光说了一句:“这个你就别管了。”当时统战部一位干部老吴直接联系我。他原是北大地下党员,我原也是清华的地下党员,我们有战友之谊。他私下对我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中央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当时唯一能和我们党争夺领导权的就是民盟。民盟有政治资本,他们反国民党是有功的。

后来,在全校大会上潘光旦教授作了第四次检讨,总算勉强通过。市委还叮嘱我们将有关批潘的发言和资料,都特地印制成册,分送民盟中央上百份。可见,清华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是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是给民盟“右翼”一个警告。现在看来,这实际上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整民盟“右翼”、特别是整罗隆基留下了伏笔。我也是从这次运动知道了罗隆基其人,不过并未谋面。

第二次是上世纪60年代,我被“发配”去编写清华大学解放前的校史。我和校史组的同事认为,罗隆基、潘光旦以及钱端升教授都是清华历史上的活跃人物和当权者,写清华早期的历史少不了他们。而他们年岁已高,为了抢救这些活的历史资料,必须向他们请教,不能“因人废言”。我们就一一登门求教。不过,他们1957年都被打成“右派”,而且尚未“摘帽”,何况我本人当时也是一个所谓“摘帽右派”,所以去访问他们是很犯忌的,要冒风险(果然在后来的文革中,批我的大字报就抓住了这事搞大批判,说“一个大右派去访问另几个大右派,究竟是何居心,有何阴谋勾当?!”)。

这回我算是“零距离”接触了罗隆基。他见我们这些清华后生登门拜访,十分高兴(看得出那些年他“门前冷落车马稀”,恐怕没有几个人愿

去或敢去找他),忙着让勤务员倒茶、请吃西瓜(他那时的部长级待遇还没有完全取消),很平易近人地和我们侃侃而谈,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实、观点以及清华人物轶闻掌故。他也显得颇为得意,因为所谈的确是青年时代的辉煌。访问后不久,罗隆基就去世了。而我们也总算抢救了行将被淹没的一段校史。我们写的访问记至今还被清华校史研究室收入校史资料丛书,予以出版珍藏。我写的潘光旦访问记还被公开发表在《人民政协参考资料》上。由我主笔和统编的这部校史,改革开放后还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获得北京市第一次举办的社科图书评奖的一等奖,其中或许也基于有罗隆基、潘光旦、钱端升等这些“老清华”学生和教授提供的翔实生动而真实的资料吧。

讲述上述小故事,意在为阅读本书的读者提供一点背景资料,希望国人不要再承袭“因人废言”的旧习,更不要“因言废人”。何况历史实践已表明,无论上世纪30~40年代作为人权理论家和民主斗士的罗隆基,还是50年代为民主人权而进言、自身的人权却被严重侵犯了的罗隆基,其言其行和历史业绩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有人认为他在为人与行事作风上有瑕疵,不为某些人所认同,但无伤大节。■

(作者为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博士生导师组成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责任编辑 黄 钟)

## 更 正

贵刊2013年第5期《傅高义〈邓小平时代〉的硬伤》一文中,“苏振华的夫人梅迪伦”(第78页)有误,苏的夫人应是陆迪伦。

北京读者 张振林

《炎黄春秋》第5期第14页右栏中“1970年林彪摔死后”应为“1971年林彪摔死后”;第46页图片文字说明“1946年,司徒雷登与周恩来在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草坪上交谈”,应为“1946年,司徒雷登与黄华在南京驻华大使馆草坪上交谈”。

广西读者 李日昶



# 新闻审查浪潮中沉浮的红色诗人

○ 李玉贞

列宁的“学生”斯大林在导师逝世后,继续执行无产阶级的文艺政策。拥护布尔什维克政策以维护党的领导,成了无产阶级新文艺的天职。尽管俄共党内对国内外政策的分歧由来已久,党的高层出现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列宁逝世前后权力斗争开始越来越激烈,但是在文艺政策上他们并没有分歧。

共产主义和文艺的阶级性是苏联文艺政策中始终金光闪烁的亮点。某人某作品是否符合无产阶级思想和需要,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布尔什维克的党性,是苏联文艺政策中划分作品优劣的标准,也是文学艺术家所受待遇的根据。杰米扬的经历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

## 政策的砝码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家倾斜

杰米扬 1883 年生于乌克兰,就读圣彼得堡大学人文学系,1899 年发表第一本抒情诗集。1912 年加入俄国民主工党,开始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后写有许多诗歌、寓言等作品。苏俄内战时期在工农红军从事鼓动工作,写有称颂列宁和托洛茨基丰功伟绩的诗作,把他们称之为带领苏俄向共产主义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托洛茨基说杰米扬是以诗歌作武器的布尔什维克。1923 年杰米扬获得红旗勋章,这是苏联给文学家颁授的第一枚勋章。20 世纪 20 年代他的书总发行量已经达到 200 多万册。有人将其与高尔基相比。

布尔什维克政策的砝码明显地向无产阶级文艺家倾斜。列宁曾经称赞杰米扬的作品,说他下笔有神,入木三分。1918 年杰米扬携全家、亲属包括保姆搬到克里姆林宫居住,得到各种福利和极高的政治待遇。作为红色诗人,他频繁出现在高级领导人的会见和宴会上,在克里姆林宫里有一套住房和多达 3 万册藏书的私人图书馆。

斯大林有时从那里借书。布尔什维克给杰米扬配备了一辆专用福特牌轿车。出远门时,列车上为他挂有专门车厢。定期到高加索疗养,也在他的特殊待遇之内。游乐山水间,杰米扬得意之际写信给斯大林说,帝俄的资产阶级可真不是傻瓜,知道每年到如此好的地方度假。

杰米扬称斯大林为“天轴”。用几何术语“天轴”或“轴心”一词比喻领袖,在苏联文学史上是开创性的。

同时,杰米扬还通过分析斯大林的名字,说斯大林生来就是硬汉,因为他的名字中的词根是钢(俄文 СТАЛЬ)。说这可不是玩具弹簧,而是铁腕,是钢刀。

1926 年 10 月 7 日,杰米扬在《真理报》发表诗作,讽刺托洛茨基反对派,说“一切都有尽头”。斯大林看过后立即给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打电话,称赞杰米扬的政治讽刺诗,并请他们向杰米扬表示敬意,感谢后者剑指托洛茨基,写了“真诚的、党性很强的诗”。

杰米扬的努力并非没有回报。从个人健康到创作生涯,他得到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无微不至的关怀。每遇困难,杰米扬便会向斯大林求救。一次杰米扬写了一篇文章,投向文学、艺术、科普性质的《30 天》(1925-1941 年)画报,但是遭到编辑部退稿。杰米扬便向斯大林告御状,说这本是一份为工人办的刊物,但实际情况却令人失望,他请斯大林读读这份刊物,“看看,它还有没有一点活力”,它怎么能拒绝发表杰米扬这样一篇“特别珍贵的,无论从艺术还是政治上,都不可多得的文献”。杰米扬语气中不无娇嗔,说今后“还不如到一个外省杂志上去发表”。经斯大林特别关照,不久,杰米扬的《世界的十月颂歌》便在《30 天》杂志上刊出。可幸的是,杂志本身并没有因为杰米扬的御状而停办。

1928 年斯大林得知杰米扬患糖尿病,体重急



斯大林

剧减轻,视力下降,便致函政治局。后者据领袖旨意做出决议,送杰米扬携带家眷到德国休养。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频繁地致函斯大林,向伟大领袖或汇报或请示或谈观感,二人保持着书信往来。

9个星期后,杰米扬康复回国,于9月20日函谢斯大林,积极配合后者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斗争。这时候托洛茨基已经失势,敏感的杰米扬顺便向斯大林报告托洛茨基著作在德国出版的情况,在德国的影响力,及其《俄国现状》一书的出版。言词间颇多对托洛茨基的蔑视。

## 从领袖处得到真传

特别令杰米扬感到骄傲的是,列宁读过他的作品,而且他聆听过列宁论文学,有列宁真传,杰米扬在早期的苏俄作家中拥有无人比拟、可遇不可求的、雄厚的政治资本。

在与斯大林的通信中杰米扬多次回忆为苏维埃而战的日子,与列宁的相见和后者教导。他向斯大林报告过同列宁讨论农民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所起作用的情况。杰米扬告诉斯大林,听了列宁的一些话,他感到茅塞顿开,例如对农民力量的看法。怎样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呢?列宁说“让那些为沙皇俄国卖命的恶棍”来为劳农政府服务,把“新招募的农民兵派去

为苏维埃政权厮杀”。列宁概括这个做法是“旧曲新词”,这事让杰米扬太多感悟,乃至他记忆犹新。斯大林有一次则更加生动地表述说这就叫:“旧瓶装新酒。”

再如关于如何鼓舞士气,作家、艺术家如何对待社会问题。杰米扬记述说:那是1919年,在苏俄内战时期,布尔什维克政权面临严峻形势,列宁不无担忧,不知道士兵们能否顺利地打败白卫军。杰米扬把1882年出版的一套三卷本的名《北部边区哭习大全》的巨著送到列宁手边。书的作者是著名的俄国民族学家、民俗学家巴尔索夫。书的内容确如其书名所示,作者归纳了北方边区居民如何哭别死者,对不同的人有不同哭词,不同的哭法,声调表情都各有特色。如丈夫哭妻子,妻子哭丈夫,哭词不同;弟哭哥,哥哭弟,词不同;亲姊妹间,姐姐哭妹妹和妹妹哭姐姐不一样。哭亲姐妹和堂姐妹不能用一样的词句。侄子亡故,对留有子女的和没有留下子女的哭词迥异。外甥哭舅舅,舅舅哭外甥,词不能相同。哭叔叔有亲或非亲之分。哭遭雷击,溺亡者,词不相同;哭神甫的词有宗教色彩;哭阵亡者语句高昂;文书死亡,另有哭词,另有哭法。

列宁看了这本书,已经使杰米扬十分荣幸和兴奋,因书是他向列宁推荐的。而列宁与杰米扬讨论这本书的情景和话语几乎成了杰米扬后来为苏维埃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座右铭。一次列宁和杰米扬讨论了前书的第二卷。列宁说:“我们俄国汉子不爱打仗。你看哭得眼泪成河了。不过,能不能用同样的语言打动他们呢?我们抨击旧的令人悲怆的行伍军旅,但是用**欢快**(原文大一号的黑体,下同)的笔调写新的军旅生活?”

杰米扬写信向斯大林介绍这个情况,认为列宁抓住了要害。“就应该这样写。我那些反映战地生活的东西就是用**欢快**的笔调写成的。我们是饿着肚子干革命,但是革命是**欢快的**。有信仰。”

杰米扬找到了方向和方法:“不管我写什么,不管我读什么书,我首先把握住的便是鼓舞人心的、充满胜利希望的、令人憧憬的未来。”

后来杰米扬多次说起自己在苏联的角色,并按照列宁教诲给自己定位——“一个鼓动型的作家”。

为此他学会了充分准确地把握高层的政治动向。这一点他做到了。到1924年斯大林与反

对派季诺维也夫的分歧已经明显,二人的不睦在克里姆林宫已经公开显现。杰米扬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就势介绍了1919年自己与季诺维也夫的争论。事情发生在叶卡捷琳堡,那是苏俄内战时期,一群士兵躺在冰冷的木板上,高高地有一个大广告牌,上面写着:

杀尽吸血鬼,  
劳动者上天堂。

或许这就是所谓革命的乐观主义。在俄国内战的背景上,当有产者被剥夺,当红色恐怖肆虐的时候,杰米扬保持着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目标的坚定信念。

然而有趣的是,还在那时,季诺维也夫就感到苏俄政策并非尽如人意,他不喜欢这样粉饰太平的诗句,便不满地对杰米扬说“哪里有什么天堂?”并且问这诗“是哪个傻瓜写的?”杰米扬报了自己的名字。季诺维也夫当时就怀疑,谁能让这些“饥寒交迫的士兵相信他们能上天堂呢?”

可是通过我们的鼓动,“他们相信了。杰米扬在信中真诚地向斯大林表态说,不鼓动,不宣传,我们会‘一事无成’。”杰米扬的信取一箭双雕之效,既揭了季诺维也夫的老底,迎合了斯大林,配合了他对季诺维也夫等反对派的斗争,又相当委婉地对斯大林效忠表态。他自称“我可是一名富有战斗力的作家-鼓动家。”

## 坚定立场,维护斯大林的地位

俄共内部的权力之争早在1923年已经出现了信号,那时列宁病重,俄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之前由布哈林掌握的《真理报》便发表《列夫·托洛茨基——胜利的组织者》一文,暗喻托氏将是列宁的接班人。至于社会上对苏维埃政策的不满,有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高压政策,有人怀疑无产阶级专政,甚至有人把斯大林的话“断章取义”等现象,杰米扬自然了如指掌,但他不允许任何人这样做,因为党是不会有错误的,他发明了一个词“党独大”(партичанство),以此帮助斯大林维护其党内地位。他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回忆了列宁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同他的谈话:无产阶级“专政是艰苦卓绝的斗争,血腥的和流血的,强力的、平和的,军事的和经济上的,教育的

和行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旧社会的一切势力和传统。”杰米扬愿意与布尔什维克一道创造无产阶级的新文化。

“党独大”的思想使杰米扬成为斯大林的坚决支持者,是后者对付反对派的得力配合者。当反对派围绕“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激烈争论苏联对内对外政策时,杰米扬发挥了敲边鼓的作用。

“1926年10月初,斯大林告诉莫洛托夫,说托洛茨基可能要被开除出政治局。同样的消息也通过某种途径告知了杰米扬,后者得悉斯大林对付新反对派托洛茨基的计划后,便在10月8日用克里姆林宫的公文纸写了一首讽刺诗,用词粗俗,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加以嘲讽,表明了立场。杰米扬写完诗后立即交给了斯大林。两个星期后,1926年10月23、2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鉴于托洛茨基的宗派主义活动,决定解除其政治局委员一职。会上还批判了“工人反对派”。

此外,杰米扬是上世纪20年代苏联文学艺术家中间极其少有的能够同斯大林套近乎的人。他蒙斯大林安排在德国疗养期间,不仅写信给斯大林表示他对共产主义光明未来的信心,而且密切结合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斗争,说自己的所见所闻都表明“资产阶级正在瓦解”,说“正在消亡”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托洛茨基恨之入骨的布尔什维主义”。杰米扬说依他本人所见,欧洲的旧制度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末日”,确切说是“飞向末日”。就此他真诚地对斯大林说,他真想写一写自己的感受,好好写一写,说明苏联制度的优越性,让人们看到共产主义的苏联与没落中的资本主义德国的天壤之别。增强人们的道路和制度自信。

还有两个细节也可以看出杰米扬的人格。

一、是他在信中对斯大林毫不见外,描述了妻子对德国的羡慕,如何在商店里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目不暇接,指指点点,赞不绝口,流连忘返,但让人感觉那是她的“妇人见”。

二、是在苏联文学中,是他据自己与领袖的亲近接触和日常观察,最早把斯大林的公众形象定格:“叼着烟斗,微皱眉头,小有笑意,轻咳两声,习惯性地耸耸肩膀,然后就开讲第一……第二……第三……”杰米扬信中称斯大林“头脑清醒,是一个温

柔的人”。信末他说“我紧紧地拥抱您。”

在20世纪20年代被“恩准”用这样轻松、随意的语言风格同斯大林通信,并把他塑造为体察民情的“人民领袖”的人中,杰米扬几乎是先行者。

## 在新闻审查波涛的冲击下

在新闻审查波涛的冲击下,杰米扬作为红色作家第一把交椅的地位开始动摇。1930年杰米扬在《真理报》发表了讽刺诗《从炕炉上下来!》和《毫不留情》。他试图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揭示苏俄社会的弊病,没有朝气,人们没有工作热情,在炕炉上取暖,他呼吁他们“从炕炉上下来!”但是在布尔什维克新闻审查的强硬政策下,这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不是鼓舞性的,不是积极向上的。

12月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就这两部作品做出决定,认为近期杰米扬的作品里开始出现虚假的音符,表现为他唱衰俄国和贬低俄罗斯的一切。此外,他最近的一篇讽刺作品不顾禁令,提到了苏联社会对斯大林的不满,提到了各地的多次起义和刺杀斯大林的事,实质是在散布“谣言”。他被说成反苏。

1930年12月8日杰米扬给斯大林写信求助,他把中央委员会决议视为“绞链”,认为自己遭难的时辰到了。

12月12日杰米扬得到斯大林复函,这是一封十分重要的信,它透彻鲜明地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文艺政策和新闻审查的强硬党性原则。

这次杰米扬没有得到领袖的支持,而是严厉的批评。斯大林诘问杰米扬“有什么根据”说党的决议是“绞链”,斥他“不去思考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实质并改正错误,反将其视为‘绞链’,这样的人能叫共产党员吗?需要夸奖你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夸了你几十次”。面对某些群体和党内同志对你的攻击,“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保护你。有几十名诗人和作家偶犯错误,中央委员会都摆平了。您认为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和可以理解的。可是,当中央委员会不得不批评你的错误时,你一下子就大喊大叫,说这是什么‘绞链’。你有什么根据?也许中央委员会没有权利批评你的错误?也许中央委员会不能针对你做什么决议?也许你的诗作比任何批评都高明?你是

否感觉到,你已经患上某种令人不快的称作‘自满’的疾病了?杰米扬同志,谦虚点吧。”

斯大林信中说他读了杰米扬《从炕炉上下来!》,其中不乏闪光点,但是作者的错误却在于他没有认清苏联的本质和它对世界形势的举足轻重的影响。斯大林告诉杰米扬要认清世界形势: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从西欧转移到俄国。世界各国的革命者都满怀希望地注视着苏联,把它当作全世界劳动人民解放斗争的大本营,承认它才是自己真正的祖国。全世界革命工人为苏联的首先是为苏联工人的先锋队俄罗斯工人阶级欢呼”。

在斯大林眼中,俄罗斯工人阶级“是世所公认的领袖,它执行的是其他国家无产阶级一直追求的最革命的、最积极的政策。所有国家革命工人的领袖都如饥似渴地研究俄国工人阶级最富教益的历史”。

斯大林再次诘问杰米扬:“可是你呢?对于历史上这一最为伟大的革命进程,你没有认真思考,没有上升到先进无产阶级讴歌者的高度”,反而被卡拉姆津等古典作家的书迷惑,陷入一些无聊的引述而“不能自拔”。

在斯大林笔下,杰米扬以自己的作品开始向全世界宣称,说俄罗斯过去一片荒凉衰败,说当今的俄罗斯完全被撕裂,说“懒惰”和“坐在炕上烤火”几乎就成了俄罗斯人的民族特性,也就是俄罗斯工人的“民族特性”。

为使信更有说服力,斯大林引用了“全世界最伟大的国际主义者”列宁1914年写的《论大俄罗斯民族自豪感》一文中的话,请“知书达理”的杰米扬好好思考。列宁说:“我们大俄罗斯的觉悟的无产者是不是没有民族自豪感呢?当然不是的。我们酷爱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祖国。”斯大林认为诚如列宁所说:“我们满怀着民族自豪感,因为大俄罗斯民族也产生了革命阶级,也证明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只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普遍的饥荒,以及向神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献媚的极端奴才相。”

纵观斯大林的信,其语气尽管相当严厉,但还是把杰米扬当成了自己人,他告诉杰米扬:“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你应当回到原有列宁的道路

上。问题的实质就在这里,而不是一个被吓破胆的知识分子魂不附体地信口胡言,‘再也没有人发表杰米扬的作品了’。”这封信发表在俄文版《斯大林选集》的第13卷上。

## 杰米扬央求斯大林

显然,杰米扬失宠了,有风声说要把他请出克里姆林宫。往昔,他在红墙之内,与他相邻而居的是伏罗希洛夫和斯大林,可谓风光一时。此番若真迁出克里姆林宫,对他简直是政治和颜面上的很大丑闻。杰米扬听说后立即致函斯大林(1932年9月3日)。

他说:“我的个人生活是卑污的,沾染了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凶狠、虚伪、狡诈和报复心极强的小市民习气。我费了很大力气想挣脱这种肮脏的生活,但为时已晚。这是我个人的事,就把这一切抛到克里姆林宫墙外去吧。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央求您本人:不要把我这个人同我的私生活混为一谈,请把我这个人与我的私生活区分开来,请把我这个人与私人品质区分开来,请给我这个久经考验而且还有利用价值的人以立足之地。过几个月我就50岁了……我还想再做些事情,好好地干。”

旧日在全俄积极鼓动工人热爱苏维埃政府和布什维克党首的杰米扬,此时向斯大林表示了他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后,不得不低声下气地说:“我请求一件事情:请不要破坏那些令人欣羡的藏书,那是我积四分之一世纪的作家生涯建立起来的图书馆。”我的图书馆本身“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东西”。

原来他也知道斯大林的厉害,知道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如何对付已经失宠的人:“离开这些书我活不下去,无法工作……这是我在克里姆林宫15年的生活里创作的图书交响乐。这是我大脑的继续。把藏书破坏掉,就等于把我掏空,让我粉身碎骨,让我瘫痪。我不是科研革命者,不能总是跑图书馆查阅资料。我是诗人。我亲手打造的工具应该在我工作时随手拈来。我和它是一体的。”

杰米扬不仅在信中请求他对之效忠的党为他的书保留足够的空间,而且请党保留他作为一



杰米扬·别德内

个诗人的名分,在作家协会一类的组织中“只消写上他的名字就够了”。

杰米扬的话语中流露悲音,但是他似乎还是缺少自知之明,依然自视有“社会价值”,所以请党及其领袖“保留”他的社会价值,因为它对党“并非没有用处”。

杰米扬信中摆出的是“娘打孩子,孩子跪地求饶”的姿态。尽管感到“被赶出克里姆林宫,就像被连根拔除”,切断同全苏联的联系,他对党中央和斯大林说,这样他会才思

“干涸,他就完蛋了”,但是这一声声哀鸣无济于事。

1932年9月4日他收到斯大林的回信:

杰米扬同志!

存放图书的房间和办公室自然应当保留归您使用。至于个人方面的事,以及由此招致的您搬出克里姆林宫,是因为必须防止种种丑闻的发生(当然不是您引起的),克里姆林宫的墙内是不许这类情况出现的。

您把搬出克里姆林宫一事说成试图“切断”或使您“疏远”同党的联系,使您远离事业,这是很奇怪的。您自己知道,成百上千的负责人员和受人尊敬的同志(包括高尔基)都没有住在克里姆林宫里。可是这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没有人说他们不接近党,不接近克里姆林宫。

9月5日,杰米扬回信给斯大林,表示“无限感激”,而且为领袖没有责怪他而“受到鼓舞”,他坚信自己“对党有用处,党会不时地保护”他这样“一个大傻瓜”。

杰米扬搬出了克里姆林宫,在莫斯科罗日杰文斯基花园街15号楼2号得到一个住处。他不满意这狭小阴暗的房子,但是没有办法,在这里一直住到1944年。

杰米扬失宠后斯大林通过各种途径观察他,也许是想把他当成一个“可教育”的对象。1931年是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十周年。杰米扬在3月21日的《消息报》上发表诗作《新经济政策十年祭》,通篇描写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积累了财富的暴发户,有的甚至当了“政治家-外交官”。言

词中充满杰米扬式的讽刺。同日,《消息报》还发表题为《斗争与胜利之路》的社论。还是这一天杰米扬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了另外一篇以新经济政策为题的诗篇,编辑部配上了一幅讽刺画。此事迅速引起斯大林的关注,因这一切客观上附和了季诺维也夫等左派反对派的观点,后者认为新经济政策是资本主义,是倒退。联共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斯杰斯基当日致函《消息报》责任书记格隆斯基,称该报发表杰米扬这个作品是“犯了政治错误”,信中引用了未加署名的斯大林的话:“事实上,党的新经济政策旨在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成分进行竞争,以期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信中说:“杰米扬同志歪曲了、错误地反映了新经济政策。”1931年3月2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保密处长据斯大林指示把信分发给有关人员,以统一思想。

在这个意义,杰米扬毕竟是幸运的。也正是因为斯大林把他当成自己人,他才感动得五体投地。从收到斯大林的信后就服服帖帖。即使住在克里姆林宫之外,失宠之后也依然没有停止过写作,依然忠于布尔什维克,他只写歌颂斯大林和苏联的文章,只用他自己说的“欢快”笔调反映“党独大”之下的苏联社会的光明面。他继续争取领袖的关照,如希望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安排他的《第14师走向天堂》等剧的演出,说领袖的出现无疑对该剧的演出是极大的鼓励。

杰米扬继续为布尔什维克党效力,“无需扬鞭自奋蹄”,即使有人“扬鞭”他也没有把热情稍减。为宣传斯大林的工业化政策,他深入到工人中去履行自己鼓动家的义务。“通过我的来访和讲话在工人中造成节日般隆重、朝气蓬勃、富有战斗力的情绪,增强对我们事业的信心,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相信,英雄的壮举是由真正的英雄创造的。”由于各种复杂的联共党内的和社会上的原因,特别是在苏联粮食和日用品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许多人为每日的粮食担忧,“欢快”与否似乎离他们还远,对杰米扬的宣传并不买账,有人更不认同杰米扬的信条“饿着肚子干革命”,特别是有人说他的鼓动是去“忽悠工人”。对于杰米扬如此卖力的出行和鼓动,《真理报》未予报道,为此他致电联共中央书记处,状告该报,并请党指示他,为什么这样,究竟他“错在哪里?”该不该

为党做“宣传鼓动”工作?

## 伴君如伴虎。杰米扬吓死了

作为一个社会的人,杰米扬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使他的人格扭曲了,分裂了。他本想通过对不良现象的鞭笞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那篇令斯大林不快的《从炕炉上下来!》便是一例。但斯大林认为杰米扬的作品没有起积极正面的作用,他不仅批评这位一度当红的诗人,而且处处表现对他的不赞。如他得知《真理报》付给杰米扬的稿酬是每行诗5卢布,高于其他作者的每行诗2卢布时,就指示《真理报》等停止这样做,降低他的稿酬,像其他普通作者一样付酬。

杰米扬的某些作品未能博得斯大林的喜爱,但在1937-1938年间的肃反恶浪中,杰米扬还是活了下来,斯大林对他网开一面,仅仅因“道德败坏”将其开除出党。他的图书馆由曾任列宁秘书的邦奇-布鲁耶维奇购买后捐献给了国家。

像对待身边的任何人一样,斯大林并不相信杰米扬,秘密派遣了一个叫普列津特的“红色教授”监视他。此人把杰米扬的一举一动详细地、一天不漏地记录于一个小日记本上,随时向斯大林汇报。1929年开始的苏联全面农业集体化引发了持续4年多的大饥荒,造成民怨沸腾。杰米扬知道民间的疾苦,思考着各种问题,一次同朋友谈话时说,人民在忍饥挨饿,可是给斯大林那份甜点,端上了这么好的草莓。1934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后,讨论授予哪些人列宁勋章时,斯大林拿出了这个小日记本,展示了上述内容。杰米扬的命运可想而知。

不过,杰米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用,1944年在战争环境中,苏联决定出版俄国寓言家克雷洛夫的全集,由杰米扬主编,他趁此机会致函斯大林希望建功立业,重回党的行列。然而,他生前未能如愿。

1945年5月25日,在一次庆典上,杰米扬习惯性地向自己应有的位置走去。正行走间,忽见莫洛托夫很不友善地转向他,扶了扶眼镜,冷冰冰地问道:“你上哪儿?”杰米扬不知所措,一路后退,好一阵子不知所措,像个日本艺伎。勉强回

# 读者来信摘登

对贵刊2013年第5期韩淮《田汉对我说的我心里话》一文,仅就我所知情况,质疑如下:

1.波兰军队歌舞团(文中多次误写为“文工团”)是1955年来华,不是“1956年秋”,这样,文中很多事情都对不上号了。

文中说:“文化部和对外文委决定……”,“对外文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直属国务院)是1958年成立的,怎么可能与1955年的事沾边?

2.(田汉)说:“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对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就存在着不同看法。”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有“片面性”、“狭窄”,与全民抗战、统一战线宗旨“不相符”等等。

我从未听到家父说过类似的话,也未见过任何相关文字材料。是否专门对韩淮先生一人吐露的“心里话”?

(田汉说):“远在三十年代中期……我写《义勇军进行曲》时……‘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田汉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知道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

3.(田汉说):“去年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

反“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是当年即1955年开展的,不是“去年”。田汉连这点都不知道吗?

4.(田汉)说:“这场运动……是对着整个文艺界的,甚至是对着几百万知识分子的。”

“我的思想、观点和胡风都是一致的。”“这次要多少人挨整,死多少个作家,因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是一个‘集团’不是哪一个人。”“中国将来的文艺战线、文化艺术工作朝哪个方向走,都是值得深思的。”

这是田汉当时能有的看法、会说的话吗?

到家后就吓死了。这是他亲姐妹讲述的。一个叫B·高尔杰耶娃的女作家根据苏联克格勃档案写了一部四卷本的小说《通过绞刑的射击》,其中也描写了这个情节。

他死后葬在莫斯科新圣母公墓2号区。1956年苏共恢复了他的党籍。

杰米扬情绪恶劣时,把自己的许多著作特别是抒情诗稿付之一炬。他死后20年被恢复了党籍,但是反映他作为社会的人的另外一面的作品未曾出版,他的儿子回忆,杰米扬曾经给朋友们朗读过不少这样的诗。但人们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杰米扬。至今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的是一个悲剧性的杰米扬,是一个革命的歌者,一个为无产

“田汉说:‘双百方针’真正目的是为了繁荣文艺和科学技术吗?那就不一定了。我(文章作者)听说过‘双百’是为了‘引蛇出洞’!田汉说:这不就明白了。‘双百’刚说过,接着就是‘香花、毒草’……但‘香花’和‘毒草’的界限如何界定?……这都是人们所担心的。”

“引蛇出洞”的说法是1957年“反右”后才出现的,田汉1955年就知道了?

“双百方针”、“香花”、“毒草”是1956年才出现的术语,田汉早一年就知道,而且还发了一番议论。

“我(文章作者)说:章乃器先生说过一句‘中国是中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引发了田汉又一番议论。

1957年“反右”时揭发罗隆基说过“中国现在是无产阶级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与章乃器无关。田汉又如何知道两年以后的事?

“田汉接着说:……章乃器先生的话当然伤了他(指毛泽东)的自尊心,引起了他的不满。不过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不满,不信任远不止章乃器先生的那句话。早在1942年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及以后的‘抢救失足者’中,当时延安和边区共打出特务15000人,结果一个特务也没有,连王实味也不是特务。……”

田汉1955年就知道延安打特务的数字,就能说王实味没有问题(王案20世纪80年代才平反)?

田汉那年57岁,会对一位认识不久的年轻同志说这么一番“心里话”吗?对我说来,韩淮先生的文章是独家新闻。

这位解放军总政的工作同志与“田汉”一唱一和,而且能保密至今,真是不容易。

贵刊发表的文章当然文责自负,但明显的“硬伤”,责任编辑应当是能发现的。

田大畏

2013年5月24日

【编后记】田大畏先生于2013年6月12日去世,享年82岁。本刊对田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曾翻译过《古拉格群岛》《死魂灵》等世界名著。

阶级政治服务的鼓动家。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在明斯克和哈尔科夫至今犹在。

他创造了“党独大”一词,但是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词并没有保护他,他成了这个词的牺牲品。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及其党魁永远“独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不容任何人说“不”的。他的浮沉始终在克里姆林宫级的新闻审查官斯大林的掌握中。有人说他是御用文人。但是无论受到什么打击,他都怀着娘打孩子的心态,始终是一个热爱布尔什维克党,崇拜领袖列宁、斯大林的红色诗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黄钟)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书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抗战:1945-1949	蒋永敬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陶菊隐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走进怀仁堂(一)(二)	董保存	70.00	11.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颐	32.00	7.00
观念的水位	刘瑜	36.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48.00	8.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国家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诚	38.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廷丁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若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38.00	6.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北京电视台电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II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军事学院在南京(1951-1969)	钟德东 张利娜	498.00	30.00

图书介绍

《古拉格:一部历史》:“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同时代表着苏联的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整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从1929年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古拉格死亡的囚犯达270余万人,这个数据仍然没有反映斯大林时代司法制度的全部受害者的情况……。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无论承认与否,它也是一部斯大林统治期间的镇压史和清洗史。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从建国初至文化大革命历次的政治运动,到处“敌人”,遍地冤狱,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这段惨苦的历史令人痛心不已。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大无畏的精神,以超人的胆识,以“两个不管”打破“两个凡是”的神话,大力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驱散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阴云,使得国家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没有他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有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亚力山大·雅科夫列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被喻为戈尔巴乔夫的影子。配合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带入解体,亦被称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曾提出“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建议。

他曾是正统的共产党人,也曾是党内的自由派,既是马列主义者,也是反苏共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曾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者,最后却作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反斯大林主义”是他思想的主线。对于雅科夫列夫的评价褒贬不一。反对者斥其为“苏共的掘墓人”“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共产主义者”,而自由派却对他赞赏有加。

在他去世后,“这是所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戈尔巴乔夫如是说。

《雾霭》:值得读的一本书。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就蒋介石个人而言,1949年恐怕是其一生中感屈辱的一年,即使在时隔数十年依然是“悲惨”“侮辱”。除了自我反省外,在对国民党党员的多次演讲中,他曾以“亡国”来形容当年的处境。

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1949年亦是蒋介石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他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却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 代理出版:

- 个人出书: 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传记、学术著作等。
- 老人出书: 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 家庭出书: 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 学生出书: 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 学校出书: 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 博客出书: 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 旧书翻印: 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 电子音像: 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 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 出书类型:

- A类: 国内出版社出版, 国家标准书号, 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 B类: 无书号出版, 用于交流与赠送, 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 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 基本价格:

- 1、大32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 2、16开本: 封面用250克铜版纸, 赠送勒口, 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 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 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 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 1000册起印; 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 服务流程: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校(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 欢迎“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 中国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 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 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 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 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 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 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 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 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 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 010-58608407 投稿邮箱: 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 (人人出版网) www.rrchuban.com (自费出版网) 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 www.lrchuban.com (学校出版网) www.xxchuba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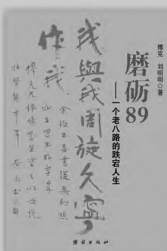
公司名称: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 102218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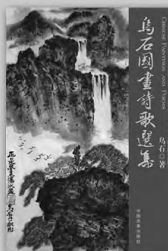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 A类出版作品展示



### B类出版作品展示



# 让每个老人都有回忆录！让每个家庭都有家族文化堂！

2008年10月，北京家谱传记机构首倡“订制型个人出书、家族出书”模式，五年来编辑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家族家史家谱三千余种，掀起老人出书、家族出书热潮！新华每日电讯、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及凤凰周刊、德国世界报等都做了专题报道。

改革开放三十年，打工、创业、购房、迁居，每个大都市都汇聚了千百万新移民。但买房不等于安家，中国人尊宗敬祖，没有家族祠堂与祖宗牌位的家只是寄身客舍，不是灵魂家园！这就是传统节日城市移民大返乡、导致交通大拥堵的根源所在！

怎样让城市移民真正安居乐业呢？借鉴客家祠堂文化经验，结合城市居民单家独居的现实情况，我们设计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家族文化堂”：文化堂建在客厅或书房，上方是以户主名字命名的堂号，中间是由“祖宗像、世系图、字辈谱、家训铭”等组成的“家族文化墙”，下方是以“人物传记、家史家谱、图片音像”等组成的“传世家书组合柜”。让我们在城市新家也能祭祖、娱亲、教子，打造家族精神第二故乡！



电话：010—6892 0114

6252 5116

单位：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接待：中关村海淀图书城25号“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100080 邮箱：grcsw@163.com

网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 家族文化堂设计效果图例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 回忆久久 记录您的 真实人生故事



口述回忆录



画传回忆录



视频回忆录

咨询电话：400-688-9999

网 站：www.huiyi99.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1120室，邮编100007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2013年‘回忆久久杯’老年书画、摄影展”。

详情请登录www.huiyi99.com；咨询电话400-688-9999

**1933年四川兵灾**

**郭道晖：不因人废言，更不可因言废人**

**1949年后胡适形象演变**

**我是怎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袁鹰：胡绩伟周年祭**

**我们所知道的陈伯达与江青**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 元